

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



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

〔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 著

沈隆光 叶绪玲 陆文杰 李念平 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0月18日，我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2月6日，我辞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其间整整是50天。这50天不过是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的那段时期的一个阶段，但确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我看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人民实现政治关系革命化的过程还远未结束。

在那些日子里，我身负重任，而且真心实意地想负起责任来。同我的政治朋友们一道，我主动改变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政策，因为我意识到，前领导人一直在不断加深他们本身脱离现实的政策同人民意志之间的矛盾，并把我们国家引向严重危机。

关于这50天，我本打算沉默一段较长的时间。1989年11月间，沃尔夫·比尔曼在一篇题为“克伦茨何许人也？”的文章中，把我作了一个比喻。正是我对这个比喻的思考，改变了我的初衷。他在文章中向我展示的前景比作“琥珀里的苍蝇”，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琥珀是他一首歌曲的名字，其中提到我）。随便什么东西都曾使我受过惊吓，可是在那50天里我也学会同那些对我本人的不同称呼对付着过日子。人们把我叫做弹簧脖子，希望之星，选举舞弊者，为反对派

挂桂冠的人和大墙开放者等等。我被视为惊人地活跃，同时又患糖尿病，是酒徒，训练有素的微笑政治家，慈父，但又是一副憔悴的青年团面孔。我是个强壮的男子汉，应急人物，派别社会主义新开端的设计者和官僚主义的侏儒。漫画家为了更好地表达我的政治内心世界竟然还学会掌握牙科知识。所有这一切，我都比较容易忍受，唯独那个奇怪的比喻使人难以接受：琥珀里的苍蝇，作为一个观赏物身陷囹圄，同观赏者没有接触的可能，甚至无法进行事后表白。

难道对我当时的言行还要作什么补充吗？我认为是必要的，因为50天里做出的一切决策，尽管主观上是真诚的，客观上是必要的，但也不乏匆忙与恐惧，缺点与失误。有些事没有讲出来，或是被误解，有讲错的地方，也有言犹未尽之处。很多事缺乏解释和分析，因为情况瞬息万变。

今天，事过境迁，某些事情已有可能更加准确地做出判断。而且似乎也有这样的兴趣，因为两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记者和猎奇者每天都来敲打潘科①的家门。新年的时候，一位牧师邀请我去他家谈话。很多讨论和记者采访，我都以时间为由加以拒绝了。我请求，对我这本书中的一些说法不要产生误解。我讲话，并不是由于感到痛苦，不是由于失望，我并没有感觉受到同志们或是周围环境的侮辱。我深信，我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是有发展前途的。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坚持维护已被历史认同的一段历史。我虽被开除出党，但凡能做到的，我愿向党和国家奉献一切。至于做到什么地步，只有留给时间去回答。

---

① 潘科，柏林市的一个区。——编者

我并不为自己辩护，我讲的都是压在心底的话。关于我们的制度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有些事也不甚了了，按理说我是应当知道的。我不委罪于人，而愿共同承担。

第一章

埃里希·昂纳克下野

一、上层人事更迭

1989年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第九次会议。中央委员会当时有200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来自共和国的各个专区。大多数委员们都对一封邀请函感到吃惊。他们收到前一天刚过16点发出的加急电报，干巴巴的电文写道："敬爱的同志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政治局决议订于1989年10月18日，星期三，14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召开。会议日程：讨论政治形势。致社会主义敬礼，埃里希·昂纳克。"可是就在几天以前，10月13日的时候，他们收到了另外一封完全不同的参加第九次全会的邀请信。该邀请信规定，由埃里希·昂纳克作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政治局工作报告，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90年代社会战略提纲。柏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10月17日的时候临时收到了由信使送来的加急电报，还有一封提前召开中央全会的邀请函。他们收到的信件令人惊奇的是：会议日期不是印在那种大家都很熟悉的有"总书记"字样的信笺上，而是印在一张普通的白纸上，虽然上面也有埃里希·昂纳克的签字。从召开会议的形

式上就已经看出第九次全会的内容了。

通知召开九中全会的加急电报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敬爱的同志们：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政治局决议订于1989年10月18日，星期三，14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召开。

会议日程：讨论政治形势。

致社会主义敬礼！

E·昂纳克

召开九中全会的第一次通知书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1989年10月13日，柏林

敬爱的同志们：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下(第九)次会议订于1989年11月15、16和17日在中央委员会大楼举行。会议于10时在大会堂开始，从翁特瓦瑟大街入口。

会议日程：

1.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党的任务。

   报告人：埃里希·昂纳克同志

2. 政治局报告。

3. 德国统一社会党90年代社会战略提纲。

报告和提纲将于会前送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致社会主义敬礼！

埃里希·昂纳克（签字）

召开九中全会的第二次通知书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1989年10月17日，柏林

敬爱的同志们：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政治局决议订于1989年10月18日，星期三，14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举行。

会议日程：讨论政治形势

致社会主义敬礼！

埃里希·昂纳克（签字）

另外，还在传说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例如，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央委员哈特穆特·柯尼希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外事专家约亨·维勒丁（当时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于10月6日联名写信给埃里希·昂纳克，要求在两周之内召开中央全会。“这样一项决定符合党内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愿望……”他们这样写道——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并且指出，“中央委员会立即了解当前的形势对第十二

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必要的。"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国庆招待会上，人们还在用手捂着嘴谈论这封信的时候，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如曼弗雷德·韦克韦特、赫尔曼·康德、京特·格利希和格哈德·霍尔茨—博伊默特等人也都是中央委员，他们已写信表示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在同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库特·哈格进行讨论的时候，继续有一些艺术家，文化干部和科学家表示要求提前召开中央全会。玛戈特·昂纳克参加了这次讨论，虽然当时党政不分，她作为教育部长起码表面上总要通过库特·哈格来坚持她的政治观点，让她吃惊的是，这位哈格在文件传阅时就已对这样一种要求表示了同意。在专区里，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

凡是实事求是的人本来都会感觉到，事情的发生有些紧迫。主要是想打破政治局那种让人难堪的沉默：面对民德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给人造成压力的出走浪潮，许多中央委员都期待我们政治局的成员能说句话，可是等待已经完全厌倦了。他们感到被政治局抛到一边。一段时期以来，政治局已没有什么活动，现在甚至连作用都不起了，仿佛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催眠状态。但有许多人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要在党内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是惟一的好现象。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的决策机构不就是中央委员会吗？建党的这条原则看来几乎被遗忘了，因为政治局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任何实质性的争论都从会议上抹掉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委员会变成了表决机器。从而我们就把自己推上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王座。但是现在，这个王座动摇了。要求迅速召开全会（这是我们对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习惯称呼），同时也就是要求坦率诚恳地分析出现的形势。要求就必要的现实步骤进行讨论，但也

要求我们党进行一次大辩论，讨论一下在一个需要变革的国家里未来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心里明白，在苏联进行的改革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们这里来。但是也要肯定，必须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政策在我们这里进行必要的改革。

我的重大错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可以和埃里希·昂纳克一道进行方针政策的变革。他的政治经历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我认为，鉴于明显的事实，即使从务实考虑，昂纳克也应站到社会必然发展的一边来。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同昂纳克就一项接近实际的政策细节花上力气，甚至绞尽脑汁进行认真讨论已是不可能的事。到了这个时候，许多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掉。甚至今天我要说，浪费掉的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间。而对国内党内日益复杂的局面，昂纳克害怕任何形式的讨论。他企图躲进抽象的未来幻想中去。他把2000年的景象描绘得再好不过。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一份由他签字的纲领性文件把老方案带到90年代去。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最初的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规划出来的。

急需尽快采取行动。即使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现在也必须紧急解决干部问题，解除埃里希·昂纳克及其亲信们的职务。

10月18日到了。快到14点的时候，我从中央委员会大楼二层我的办公室走向大会堂，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已坐在位子上。可以明显地感到大家都很聚精会神而又非常紧张。在这座有点过于舒服的大厅里像这样的气氛是少有的。我从主席团的位子上环顾一下四周。实际上我已有把握，会有多数人主张解除埃里希·昂纳克、京特·米塔克和约阿希姆·赫尔曼等人的职务。我知道，为了在全会上取得多数，某几个知己在筹备第九次全会的过程中工作很积极。其中

有中央委员会安全问题部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中央委员会国际政治经济部所属联邦德国关系局局长冈特·雷特纳，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联络部副部长布鲁诺·马洛，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但是还有点不太肯定的是，力量对比是否足以能够做出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决定。

前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情况已经透露出去。那时已有几个星期一直在游行示威，高呼“我们是人民”，这就促使政治局下决心更换党的最高领导，并向中央委员会建议，撤消埃里希·昂纳克的国家和党的职务。

我发现，埃里希·昂纳克刚走进大厅，所有的谈话声立即停了下来，在等候着的人们中间出现了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以致还不到14点，埃里希·昂纳克就站起来发表了如下声明：

“亲爱的同志们！

经过慎重的考虑，并根据政治局昨天讨论的结果，我作出如下决定：由于我的病情和刚动过手术，我的健康状况不再允许我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我们党和人民今天以及未来提出的要求。所以，我请求中央委员会解除我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谨向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议院推荐埃贡·克伦茨同志。根据形势的要求，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以及从社会各个方面筹备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要求，他有能力和决心负起责任承担全部工作。

我毫不动摇地忠实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把我整个自觉的一生献给了在德国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时候，我们共同进行了总结。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胜利发展看作是对我们党的斗争和对我个人作为共产主义者进行活动的最高荣誉。

我向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艰苦时期的战友们，向全体党员和全国公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几十年来共同行动并取得丰硕成果。

今后我仍将向我们党提供经验和建议。

愿我们的党和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团结，祝中央委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然后，埃里希·昂纳克又坐下来，神色恍惚怔怔地望着。我估计，他回想起1971年5月3日一个完全类似的场面。当时，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同样的大厅里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正如他说的，由于他的年龄，由于他对中央委员会和对人民的责任心，不允许他再继续行使职务。现在对埃里希·昂纳克本人来说，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在他的耳边确实响起了刺耳的语言，这就是那位老共产党员，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多年的阿尔弗雷德·诺伊曼，前一天他在政治局讲过这样的话：当你，埃里希，1971年接替瓦尔特·乌布利希的职务时，那还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党，而且几乎没有外债。可是今天呢？

主持这次会议的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把埃里希·昂纳克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斯多夫感谢昂纳克发表了他的声明，并进行了表决。表决在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昂纳克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以及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的职务。解除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只能是以后由人民议院做出决定的事。我被一致推选为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表决结束后，维利·斯多夫宣布说，如果埃里希·昂纳克由于虚弱的身体状况，不能继续参加会议时，请大家给予谅解。同时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为了埃里希·昂纳克毕生从事政治事业向他表示感谢。

埃里希·昂纳克的请求是以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提出的，他显出刚动过胆囊手术的样子。当他离开大厅时，人们感到，精神的压力的确超过了他身体的力量。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从位子上站起来，向这位77岁的老人热烈鼓掌表示欢送。即使今天对昂纳克这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准备区别对待并要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的那些人也都站起来表示了欢送。

就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我想到埃里希·昂纳克的生活经历，想起了他在萨尔区青年时代的生活故事，想起那些经常听到的和读过的1935年12月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情景。我想到他在法西斯监狱里度过的10年，想到他在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街审讯中威武不屈的样子。我甚至回想起昂纳克传记中个别的细节，这本书是他亲自签字题词送给我的。这里说的就是昂纳克和党卫军队长蒂姆勒的相遇。蒂姆勒当时是勃兰登堡—戈尔登监狱的狱长，几年以后大概升为西德策勒监狱的狱长。我想起埃里希·昂纳克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以及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一起走过的道路，想起他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年历史做出的贡献，为共和国创造了丰硕的持久成果。

可是，我同时也看到另一方面。受到欢送的这个人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危机，对我们党负有严重的个人责任。10月和11月很多不彻底的东西之一就是，我们在第九次会议上没有把基层党组织后来提出的问题说清楚。埃里希·昂纳克是由于严重违反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章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的，并从

中央委员会中开除出去。所以，向人民议院建议，解除他作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因为根据当时的党章规定，任何党员都有责任勇敢地揭露并努力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有责任反对主观主义、轻视集体、个人主义和美化掩饰缺点的现象，对任何压制批评和用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等手段代替批评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根据党章规定，不管是谁都可以向领导机关直至向中央委员会揭发缺点。党员对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失误不能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整个党的领导，特别是埃里希·昂纳克所违反的恰恰是党章中的这几点规定。

前一天在政治局进行辩论的时候，维利·斯多夫——我们一致同意推举他为发言人——就是根据这一理由要求撤消埃里希·昂纳克的职务。当然，人们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九次全会上根据政策失误来追究埃里希·昂纳克的责任呢？理由就是，我们固然看到了一定要撤换党的首脑的必要性，可是我们没有把握，在当时用上面提到的理由提出撤换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否能取得多数。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带来严重后果的前后不一致。同那些把党和国家推向破产边缘的领导干部所进行的一场不彻底的争论正是不幸的尾巴主义的开始，远远落后于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的期望。但并未因此而改变这样的事实，在第九次会议上同时撤消京特·米塔格和约阿希姆·赫尔曼的职务时就非常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所做所为。诚然这也是根据一位中央委员的迫切要求，他就是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莫里茨·梅伯尔教授。

当埃里希·昂纳克离开大厅后，我就开始作“政治形势”的发言。我表示，就国内问题进行认真对话的大门已经被撞开。“事实表明，”我说，“公开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

解决民德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正在迅速上升为实质性的问题。”我看到普遍地越来越关心政治。在那些翻天覆地的日子里，我看到了高超的政治判断能力。我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准则的，那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切问题都会得到政治解决。我主张保持镇静遵守纪律，保证公民的和平劳动，保护我们创造的财富，同时我主张对话。

在随后的时间里不管朝什么方向发展，当时我只认识到两个进行实质性对话的先决条件。其一必须明确辩论的目的，那就是赋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以富有人情味的民主面孔，“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共同取得的成就不能放弃。”其二，我强调这样一项原则：“我们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对此，我主张同联邦共和国完全按照基础条约的精神进行有益的合作。

我特别关心的是，明确表明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里必须公开纠正一件由埃里希·昂纳克负责的政治蠢事。我在全会上说，正如我们不能与世界发展形势相隔离一样，“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也无法脱离运动本身的过程，无法脱离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改革过程。”我并且补充说：“越来越明显的多样性无疑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正是这种差别性，新生事物的丰富多样性，经受各种考验而取得的经验多种多样性，必然要求一个跟一个前进，要求交流经验，要求交流看法，要求交换提出的问题。决不是当时的气候比今天有利，因而要求比今天高。我们能够识别时代的标志，并相应地做出反应。”

我谈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堆积成山，解决这些工作又缺乏魔术般的手段。我避免在经济问题上说武断的话，因为

我们这种超过实际经济水平的生活不可能维持太久。我说：“许下的诺言无法给予保证，不是我们干的事情，”并且指出过去国民经济中的失误所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我提出了恢复经济的第一批建议。我宣布了旅游法草案，并表示要全面革新舆论工作。

“在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结束发言时说，“不会有其他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靠我们大家共同创造和保卫。一切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今天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又在靠幻想过日子。我们采取行动太迟了——正如戈尔巴乔夫中肯地指出的——为此受到了生活的惩罚。

我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情况报告，经过讨论做了几点补充。晚上我就是带着这份报告坐到电视摄像机的前面。我知道，在这次“转折的全会”上本来多么需要进行深入的有内容的讨论啊。我们把这样的讨论推迟到即将召开的第十次全会，因为中央委员会大多数认为，问题的讨论应在当天结束，以便我能在国家稳定的情况下去听取公民们的意见。由于时间紧，我没有起草一份适合舆论规律与电视相称的讲话稿，而只是把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重复讲了一遍。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不管怎么样，10月17日和18日，也就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局会议和九中全会那几天，还是把局面扭转了过来。其实，扭转局面早是必要的了。即使情况极其复杂，也该更早一些着手采取必要的准备工作。

直到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86年）时，都未能从政策失误转回到重新制订现实的政策。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开辟了这样的道路。

1987年苏共一月全会以后，我从埃里希·昂纳克那里领到了分析戈尔巴乔夫讲话的任务。我觉得就像在答一份试卷，而学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试卷的含义。但是很快我就理解到，埃里希·昂纳克不需要从分析中为我们的工作引出结论性的东西。他仅仅是要准确地知道，我对改革和公开性是怎么想的。我同哈特穆特·柯尼希和约亨·维勒丁一起共同作了细致的和我今天仍认为是透彻的分析。我们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正因为两个世界体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国际性分歧，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时能意识到客观的共同点和差异，这对大力发展苏联和民德的强大物质精神潜力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强调理论观点的一致，但也说明两国在实现共同的战略任务时存在着不同的起步条件。我们特别自觉地拥护这样一种看法，“社会战略的统一核心思想”把我们联在一起，而且恰恰是以戈尔巴乔夫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把我们联在一起的。这自然是朝着未来的现实先走一步。但是我们想为昂纳克造一座桥，通过接受这样一种看法，使重新调整受到损害的对苏关系不致受到阻碍。

我们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关于新思维的观点，并通过一种能打动人心的概念解释方法争取缓解昂纳克冷冰冰的拒绝态度。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参与管理等复杂问题又重新进行了研究。我们并且还着手研究分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共产党在解决社会发展个别领域的战略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做法和共同之处。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工人党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政策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用明确的真实思想作了详细的介绍。那就是说，它们是比较有经验的，比较能区别对待，理解比较透彻，并且在结盟政策上采取了比较

明智的态度。可惜，从这次分析中，我们没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引出必要的实际结论。

根据这一评价，埃里希·昂纳克已经清楚，我对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是什么态度。我想起一段小插曲，就像今天的事一样。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同外国客人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昂纳克请我坐进他的车子里。我们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会议大厅去中央委员会大楼。因为昂纳克一直没有对那份详细的分析报告表示看法，虽然足够的时间已经过去。我直接问他有什么看法，他简单地回答说："费了不少功夫。我只是怀疑，你有个地方说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回到了列宁。"我们的谈话没法继续下去，因为车程很短。埃里希·昂纳克以后再没谈起这个问题。这份分析报告和许多报告一样被锁进保险柜里。

1988年夏天，维尔纳·费尔弗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农业，他和我计划在政治局组织一次关于民主德国发展问题的原则讨论会。我们当时认为，由于苏联国内的形势发展，政治局执行的方针必然会失败。卡尔·马克思城专区第一书记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我和他共事很久，我了解他，并且对他很尊重），他也准备参加这一倡议。还有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主要是维利·斯多夫，埃里希·米尔克，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格哈德·许雷尔和维尔纳·雅罗温斯基等人，我知道他们对昂纳克的政策有很大的保留。可惜，维尔纳·费尔弗非常意外地去世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认为没有可能实现我们原来的设想。

力量对比使我感到没有把握实现革新的政策。1988年底，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以后，这一看法更加强了。在那次会议上根本没有准备改革的迹象。不是研究新的

发展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些不说明任何问题的口号，像是“连续性和革新”，“具有民德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是“清理整顿”等等，无非都是一些套话。埃里希·昂纳克虽然摆出一副首席教师的架式说：“大家都知道，苏联的改革进程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马上就以警告的语气补充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时，不能依据“庸俗市侩的喋喋不休，那些人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写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没有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适用的模式。照搬不能代替必要的独立思考。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比过去某些人所认为的还要多种多样。简单化的想法在这里从来都是不妥当的。

凡是要放弃类似苏联现行政策试验的，自然只能用这类似是而非的理论当作遮羞布。埃里希·昂纳克声称，我们将会经受住考验，然而我们是革新者的政党。关于这一方面，他谈到政治局的建议，完全按照这种精神从1990年5月15日到19日在柏林召开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就比通常五年一次的规定提早了一年。显然，埃里希·昂纳克要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重新提名当选为总书记。

但是，紧接着在1989年6月底召开的第八次中央全会上，关于对苏关系问题又发生了令人忧虑的事情。约阿希姆·赫尔曼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中有几部分不同于已被政治局批准的文本。埃里希·昂纳克并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他本人就把一些没有政治意义的段落吸收到报告中去。其中有这样的看法——我只能说一下大意，因为文件中没有记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表现缺乏阶级意识，特别是老同志对此感到失望。

今天我认为，在这一时刻，我错过了一个机会。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我可以公事公办驳斥这种评论，同时说明，政治局从来有过这样的看法。也许当时就有可能争取中央委员会修改方针政策，而且也有可能进行人事更动。可是，今天谁还愿意说肯定的话呢？我只知道，许多中央委员都对这种说法感到气愤。把这样的段落塞进报告的人感到内疚，说什么这样的段落就连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文件也没有登。

第八次中央全会以后，有的基层组织和县委，甚至还有专区委员会紧急报告说，基层党组织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上边”的政策在“下边”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因为不可能的事就是不可能，京特·米塔克就把工作组派往专区，以便“证明”不可能的事就是可能。这就在不少的专区第一书记当中(他们的职责是，各对15个专区中的一个专区承担政治责任）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每月向总书记送一次个人书面汇报，这本来已成为例行公事，现在就更加没有紧要内容，更加一般化了。

在此期间，华沙条约参加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我认为，由于我们对其他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采取了教师爷式的错误态度，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失去很多同情。我在布加勒斯特时就有这样的感觉，对我们代表团已经远远不像过去那样热情友好。看来，有几个代表团在会议休息时似乎要躲开我们。罗马尼亚代表团不是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并肩关系的结束就是对公开性和改革采取重大保留两面态度的结果。

埃里希·昂纳克由于胆绞痛提前离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直接休假去了。许多人也许并不了解，多年以来，昂纳克休假期间都是任命我来代他主持工作。这是因为京特·米塔克同

他的朋友埃里希·昂纳克一样，基本上都是在同一时间去休养的缘故，总书记当时的优先候选人肯定是米塔克。所以，7月间，只要中央机构还有人在柏林，就由我来领导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这也是轻视实际工作意味深长的例子。在上面所说的代理期间，比如说14天里，中央书记除我以外都不办公，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负责。埃里希·昂纳克显然让胆绞痛搞得身体很虚弱，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兴趣处理政治事务。只有当他从西方报刊上看到国内出现什么麻烦时，他才打电话给我。因此，我往往是让人使用价值昂贵的小型计算机，以便找出消息中报道了些什么。埃里希·昂纳克住在柏林北边的德雷维茨，我和他保持电话联系。每隔两三天给他送一次书面资料，以便让他消息灵通。当时正是让人忧虑的时刻，民德公民越来越想通过联邦德国驻民德常设代表处或是经匈牙利跑到联邦共和国去。

昂纳克对这一情况没有做出反应，鉴于谣传很多，询问不断，我就建议他在记者吹风会上宣布，民德公民旅行去匈牙利不会受到限制。他之所以迟迟不表示同意，大约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民德公民当时经过大使馆出境的比去西边后不再回来的要少（6月份，“因家庭急事去西边”大约有1％没再回来，一年以前还仅仅是0.3％）。

在此期间，中央委员会安全问题部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和我对出国旅行的情况，出走问题，青年当中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一些新出现的如髑克①、光头者②流氓集团等问题

① 髑克：西方青年中少数反对传统的社会准则和习惯势力的人，他们把头发染成彩色，发型奇异，穿着破烂，反映一部分青年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心态。——译者

② 光头者：西方剃光头，穿皮衣皮裤的有流氓习气的青年。——译者

进行了分析研究。最后起草了一份送政治局的提案草案，其中建议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委员会和县委立即采取措施加强政治思想工作。8月11日，埃里希·昂纳克休假回来，想在去政府医院住院以前处理几件特别紧急的事情。我把上面说的提案给他送去，并要求列入8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日程。我知道，昂纳克这一天要自己主持会议。同时我认为，这件事非常之重要，必须由总书记在场来讨论处理。埃里希·昂纳克望着首页读了几行，大概已经觉察到文件的爆炸威力，因为他问道："你这是想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把出走的人数排列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筑墙以前我们这里就有好多人跑掉。"埃里希·昂纳克指的不是别的什么人，当时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过错。他所发表的关于同民德签订和约的空话把人们搞得惊惶失措。我把话咽了回去，但有我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是重复了我的意见："我们必须赶紧讨论提案中举出的实际情况。"于是，埃里希·昂纳克一句话没说就向保险柜走去，并把提案锁了进去。然后对我随便说了一句："你可以去休假啦，祝你愉快。"

这样一句话几乎把我给蒙住了。其实，这已经证明对我的不信任在增加。昂纳克并没有对我讲，他什么时候去医院动手术。我完全是偶然从我的小儿子那里听到的，他在万德利茨① 听说这件事。我没有露出来已经知道他动手术的日期，请求总书记取消我的休假，鉴于政治形势留在柏林。昂纳克劝我去休假的好心更刺激我再一次提出推迟假期。埃里希·昂纳克相当肯定地回答说，我不要太看重自己的工作。

① 万德利茨：柏林市郊一地名，当时民主德国领导人的住宅区。政治局委员都住在那里。——译者

最后他也要去休假的。我为什么要为自己请求留在柏林呢？因此我的休假得到了安排。但是8月15日还是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会上证实了我的估计。埃里希·昂纳克不让我在他的身体健康出现严重情况时代替他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受到他的充分信任，可以掌握民德事务的进程。此人就是京特·米塔克。

在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开始了我的休假。我和沃尔夫冈·赫格尔以及其他党中央领导成员保持着经常的接触，没有我参加的会议也能很好了解情况。在这种关键性的日子里，不能参加会议就是一种折磨。这种奉命休假使我心神不安。主要是考虑到我主管的工作——安全和青年工作。要知道，离开民德出走的，多数都是青年！但是，这个时候我还看不到起来抵制流放的可能性。流放要一直持续到去中国访问，这同样也是由昂纳克决定的。去北京的时间计划在9月底。

我起身去波罗的海迪尔哈根度假正是严重消息传到柏林的时候。联邦德国驻民德代表处已于8月8日由于人员暴满而关闭。因而，外逃的人流在不断地涌向联邦德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匈牙利已于5月初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界）和驻布拉格大使馆，而且明显地在扩大。

米塔克匆匆忙忙组织了一次由埃里希·昂纳克对埃尔富特微型电脑生产者代表团的接见。目的就是让长期卧病没有露面的总书记再出来活动一下。在这次接见中，昂纳克没有谈到出走浪潮的事，只是把一句老成语赋予了新的含义。他对着摄像机高呼："不管是公牛还是驴子，都阻挡不住社会主义的进程。"按照逻辑的发展，几个小时以后人们就有了自己的说法："公牛和驴子阻止住了社会主义的进程。"无论

如何总算让人感到是在同情一种更好些的民主社会主义。我相信，即使那些经联邦德国大使馆，或是通过匈牙利的绿色边界跑向奥地利，或是后来经捷克斯洛伐克奔向西方的人当中，很多人都不会是出于反社会主义的动机。他们离开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有可能改变民德的社会状况，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前景。他们留下了家庭、社会和国民经济中的令人痛苦的裂痕。

可是，《新德意志报》在一篇由昂纳克亲自审稿的社论中表示，不为这些人的出走而感到"婉惜"。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全然证明，党的领导人仍然一再渲染的民德政治稳定经济活跃的情景是多么不符合现实，而我们领导上仍然一直未能引出必要的结论。京特·米塔克和埃里希·昂纳克在这方面的观点不差分毫。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外部原因，那就是说仅仅归罪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阴谋策划和西方舆论的影响。教会本着对国家的人道主义责任感在最近几周里所做的努力却被忽略了。

全党和中央，群众和国家领导之间的冲突在民德40周年国庆之际进一步尖锐化起来。

埃里希·昂纳克作为总书记和国家元首所最关心的就是筹备10月7日的庆祝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要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展示在世界面前的是一个看来很幸福的社会。可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青年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不满意，缺乏信心和不稳定的情绪蔓延开来。新的民主运动出现了。大多数示威游行的人在那个时候还都是主张实行社会主义革新的。和平革命的初期迹象已经到处可以感觉到了。

沃尔夫冈·赫格尔往迪尔哈根发给我的消息说，政治局

的多数委员都迫切要求对存在的问题和外逃原因进行一次透彻的讨论。其中有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海因茨·凯斯勒，霍斯特·多卢斯，京特·沙博夫斯基，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库特·哈格，英格·朗格，哈里·蒂施，维利·斯多夫，维尔纳·瓦尔德和霍斯特·辛德曼。但是，京特·米塔克把所有必要的讨论都推迟到埃里希·昂纳克重新视事办公以后。

强制性休假结束之后，我就直接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我此次率团访问是早已规定好的。原来是应其间已被解职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邀请，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去访问的。可是由于“天安门广场事件”，我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埃里希·昂纳克现在显然又想起了尚未成行的访问，委任我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国庆活动。

在北京，我收到的消息说，9月29日，星期五，根据埃里希·昂纳克的动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提出让滞留在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内的公民乘火车经民德境内前往联邦共和国。

这是一项完全没有意义的决定，因为很快就在到处传说，列车要穿过民德。10月4日，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的铁路线被包围。德累斯顿的警察关闭了火车站，从而导致破坏建筑物，寻衅滋事的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在一些善良的看热闹的人中间，以及人民警察之间也发生了对抗行动。对此，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仅仅解决民德的内部矛盾能否带来平静。

我当时认为，现在马上就会朝另外的方向发展。因而我决定离北京回国，在飞行途中起草了一份政治局声明。我在

声明中尖锐地分析了国内出现的政治形势。在柏林我把手稿交给了沃尔夫冈·赫格尔，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和京特·沙博夫斯基。他们和我一起对文稿进行了修改润色。10月8日，星期天，我把声明草案呈送埃里希·昂纳克，并建议在10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研究讨论。但是，昂纳克电话通知我，他不同意，而且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发表这样一项声明。我最好是再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他把这份声明看作是针对他本人的。我在电话上说："埃里希，这决不是反对你的，我认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我希望党尽快地恢复政治上的主动性。徒劳一番，总书记仍然表示反对。

第二天，我又一次请求埃里希·昂纳克谈一谈，并坚持把声明提交政治局讨论。昂纳克气呼呼地表示，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丝毫也未反对过威廉·皮克或是瓦尔特·乌布利希，而我却弄了个声明反对他。现在我无法判断埃里希·昂纳克昔日同威廉·皮克的个人关系到底如何。一般地说，还是很好的。但是我却完全知道，70年代初，昂纳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发生过严重的意见分歧。所以，他的论据不能成立。

埃里希·昂纳克认为，我在利用这份声明分裂党的领导，并把大权抓到手里。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着用明确的语言作了下列补充：不管什么时候讨论决定干部问题，如果我真的把这项声明提交政治局，他昂纳克就决不会同意让我在党内掌握更大的权力。这一点我倒要好好考虑一下。我犹豫了一会，接着就去找埃德温·施威特纳，他是政治局办公厅主任。办公厅是中央委员会内直属总书记领导的单位，负责筹备党中央的会议。埃德温·施威特纳很清楚，如按照我的要求把声明发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

员，他会遭到什么风险。可他还是照样做了。

10月10日和11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讨论了声明草案。虽然这项声明带有妥协的性质，对当前形势的考虑还很不全面，但终究还是摆脱总书记政治路线的第一个信号。在讨论中，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对提案表了态。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埃里希·昂纳克指定米塔克、赫尔曼和我来定稿。昂纳克看到已经没有可能阻止这样一项声明。定稿小组的人选显然是有昂纳克的目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他的亲信把他所担心害怕的段落从语气上缓和下来。所以，我建议也把京特·沙博夫斯基吸收进来。我的建议得到通过。于是我们就到约阿希姆·赫尔曼的办公室里开始工作。

米塔克马上从皮包里拿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基本上就是埃里希·昂纳克在民德40周年庆祝会上讲稿的摘要。它自然不能成为文稿的基础。在讨论发言中出乎我的预料，无论是米塔克还是赫尔曼，对我们的建议都还比较能接受。他们也许已经估计到未来14天的发展。可是他们仍然神经质地进行争论，千方百计地要缓和文稿的语气。在一些提法上他们还是达到了目的。

经过编辑加工以后，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声明又重新提交政治局审查，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得到了通过。10月12日见报的文稿中删去了昂纳克对民德逃亡分子"不表惋惜"的不吉祥的措词。文件确认："社会主义需要每一个人。人人都能得到安置，人人都有前途。社会主义就是成长中一代人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如果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宣布脱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他们采取这一步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必须并且将会在我们当中寻找原因。"人们会把这样的话仅仅理解为对现状的批

评。所以，除此之外还勾画了社会有效政策的几点目标：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每一个人的劳动收益；民主相处，同心协作；改善供应，按劳付酬；提倡符合生活实际的新闻报道；扩大旅游机会和建立有益于健康的环境。这些目标的提出明确地指明了必要的政策调整方向，而且也得到了广泛的理解。

除这项声明外，在10月10日和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还干了另外一件叛逆的事。我提交了一份由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并由当时的第一书记埃贝哈德·奥里希、少先队主席维尔弗里德·波斯纳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青年部部长格尔德·舒尔茨签署的报告草案。该文件如实地介绍了青年当中实际的政治状态。坦率地报告说，多数青年人已经不再信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要求对政策进行根本的革新，他们坚决要求参与革新过程。

讨论这项报告草案时也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政治局的某些同志，如库特·哈格、京特·沙博夫斯基、西格弗里德·洛伦茨、维尔纳·瓦尔德和格哈德·许雷尔等人都表示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分析。他们说，再也不能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许多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任程度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是，埃里希·昂纳克愤懑地表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领导一致攻击党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在民德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致于使讨论从会议的主要内容——政治局声明的问题上转移开去，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显然要对青年团发起的炮轰，我把报告草案收了回去。

我并不认为，这样会被理解为修改了我的看法。埃里

希·昂纳克同样不会忘记我已经开始说实话。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向我提起这件事，并要求我撤换党中央的青年部长。我拒绝这样做，并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首先把我撤掉，因为我完全同意青年团提出的形势估计。埃里希·昂纳克很难掩饰他对我的反应感到失望。但是他没再提起这个问题。

10月12日，星期四举行的由各专区第一书记——他们是被召来柏林的——参加的讨论会上，他也没有干这件事。我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埃里希·昂纳克向专区“第一把手”介绍情况时没怎么强调政治局的尖锐分歧——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总书记宣读了一段比较长的开场白，主要是讲民德全面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可是几乎没有提到政治局的声明，而且完全没有谈到共和国的真实情况。各专区第一书记对这样一种领导作风感到气愤。汉斯·莫德罗、约翰内斯·开姆尼策和京特·雅恩特别明确特别尖锐地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京特·雅恩归纳到一点：我们的政治局不能再如实地估计形势，如果情况如此，那我就要面对昂纳克同志说：如果一位总书记能把工作交给一位更为年轻的人，这就是我们党史上的光辉范例。

这是明确的语言。但是，埃里希·昂纳克看来是充耳不闻。第二天由各民主党派主席参加的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影射暗示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可他仍然未能认清时代的标志。他对座谈会表示满意，正如他所说的，还要发表一项建设性的公报。自由民主党主席曼弗雷德·格拉赫没有理会他那套安排，而是对民德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根本性的分歧意见，他就是如此这般颂扬了昂纳克。我问自

己，他竟会对如此尖锐的分歧毫无觉察。他必然是想压制不同意见。

众多的批评意见还是起了作用。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维利·斯多夫的建议一致通过决定，解除埃里希·昂纳克总书记的职务，以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职务。这项决定在第二天举行的由各专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讨论会上做了说明。紧接着，政治局就批准通过了我的讲话，以及中共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进程。这次会议在14点时就开始了。

二、昂纳克时代

世界历史有它的大时代，各国历史有它的小时代。如果这一前提得到认可，那我就会毫无顾忌地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1年召开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称为昂纳克时代。当然，对此我所想到的并不是一个光辉的消灭差别的时代标签，而是这个时代对民主德国的发展，特别是对赢得世界范围的承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更确切地说，我所指的是一次矛盾重重而且首先是招致失败的试验。这次试验的目的，就是要在科技的时代里，在世界整体意识的时代里实现可靠的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模式。

事物发展的道路上不乏批评者，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也是如此。这些批评者要么早已想到，或是很快就想到，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因为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仍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因为我并不把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的失败归咎于思想观念的错误，而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出现了失误。人们不会让我改变这种看法。但是

产生如下的想法也该是非常合理的，这就是说一位名叫埃里希·昂纳克的共产党人，进入民主德国的政治生活时就下定决心承担全部风险，要么亲手描绘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要么一旦试验失败就留下一堆反法西斯和左翼的遗产碎片。我倒是认为，昂纳克相信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并要在一个经济强大的工农共和国内取得社会进步。他要实现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特色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他的父亲在萨尔植入他的思想意识之中的。

埃里希·昂纳克有时对他的朋友们说，他是星期日诞生的幸运儿。他在传记中写道，这种广泛流传的由于偶然原因造成的个人优势并不符合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情况。

他的八口之家在萨尔一个小地方维伯尔斯基兴过着艰难的日子。那里的工资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以下。就像昂纳克所说的，在地下干10个小时榨干血汗的艰苦劳动，所得到的钱仅够买一公斤黄油。昂纳克说，“施土姆”皇帝，战争爆发户和施土姆康采恩所有者是他们家的“死敌”。施土姆康采恩起家的厂子就在诺因基兴，昂纳克出生的地方。阶级意识从这里继承下来。当1918／1919年间德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那些对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的背叛不能原谅的无产者们都跑来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其中就有埃里希·昂纳克的父亲威廉。

“当时”，埃里希·昂纳克写道，“在十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在革命战争后的危机年月里，我父亲用他那种简单的方式对我解释说，为什么会富的富穷的穷，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谁在战争中发财而谁又在战争中遭殃。对我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我看清了世界形势。我决心把我的一生献给争取世界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一直在坚持这一终

生的目标……”他并且补充说：“在我的一生中，一时一刻也未对我们的事业产生过怀疑——无论是在童年，还是在从事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和参加德国共产党的青年时代；无论是在1933年至1935年反法西斯的反抗斗争中，还是在1937年至1945年的法西斯监狱里；无论是1935年12月在柏林普林茨—阿尔布莱希特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里，还是在1937年6月的‘人民法庭’上；无论是1935年底在法西斯‘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旗帜’兵营里，还是一年半的拘留审查时刻面对刽子手的日子里。”

再重复一遍：我深深地相信埃里希·昂纳克追求个人抱负的诚挚。可是后来，他违背良知，违背同志们、科学家和艺术家们的警告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坚持僵硬的教条，并助长了导致失败的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生活悲剧。不是所有他的错误都能用个人失误来解释清楚的。他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有其特定的环境。

所以，我主张对埃里希·昂纳克的一生，对他的作用和失败做出符合历史的判断。

他失败在什么地方呢？据我的看法，他失败在带来严重后果的斯大林遗产上。无论是在方针政策上，还是在个人的思想意识上——自然是紧密相连的——，他都无法摆脱。他的失败在于，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越来越难以达到西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各方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选择和个别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但是，他同样也失败于缺乏洞察力，不能适应客观的形势要求，失败于越来越独断专行，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干预形势发展，而不是根据对现实的观察去推进形势发展。

埃里希·昂纳克如何达到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的呢？

1945年4月27日，勃兰登堡—戈尔登监狱打开了关押萨尔地区反法西斯分子的牢房以后，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克服重重困难奔向柏林。最初在奥拉宁堡被苏军抓住，并和国防军的逃兵，党卫军队员，法西斯官员以及民夫等一起关押在一个粮食仓库里，直到查清身份以后，他才于5月4日来到被摧毁了的柏林。

正如他所讲的，他很快就在柏林—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城区开始收拢德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战友们。他领导着设在兰茨贝格大街上的工作委员会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和柏林—阿尔特—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的红军柏林城防司令部建立了接触。他在那里遇上了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干部和朋友们，这些人当时都属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特派小组。通过他们，埃里希·昂纳克来到普林岑大街，当时这里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临时所在地。从莫斯科归来的瓦尔特·乌布利希在那里把他叫了去，并委派他起草德国共产党青年工作基本路线，而且必须马上做好。正如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自传里所写的，由那个后来成为叛徒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起草的稿子已经摆在乌布利希面前，可是上面的乌布利希批示是“不能用”。在那段时间里，昂纳克还遇上奥托·文策尔，他后来成为民德的外交部长，还有那位晋升为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埃里希·米尔克。

昂纳克就以他从事青年工作所取得的一些经验着手开始工作，尽管这些经验由于监禁中断了10年之久。他开始总结了团结反法西斯民主青年运动的思想。6月间，瓦尔特·乌布利希介绍他与海因茨·凯斯勒相识。凯斯勒后来成为国防部长，战争期间投奔红军，以后又以“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

委员的身份回到柏林。

昂纳克被乌布利希任命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全国青年工作的书记，而凯斯勒则负责柏林党的青年工作。1946年2月26日，他们两人同特奥·维歇特、保罗·维尔纳、埃迪特·鲍曼、基督教牧师奥斯瓦尔德·汉尼施、天主教大教堂副牧师罗伯特·朗格以及其他青年干部一起都属于向苏联德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呈递申请报告的签字者，该申请报告请求批准建立“自由德国青年联盟”。3月7日，苏联德国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建团的申请。以后，这一天就成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诞生日。埃里希·昂纳克被任命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临时委员会主席。1946年复活节在勃兰登堡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一致推选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还有，会议的主持者是赫尔曼·阿克森。昂纳克和他这位后来的对外政策专家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源远流长。在此之前，埃里希·昂纳克在德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参加了1946年4月21日和22日在当时的柏林“海军宫”举行的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联合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该党的诞生日，40多年以后政治上又以悲剧的形式破产了。

1947年，埃里希·昂纳克率领第一个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代表团去苏联。像这样的旅行，后来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历史上被称为“和平飞往东方”。昂纳克利用这样的方针加深了战后的对苏关系。他结识了维亚切斯拉夫·库佐马索夫。库佐马索夫当时是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几十年后成为苏联驻柏林大使。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人民会议改组为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临时人民议会。同时，第三届德意志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生效。埃里希·昂纳克是共和国成立的见证人，昔日里他本应成为国家领导人的。

作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主席，他负责主办了青年团的火炬游行。10月11日，刚刚诞生四天的共和国和几个小时前才被选出的总统威廉·皮克受到全国各地青年们的热烈欢呼。

除乌布利希外，威廉·皮克应是他的支持者之一。埃里希·昂纳克向威廉·皮克高呼："我们德意志青年，宣誓忠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它现在和将来都会为青年带来和平和美好生活！

……我们要做建筑师，建设我们的和平、劳动、战斗、人道的新大厦！"这就是庆祝大会和共和国成立几周年时经常听到的呼声。1989年10月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举行的传统火炬游行大概就成了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看的"在自己场地上举行的球赛"了。

在昂纳克的领导下，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承担了几项著名的建筑工程。其中有从萨勒河到下韦伦博恩的玛克斯冶炼厂全长达数百公里的引水工程，玛克斯冶炼厂是那个时候共和国唯一的高炉车间。这是一项紧急任务，修这条引水工程用了90天时间。在埃尔茨山区的索萨修了一座拦水大坝。青年团员被派去驾驶第一批拖拉机。埃里希·昂纳克的这些倡议和其他的倡议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中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特别是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也越来越注意他。接着在1950年7月间举行的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上，埃里希·昂纳克就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38岁的昂纳克在这一层领导中是最年轻的。

许多迹象表明，埃里希·昂纳克在随后的时间里陷入了政治局两派的对立。提出的意见中不少都是攻击青年团某些方面的工作。可是，个别政治局成员的攻击矛头主要还是针对瓦尔特·乌布利希。批评他的人知道，乌布利希把年轻的昂纳克当作最可靠的战友之一。但是，乌布利希考虑到当时紧密合作的两个人都可能在政治上受到伤害，因此就打了昂纳克一拳。

因为对1953年6月17日事件的处理还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苏联在六月事件前夕的德国政策。这件事也关系到，以当时“新德意志报”主编、政治局委员鲁道夫·赫恩施塔德为中心的那伙人都起了什么作用。肯定会有人议论，失去政治局多数支持的瓦尔特·乌布利希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埃里希·昂纳克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呢。大家都知道的是，乌布利希战胜了对手，在“不是讨论错误的时候”口号下，不准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对这个问题让人感兴趣的是，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自传里对6月那几天的教训写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对6.17事件和对我们的工作引出什么结论的讨论中，关系到我们的问题特别提到，要开展党内民主，保证集体领导，坚持巩固党的团结。”如果他真的为自己引出这些结论，并在执政的年月里铭记在心的话，那么，36年后也许能使党避免走上实际等于自行解散的痛苦道路。

1955年5月底，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埃里希·昂纳克被解除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接着他就去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

1956年秋，他开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工作。那时他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军事和安全问题。这一时期

起决定影响的是，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人战斗队。1961年，当柏林边界封锁界墙筑起的时候，工人战斗队已经成为非常有效的政治因素。所有这一切都巩固了埃里希·昂纳克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埃里希·昂纳克在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重用下得到提升。那时他参加了粉碎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这个集团是1956年在党的领导层中形成的。1957年1月30日到2月1日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埃里希·昂纳克——正如他自己所写的——保卫了“党的总路线”。“在这一意义上”，他在自传中承认，“同某几位同志进行了不可避免的争论，他们以卡尔·谢德万和恩斯特·沃尔韦贝尔为核心组成集团，这就是说争论一直持续到撤消他们的职务时为止”。

政治局委员谢德万在1957年11月的时候拜访了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长恩斯特·沃尔韦贝尔，并且建议他共同采取行动对付乌布利希。2月10／11日《柏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曾引证过恩斯特·沃尔韦贝尔一部未发表过的回忆录，其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段落：

“1957年11月11日，卡尔·谢德万来找我。我正在患流感。但是卡尔·谢德万要求很急，虽然我很不舒服，还是来交谈了一次。他提醒我说，这我也知道，他自第三十次全会以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就不再讲话，原因是和乌布利希有分歧。现在很快就要召开第三十五次全会，他必须决定，要么一切听其自然，这样人们就有理由责怪他没有尽到政治局委员的责任并且怪他消极被动……或是他必须出来讲话，并且下定决心去干。在中央委员会发表这样的讲话将会成为对乌布利希的控诉。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就都捅出来了……

他（谢德万）和一系列的同志谈过话。关于我，他只想知道，如果他在中央委员会站出来，我是否会攻击他，采取保留态度，还是会支持他，哪怕是部分支持也好。

我向他表示，我是否表态和如何表态取决于中央委员会的发展情况。我问他，他的发言究竟谈些什么主要问题。他告诉我，在我们当中不能再把共和国逃亡问题当成禁律。问题已经发生啦。许多工人农民离开工农政权，这是怎么回事？他要说明，除了敌对势力这个主要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要从我们的政策中去找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将会形成对立。他不抱幻想。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有退路，只能是继续干下去。

他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党内问题。现在只有形式的，而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虽然集体讨论很多，但实际上一切都由乌布利希说了算。他的一些看法有时还没在政治局里谈就先公布啦，或是已向舆论界透露出去。他有独断专行的危险倾向。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实际上慢慢地就会被取消……走上这条道路是从第三十次全会开始的，到第三十三次全会时已在加剧，第三十五次全会时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滑下去。第五届党代表大会正在着手准备。他根本不打算讨论路线问题，而只是继续过去的路线和批准过去的决议。

如果继续沉默下去，就什么也不会改变，而且只能是更糟。他甚至预计到，在第三十五次全会上他也许会遭到失败，对他和对他的家庭来说就会很困难，他准备承担一切后果。等到老办法的害处暴露出来的时候，也许要两年或是三年，到那时他会被平反。但是，他的看法和许多同志的愿望也有可能会得到实现。”

当我读到这些显然是急急忙忙记下来的段落，吃惊地站

了起来，并想到我自己的处境。只要看看这些引证的句子，就会感到问题何其相似。行政命令的领导作风又在昂纳克身上复活。50年代末（筑墙前夕）大量外逃的问题到今年夏天又发展到和当时差不多的规模。“面对党和良心，我感到有责任行动起来”，谢德万在对他自己这样说。

我选择行动的时机太迟了。

1958年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谢德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他的战友们也因“宗派活动”受到处分。关于这一切，埃里希·昂纳克向中央委员会做报告介绍了情况。

瓦尔特·乌布利希把谢德万的职权交给了昂纳克，实际上让他当上了党内第二把手。

1960年9月，威廉·皮克逝世以后，党中央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起着集体总统的作用。1960年2月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工作协调由埃里希·昂纳克负责。在这一方面，他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后来的总理维利·斯多夫、后来的内务部长弗里德里希·迪克尔以及后来的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和海因茨·凯斯勒等人，都曾有过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1961年8月3日到5日，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取得苏联共产党同意之后在会议上建议，把民主德国和柏林（西）以及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或是像昂纳克所称谓的，“置于主权国家之间通常行使的监督之下”。这一建议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一致赞同。

瓦尔特·乌布利希委派埃里希·昂纳克进行筹备并执行

这一任务。用昂纳克自己的话说："后来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所有重要方面我们都考虑到了。"这种自我表扬还是过于谦虚了。在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下当夜就完成了的举动，震动了联邦德国、西柏林以及西方盟国的要人，他们当时都没有料到。这是谋划和组织工作的一件杰作。总之，我们的政治局和苏联的政治局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行动。这件事大大巩固了埃里希·昂纳克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但是，想要领导全党，可还不到时候。接下来还有一个富有成效的10年。通过筑墙首先出现了全国经济情况的改善。当时就想认真地进行一番整顿。一些青年经济学专家，如京特·米塔克，格哈德·许雷尔，京特·克莱伯和维尔纳·雅罗温斯基等都登上政治舞台，并一齐进入了由瓦尔特·乌布利希热切推荐的新经济体制。瓦尔特·乌布利希同西方划清界限的政策符合经互会一体化的强烈需要。1968年，苏联军队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友军的支持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固然政治上完全支持这一行动，所以人民议院1989年时也表示请求原谅是有道理的。可是后来我从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那里获悉，1968年8月，从21日到22日的夜里，人民军部队就停下来了，后来就留在民德的南部地区。人民军部队从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参加过联合部队的行动。但是，我们在政治上也犯有共同的错误。我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已对此公开表示谴责。由于这样的错误，以及当时文化政策的某些短视做法，以致把一些重要的作家和艺术家驱逐出境。即使沃尔夫·比尔曼再一次把我叫作"弹簧脖子"，我今天仍然认为，撤销他的民德公民身份是个重大错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同他坚持讨论。损失了如此多的能够进行争论的，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共事者是极其痛心

的事。当我今天听说，他们都在自觉自愿地维护民德的历史地位，我真的从内心感到惋惜，当时我们就没有那种聪明劲，同他们头脑中左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联合起来。相反，昂纳克在勃兰登堡的难友罗伯特·哈韦曼却被软禁起来，禁止拍电影，不准出书。

在这振奋人心的10年里，我认为应当提到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应当提到他和民德总理维利·斯多夫的会谈。国务秘书米哈伊尔·科尔（民德）和埃贡·巴尔（联邦德国）在1970年进行了同样艰巨而又广泛的工作，到1972年12月21日就签订了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基本关系法。

民主德国当时正走在日益得到国际承认和经济整顿的道路上。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尊重。在当时那个时候，民德确实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经济强国。没用了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工业生产结构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主要是迅速发展了电工和电子工业，发展了化学工业和扩大了原料基地。从1966年到1970年间，投资达到1350亿马克。人均实际收入，1970年比1965年增长122％。

那时的错误在于，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甚至对待苏联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教师爷式的自以为是的态度。由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比较好，就提出要求走特殊道路。这一命题已经提出，而且在散布什么，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模式”。这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看法发生了矛盾。

由于国民经济失调，民主德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德国统一社会党简明党史中介绍了党中央是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工人、合作社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了克服困难和弥补国民经济的损失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人民军、大学生和

中学生也进行支援……在许多工厂里，工人们两班三班地工作在高效率的机器设备旁。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争取尽快完成计划和合同中规定的份额。”

关于问题的原因，简明党史在另外的章节中作了如下的回答：“1970年9月，政治局分析研究了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和某些经验。中止了一系列的追加项目，有些项目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如继续执行下去就会严重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某些投资计划已经取消。建筑规划明确规定，要更好地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特别是住宅、学校、幼儿园和服务设施都能得到保证。采取这样和另外一些步骤的目的在于，创造基本条件，稳定整个国民经济，重新建立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在中央委员会里，人们在探讨主观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及违反政治与经济统一规律的情况。大家坚决要解决人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前，这些问题被瓦尔特·乌布利希提出的“社会主义人类社会”这种无差别的概念搞得模糊不清。主要是经济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改变必须有一种相互适应的正确关系。这时已经提出的一些基本见解，埃里希·昂纳克的手稿中明确地提到这些问题，而且抢先写进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文件。昂纳克时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让人感兴趣的是，从瓦尔特·乌布利希到埃里希·昂纳克的转变是怎么进行的。一些偶然的事件很快联在一起：由瓦尔特·乌布利希率领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四大（1971年3月30日至4月9日在莫斯科召开）回来后，就

决定改变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会的日期。这次全会于5月3日召开。几周以后，决定召开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已经处于新的第一书记影响之下，因此必然很快就会在党的领导层发生人事更动。

苏联共产党二十四大的纲领可以接过来作为制订我们自己路线的基础。苏联共产党规定苏联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生产高速发展，提高效益，科技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地增长。另外，党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内容广泛的纲领。这也就是制订德国统一社会党未来政策的基石。

原来规定由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会上作题为“70年代社会主义的发达社会体制”主题报告。但是，他只作了几点启发性的说明，而埃里希·昂纳克却作的是总结报告。在这次会议上，瓦尔特·乌布利希要求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年龄不饶人”，他这样说，而且又补充一句：“我认为把这一职务交给年轻人的时刻已经来到，我建议选举埃里希·昂纳克同志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央委员们一致同意这一建议。瓦尔特·乌布利希继续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并根据埃里希·昂纳克的建议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这是一个对决定政治未来没有实际意义的职务。

埃里希·昂纳克开始有理有据地消除围绕乌布利希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因素。用乌布利希命名的工厂单位都更换了名称。这也关系到早先的瓦尔特·乌布利希运动场。这个运动场在筹备1973年夏在柏林举行第十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

的过程中马上改名为“世界青年运动场”。瓦尔特·乌布利希已经难以跟上这样的进程。联欢节期间，他去世了。

这些都是从大事记中可以查到的事实。瓦尔特·乌布利希被撤除职务在内部是如何进行的只能从字里行间去找。在我们的历史编写中所存在的“空白点”还有待填补。

1989年春，埃里希·昂纳克发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本装订成册的书，书皮上只印着一个标题：“文献”。书中主要是个人笔记，书信和其他一些从1953年到1973年的文稿。当我读过一遍之后，就问我自己，埃里希·昂纳克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向政治局通报这些事件。显然他想在高龄的时候标榜他在制订八大方针路线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从我对这本文献汇编所作的笔记中摘出几段，我认为这些细节有助于说明当时的一些情况。

1970年7月，当埃里希·昂纳克和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土地上会见时，勃列日涅夫对他说：“你可以相信我，埃里希，在你们那里所发生的没有料到的情况，使我深深感到不安。那些情况现在已经不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我们来说，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来说，是个重要阵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我们的成就，是苏联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当谈到他已经知道政治局和乌布利希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勃列日涅夫强调说：“瓦尔特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无法简单地抹掉。但是他老啦。他如果身体健康，就会高高在上，什么事都自己来干。如果他病了，才会放手，让你，维利（当时指：维利·斯多夫），让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来干事。在两到三年里，他反正无法再领导党……甚至敌人也会估计到，由你来做党的工作，瓦尔特当国务委员会主席。”结束时他说：“好

吧，事情我们都谈到啦。我们主张中等程度的改变一下。”

勃列日涅夫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作为共产党人对共产党人，我想坦率地说，在你们那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表现有某种程度的骄傲自大，对你们的经验，领导方法等等都觉得了不起。对我们也有这种表现。”

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下于1970年8月2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因人事问题引起的紧张气氛对这次会谈也产生了影响。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表示，已经注意到最近出现的某些“讯号和谣传”，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里产生了“摩擦和争论”。苏联共产党对这样一些问题非常敏感，也非常注意。政治局的团结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无法理解，”他说，“二十多年的团结合作竟然会成为问题……重要的是大家目标一致。”

当勃列日涅夫问同意不同意这种看法时，瓦尔特·乌布利希说：“完全正确，我同意。”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住地举行宴会继续进行交谈的过程中，瓦尔特·乌布利希发表了讲话。他又一次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典范。到1971年初，我们将在80家联合企业中实行自动化，因此我们需要协作。“在我们那里，这是比较容易的，在你们这里建立这样大的机构就比较困难。”他谈到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制订的关于科学组织的决议，这项决议原则上表明，“我们将要超过世界尖端水平”。

整整两个月以后，瓦尔特·乌布利希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来信，苏共总书记在信中表示要共同解决同联邦德国和

西柏林的关系，但同时也对建立双边经济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远景规划问题发表了看法。勃列日涅夫迫切要求瓦尔特·乌布利希“继续改善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结构”。苏联共产党非常明显地对民德经济中的错误发展方向表示忧虑，并且答应——根据可能——提供经济援助，例如供应某些重要原料。

在此期间，分歧趋向尖锐化。政治局拒绝发表瓦尔特·乌布利希在他的家乡莱比锡召开的专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的内容离现实相差甚远。要不要公开发表乌布利希在第十四次全会（1970年12月9日至11日）上的总结发言，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特别激烈的争论。政治局的委员们纷纷表态，并致函乌布利希，与他那种脱离政治局路线的言论进行了辩论。瓦尔特·乌布利希看到没有可能越过这种抵制态度，1970年12月17日就书面通知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表示放弃发表他的总结发言。

1971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向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报告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中出现的情况。这样一来，就使得乌布利希得出了不符合民德实际情况的估计，并提出了与党的任务不相一致的要求。他不是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决议出发，而是一再地对这些决议提出怀疑，并不断地强迫政治局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使得政治局无法以其应有的方式进行实际工作解决最重要的任务”。

在一堆由乌布利希提出而被拒绝了的意见书中还有一份突然送来的综合稿，这大概是为筹备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发给专区委员会县委以及基层党组织的。综合稿的

结论是，“所谓至1990年设想都是一些脱离生活、假科学、有的还是‘纯技术观点’的理论”。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谈到瓦尔特·乌布利希年事已高，当时他已是78岁高龄。他们合理地指出，这样的岁数已经很难“承担起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民德国务委员会主席的繁重工作和职责”。可惜，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这种认识，包括埃里希·昂纳克在内，都没有联系到自己的年龄问题。几年以后，他们本来可以为我们省去某些问题，在共和国内奉行的政策也有可能不至于那么僵硬。

5月3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会上，埃里希·昂纳克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时代结束了。“当我们筹备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应当仔细考虑一下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目标，使这些目标要求同现有的资金和国民经济生产能力的增长成比例地协调起来。”因而，党的领导核心从6月15日到19日在柏林维尔纳—塞伦宾德大厅举行会议通过了1971—1975五年计划指令。其中就提出了后来经常为人称道的总任务。为制订这项总任务，政治局接受了苏共二十四大的主要建议。在后来的时间里，民主德国比首创者苏联——这并不是自我吹嘘的一种新形式——贯彻得还要坚决有力。这项总任务的定义是，“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上，在提高效益、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对外政策决议与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的和平纲领完全一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表示要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并且宣布我们国家对欧洲

中心的局势缓和表示关注。

不久就在传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历史上开辟了新时期。1971年的六月会议以后，在党内和在社会上，事实上出现了明显的发展。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统一得到实现，这就意味着，创造的国民收入流向社会领域的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劳动好就会收入高。我们的社会政策措施得到人民群众的赞同。住宅建筑规划被通过了。首先感到的是，住房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工人阶级在党内又重新发挥重大作用。埃里希·昂纳克同劳动人民一起商量问题，访问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和大家都一样。他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威信在提高，党同人民的联系得到加强。总之一句话：一个富有成效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些当年在青年团里工作过的，都把工作当作大伙的事来干，推进时代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对我们来说，埃里希·昂纳克就是工作的倡导者。我们心里老想着他那反法西斯的历史。我们从未忘记，是他创建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并领导青年团达10年之久。党中央和团中央书记处定期在一起开会，因而也加强了党团干部之间的个人接触。

埃里希·昂纳克的工作作风让我感到很佩服。早晨给他送去的报告，通常当天就会拿到横写着“同意”的批示，大家都为党内第一把手如此善于决断感到高兴。在他最后的工作年月里，正是这种工作作风证明是很成问题的。上面说的那种情况被很多人利用了。埃里希·昂纳克把某些报告显然只是横着看一眼，就把“同意”写上去了，过后不是都能记得起决定了什么事。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为新的第一书记

如此有活力有朝气而感到欢欣鼓舞。

还有，开始采取社会政策的措施比想象的要早。从1972年9月1日开始，就为390万公民明显地提高了养老金。为参加养老金保险和领取其他养老金的人，以及享受社会救济的人改善了供应。有三个以上子女并参加全日工作的妇女自1972年7月1日起实行40小时工作周，而工资待遇不变。她们的休假假期增加到21个工作日，如果从事多班制劳动则增加到24个工作日。生一个孩子的全工资产假增加到18周。另外，从生第一个孩子开始就享受生育补助。青年夫妇可以享受优惠贷款，直到26周岁。1967年1月1日以后搬进的近30万户新居，如果住户的全家总收入每月不足2000马克的可以减付房租。在柏林，统一的房租标准是每平方米每月1—1.25马克，其他专区则为0.80—0.90马克。后来——只是太晚啦——社会上认识到，这种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统一的方针在经济上是无法保证的。我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啦，这是以牺牲孩子，牺牲孩子的孩子为代价的。但是当时，当这种毁灭性的超前做法还是采取现款享受加预付享受时，在人民当中，甚至在全世界并不是没有喝彩叫好的。

1972年12月，同联邦德国签订了基础条约。在此之前还有柏林（西）四方协定，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过境协定，以及波兰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同联邦德国签订的条约。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中重要的原因还是1973年9月18日接纳两个德意志国家进入联合国。

1975年8月1日，埃里希·昂纳克在赫尔辛基把他的签名写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下面。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主

权自我理解的高峰，也是埃里希·昂纳克一生中的高峰。当时他还不是国务委员会主席，而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身份签的字。在当时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情况也就被西方国家默认啦。按照外交礼仪以法文的国别字母顺序排列，埃里希·昂纳克就在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之间落了位。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振振有词地写道，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KSZE）促进了从冷战向缓和的明显转变。从今以后，我们把最后文件作为欧洲国家关系的法典。但是，我们对最后文件的三个“篮子”不是同等看待的。我们把安全和经济问题放在优先的地位，对以人权问题为内容的“三号篮子”就感到很难办。无疑，我们在实现重要的人权问题上已经取得不可否认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到的是充分就业，免费受教育和医药供应。另一方面，人民恰恰在旅行自由的问题上比较敏感。但是，根据许多人的政治觉悟水平，与此有关的要求只起着从属的作用。

埃里希·昂纳克在为民主德国争取国际承认中立了大功，并利用外交手腕跻身于有名望的欧洲政客之中。大概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维利·斯多夫就在1976年10月建议总书记昂纳克也承担起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瓦尔特·乌布利希去世后，斯多夫当上国务委员会主席。现在他自己又成为总理，而他的前任霍斯特·辛德曼从此以后就成为人民议院主席了。自那以来，我们当中任何人都知道，埃里希·昂纳克最喜欢干外交。他常常外出旅行，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

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连同带动原料价格上涨的石油冲击

波一起，70年代中也波及到民主德国。由于取得了贷款，影响的程度小了一些。缓和的时代开始以后自然也比较容易拿到贷款。80年代初的时候，只要全力以赴，外债还是可以控制在可以过得去的程度上。所以后来，即使会增加外债，贷款也还是一种受欢迎的方法。贷款就像俗话说的，是用稻草来堵国家财政罐罐的漏洞。当然，民主德国对国际银行界来说倒是个"好客户"，因为它准时交付利息。但是，外债还存在，而且不断地在增加。当我接过党的领导职务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时，拿到的就是这样一份遗产。

埃里希·昂纳克并不害怕同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接触往来。他们可以进出国务委员会大厦，昂纳克的党中央办公室，胡贝图斯施托克宫或是尼德舍恩豪森宫。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为几十亿贷款居间奔走。联邦总理施密特于1981年12月在韦泊林湖拜访了埃里希·昂纳克，并且绕道去居斯特罗，使民主德国很尴尬。居斯特罗是施密特青年时期很熟悉的地方，可是却不让当地居民接近他。我可以肯定，埃里希·昂纳克进行这些会见，是希望建立起和平相处，使两个德意志国家尽可能发展睦邻关系。

联邦德国驻民德常设代表处当时的主任克劳斯·伯林是一位相当自负的人，但其思考能力又从未达到他的前任高斯的深度。在他撰写的《远方的邻居》一书中，描绘了严肃认真的谈话情景。他叙述了联邦总理施密特如何想说服埃里希·昂纳克："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出发，积极地为缓和形势做出贡献。我们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的意义一直在下降，我们干起来，您也干起来。我们不能露出一副倒霉的样子。其实我们两家，两个德意志国家，是有大分量的。我认为，昂纳克先生，我们就要求把这分量放到天平上去。"这

样一些话打动了昂纳克的心。他的确是看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完全代表了已经濒临死亡的勃列日涅夫的立场。如此，他就现实的原子威胁问题说道："我们这里和您们那里的青年都害怕冒险家。联邦总理先生，我们已经多次面对死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现在不是那么严重。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孙子着想。"这正符合我对伯林的了解，他把这些话称作是"宣传言词"。真正了解昂纳克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他身上的一种深刻的诚挚感情，完全体现了他的为人。他爱他的孩子们和孙子们超过一切。在少年宫里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当他被孩子们围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从心眼里那么喜欢接近这些后生晚辈。

关于昂纳克和施密特会见的政治价值，那时在联邦德国就有很大的争论，更多地是从竞选策略考虑的。人们抱怨施密特接受了一块象征性的糖果，这就是埃里希·昂纳克在居斯特罗车站告别时隔着车窗递给他的。我认为，这次会见在当时那个时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它有助于局势缓和，对欧洲中心的局势起着镇静的作用。从这次会见产生了一种希望，但在嗣后几年的实际政策中没有能够实现。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去世。两天以后，在苏共中央一次特别会议上选举尤利·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他很快就表明，他的政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1982年12月21日举行的苏联建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首先是讲了一些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之类的套话，可接下来完全是一种新的调门。"我们现在就直接了当地"，他这样说道，"讲一讲那些现存的和还没有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完全清楚地知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任务是完全有能力的。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解决它们。注意力要放在行动上，而不是说大话。这在今天来说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才会更加壮大。我可以肯定，所有到这个大厅里来开会的人，我们整个党，整个苏联人民都是这样想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提法在这里已露端倪。一般而论，在随后的时间里，由于安德罗波夫的作用，就已经为戈尔巴乔夫后来的路线创立了决定性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在苏联政治局内分歧争论之激烈，从1984年2月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总书记作为保守的临时解决办法一事就可见一斑。已经开始的改革势头也因而重新中断了。但是，改革派的力量是比较强的。所以，1985年3月契尔年科死后，戈尔巴乔夫就掌握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戈尔巴乔夫撰写的题为《我们国家和全世界需要改革和新思维》一书在我们的政治局会议上几次遭到奚落，到1987年才终于大量出版，尽管如此仍不断脱售。戈尔巴乔夫在这本书中写道：“我们毫无成见地真诚地认识到：国家直接面临一次危机。我们是在1985年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上获得这一认识的。在那次会上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确定了改革的方向，从原则上制订了改革方案。”

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会实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一方面，他认为苏联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民德根本不存在，或是还不那么明显。另一方面，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蓝图根本不做任何深入的思考，而这幅蓝图却是戈尔巴乔夫为代替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模式作为一种选择而描绘的。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成为，而且将永远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模式的代表人物。

1986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新职务后第一次访问民主德国。他的讲话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政治观点同昂纳克之间存在着差别。当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展示成就并把所有的问题都缩小到认不出来的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在一架被我们丢在一边的键盘上用力弹奏起来："在（苏中二十七大）党代表大会上"，他说道，"笼罩着一种高要求的气氛。在大会的讲台上，公开谈到我们的问题和缺点……有人会问：我们没有把自我批评做过头吗，我们不是有点近乎反共宣传吗？不，我相信，我们没有做过头……如实地估计已经取得的东西是制订建设性规划的出发点。"他还补充说："我想强调，加速的思想并不是幻想。它产生于对社会主义可能性进行冷静的分析。"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是觉得太过分了。但是，跃跃欲试的大有人在。

埃里希·昂纳克不包括在内。在他身上越来越滋长起一种他当年批评乌布利希的特性。埃里希·昂纳克的这种特性就是越来越自我欣赏。对他的政治决策施加集体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产生这种情况主要也是由于外部对他的影响，那就是绝对不能离开他的职位。从阅读内部关于联邦德国各党派领导人访问的材料来看，我认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态度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昂纳克作为对施密特的回访去联邦德国以后更是如此。当时他在那里和一位新总理见了面，这就是赫尔穆特·科尔。

东西方人士对这次访问的期望很高。在昂纳克访问之际，《星》杂志发表了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公民中进行的民意测验。我对测验的真实程度不抱怀疑态度。提的问题

是："您认为，通过民德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访问，两个国家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吗？"民德公民给予肯定回答的占85%，而联邦德国的公民只有48%。51%的民德公民和49%的联邦德国公民认为，主要会对旅行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他问题是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对民德公民还提了裁军问题。

从今天的发展来看，某些人对那次会见的评价还是低了一些。对埃里希·昂纳克来说，这是他工作的胜利，是他平生的胜利。在长期分裂冷战之后，在某些记者狂妄地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概念常年加引号之后，到1987年9月的时候，联合公报对这次访问记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一致认为，两个国家互相尊重对方处理内外事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这一原则得到重视的条件下，保护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就。谅解和务实应当是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和有实效的合作的准绳。"

双方重申，本着人的利益放宽旅行和访问往来的规定。双方欢迎已经达成的关于降低私人旅行往来车票票价以及德意志国家铁路和联邦铁路过境车票票价的协议。双方就旅游和最低兑换额，友好城市和加强体育交流等问题发了言。此外还讨论了人道问题以及家庭团聚的问题。关于这一切，《新德意志报》刊登这样一条醒目标题是有道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申愿为欧洲的和平共处做出特殊努力。"

在科隆，埃里希·昂纳克与联邦德国的经济专家进行了会见。1987年8月25日，埃里希·昂纳克收到了克虏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贝特霍尔德·拜茨祝贺他75周岁生日的贺信，贺信说他这个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其中写道："在我

们之间正在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成一种相互尊重和敬重的关系。”当埃里希·昂纳克向联邦德国300名大中型企业的代表讲话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听众也是这样想的。

过去他也曾在萨尔的家乡有过重逢。甚至乌多·林登贝格也和民德国务委员会主席有过小叙。在他那首《开往潘科的专列》一曲中用讽刺的手法颂扬了埃里希·昂纳克。送给昂纳克的吉他琴也和早先转给他的那件破旧皮夹克一样，都在民德的林登贝格崇拜者那里安顿下来。昂纳克的回信以《夹克合身》为标题登在1987年6月25日的青年团报《青年世界》上。信中说：“您寄给我的皮夹克，让我感到惊喜，对此向您表示感谢。当然这是一种外来的爱好，但就夹克本身来说是合身的。”接着又打了个比喻说：“如果我理解正确，它就是摇滚音乐的象征，象征着青年们有意义的生活，没有战争和战争危险，没有教育困境和失业，没有反共亲法西斯主义和排外情绪。”信的结尾写道：“因为您有时也谈到我从事音乐的经历，特送给您一支芦笛。祝您练习愉快。”之所以送他芦笛，是因为昂纳克过去在萨尔的一个芦笛乐队里任过司鼓，而林登贝格却想利用司鼓的光荣历史去说服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意他在民主德国巡回演出。

我认为，埃里希·昂纳克引人注意的联邦德国之行面临着他平生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无法肯定的是，他是否真的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到年轻一些的人手里？他在民主德国——虽然今天仍有很多人持不同的看法——一直是受群众欢迎的。他就应该在这个时候从他的最高领导职务中解脱出来。他已经无法胜任戈尔巴乔夫时代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任务。他似乎是觉察到这一点，可他却不考虑自己的情

况和政治能力，却去考虑那些不断地被东风刮过来的新情况。埃里希·昂纳克并不拒绝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却对那里的发展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多而是少了。他感到自己更加倾向于苏联社会中的保守势力。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新德意志报》用一版多的篇幅把列宁格勒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写给《共青团真理报》的一封信以“我不能放弃原则”为标题不加删节地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在苏联，同时也在民主德国引起了矛盾的反应）只能理解为，那些对戈尔巴乔夫持敌视态度的势力试图阻止苏联开始的改革。在这封信上稍许花些时间是值得的，因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上以显著地位全文发表这件事说明政治局内以昂纳克为首的当时还仍有势力的那伙人的精神状态。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原话是：“镇压，这个今天普遍议论的题目，已经控制了一部分青年，并且阻碍着客观地看待过去。这方面的例子是够多的。”不管是苏联的保守势力，还是昂纳克一伙人，都不可能理解，这是对斯大林迫害进行一次固然是痛苦的但在历史上是必然的清理工作。受迫害的善良人中绝不仅仅是苏联公民。一些艺术作品，像电影《悔恨》，那个时候在民德就不准上映。但是，剧作家沙特罗夫的作品竟也遭到尼娜·安德烈耶娃的非议，而且果然也在我们这里受到冷落。在我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那几年里，我和沙特罗夫有着密切的接触，那个时候，他还向我介绍了安德罗波夫政策的解脱作用。在这方面，我几乎天天处于很大的内心冲突当中。一方面，我早已向苏联同志明确地表明了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积极态度。但是另一方面，我同昂纳克以及他那伙人在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又未进行全面对抗。

特别重要的是，埃里希·昂纳克——正如他自己认为的——是斯大林消极形象的纠正者。所以，当尼娜·安德烈耶娃在她的文章中大段引证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时，他就自然会是点头赞许了。下面就是摘引的段落："他是一位突出的人物，在我们这个严酷的时代里，在他生活经历的时期内是一位令人感到佩服的人物。斯大林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博学多识和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斯大林急躁、粗暴、处事说话都毫不妥协，甚至像我这样一个在英国议会里磨练出来的人也难以与之对抗……读他的书感到一种巨人的力量。斯大林的力量如此之伟大，在各国和各个时期的领导人中，无人堪与他媲美……没有人能抵制他的影响。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大家像喊口令似地整齐地站了起来，而且奇怪的是我们都把手放在裤缝上。斯大林具有一种深邃的透彻的合乎逻辑的理解能力。他之所以是一位无法逾越的大师就是因为在艰难时刻他能走出困境……他是一位用敌人的手来消灭敌人的人，那就是说他迫使被他公开称作帝国主义的我们去战胜帝国主义。他接管的是老式步犁的俄国，遗留下来的却是个掌握原子武器的国家。"尼娜·安德烈耶娃的结论同昂纳克正好一模一样："这种褒奖式的评价出自一位大英帝国真正维护者的手笔，用伪善或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词是无法解释的。"但是，斯大林的这种性格与他历史上起的作用又有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的慈父般的领袖和暴君之间的致命矛盾所造成的悲剧，她又说了些什么呢？

不，昂纳克对安德烈耶娃的思想产生好感只能从他的历史观上去找。完全不知内情的民德邮政部长根据昂纳克的安排宣布禁止发行苏联的《伴侣》杂志，同样也说明这样的情况。这本在民德深受欢迎的杂志，在我们这里出现转折以后

又重新允许发行。该杂志以“没有斯大林会有希特勒吗？”为标题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昂纳克的眼里认为是损害了苏联和民德的关系。

昂纳克的这种斯大林观来自什么地方呢？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上出现了重大转折，第一次公开清算斯大林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固然是与苏联共产党的结论相衔接，但从一开始就把讨论限制在党内。苏联同志提出的论断和完全不相干的确证联在一起。那就是说，民主德国未曾有过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确实未曾发生过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严重程度的破坏党内民主和破坏政治原则的情况。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像它的苏联姊妹党那样流尽了血。在我们这里既未有过斯兰斯基案件也未有过拉吉克事件。据我们今天所知，某些同志，像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其中有过重大牵连。当时的一些事件在我们这里还是有需要彻底澄清的地方。一些由于诬告被捕并受到处罚的同志已经公开给予平反。苏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的那段时间，正是昂纳克一直略而不提的时期。他说什么，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56年的第三届党代会上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却不考虑，当时的结论对我们党来说是多么不深刻，而且后来在党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影响到国内的气候。

任何有关失误的讨论都被封锁起来的做法，直到1989年秋一直阻碍着进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清理工作，这就是说无法找出在我们这里出现的曲解社会主义的根源。50年代中和60年代中，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传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不

同解释，就像西欧共产党的不满言论和另外一种社会意识一样，都被当作是应当受到诅咒的叛“经”离“道”。危害制度的内部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外部阶级敌人勾结内部反革命施加的影响。

政权机关独立自主，党的领导机构要求控制全过程。党内的公开讨论限制在对诸如统一团结等空洞的概念上。阶级觉悟的标志已不是当年的信任党，或是信任创造历史的工人阶级，而是信任党的领导——何等悲剧式的简化！

国家机构逐渐转变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派出机构。政治局原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有责任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现在却把中央委员会变成了思想绝对一致的表决机构。怎么搞的，我们为什么竟会容忍这种事呢？由于在经济、政治、宣传和舆论等方面缺乏民主监督，甚至在司法部门也是如此，这就会逐渐地产生主观主义，以致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纠正，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内部改革。存在的问题都上不了议事日程。这种气氛限制了很多人的创造性和个性，而导向机会主义、惰性和听天由命。有些同志已经觉察到这种无所不包的权力，但也无能为力。采取反对态度的人数在增加，他们不在党团有影响的地区进行活动。

科技文化界赶浪潮的倾向是被迫造成的。我国的科技文化知识分子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令人痛心地走上了出埃及这条道。所有这一切都对社会生活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每当“几十位党的领导人在发号施令……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时而被召集起来向领导人的演说鼓掌欢呼”时，罗莎·卢森堡就在革命运动内部及时警告当心危险。她把这种情况称作是“一种集团经济——虽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

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小撮政客们的专政”。

我必须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这种历史的警告置若罔闻呢。对所有这一切，我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在后来认识到这一点之前，只是对那么长时间的沉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抱歉感。虽然是很迟，但我还是毅然行动起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的未来多么需要依靠克服那种渗透到社会当中的僵化现象。

昂纳克时代怎么会破产了呢？

现在把我开始时所表达的一些想法继续讲下去。他的失败在于一次极其矛盾的试验，本想建立一种可靠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更多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社会，为整个人民创造更加富裕的生活水平。在这个问题上，我曾思考很多。这种试验就失败在斯大林主义的幻想上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幻想上。

这种试验之失败，就在于固定在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上，这是一种列宁去世后在苏联形成的制度。埃里希·昂纳克就是和这种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他的思想从未离开过这种制度，或者更好的说法：再也不可能脱离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在他身上的烙印之深，使他不可能再创造出什么别的东西。他确实热爱我们的国家。在所有的错误当中，在所有由他承担的主观过失当中，有的过失也必须在我们当中寻找根源，从积极的方面讲，其中不少错误都是为了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带进共同的德意志未来。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如此对待他，使我很难过。在夏里特医院泌尿外科再一次动过癌症大手术以后，1月29日星期一早晨7点钟的时候，检察院和刑事警察局的代表从医院大门口把他带走了，并且送进了柏林—鲁默尔堡拘留所。他只

能向他的夫人玛戈特和其他家属做了简短的告别。即使这样的告别也还是在猎奇记者有损尊严的闪光灯下进行的。

最初，检察院要把这位77岁的人以叛逆罪、渎职罪和受贿罪送交法庭受审，根本不考虑为昂纳克动手术的医生彼得·阿尔特豪斯教授出具的不适于拘留的证明。为昂纳克辩护的著名律师沃尔夫冈·福格尔教授请求缓期拘留，第二天得到同意。阿尔特豪斯教授对新闻界说，埃里希·昂纳克精神抑郁，他很难应付目前的事件。他的精神状态由于手术受到很大影响，也有可能引起供血障碍。

另外，阿尔特豪斯教授通知说，有关的“诊断证明”已于1月27日，也就是昂纳克出院的前两天已通过律师福格尔教授送交总检察官。直到星期日晚上还有可能把昂纳克交托给由基督教会领导的希望之谷疗养院去给予照料。但是，总检察官没有满足阿尔特豪斯教授提出的免予拘捕的请求，而是就在那个星期一又一次向人民议院申述了要求逮捕昂纳克的理由。当提出质问，申请缓期逮捕的情况怎么样，他回答说，他可以对此负责，他很了解国际上的情况。第二天，主管法官克服阻力说服大家同意了医生的鉴定和建议，而这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可能的。

埃里希·昂纳克和他的夫人由牧师乌韦·霍尔默作为私人关系接到教士住宅去住。乌韦·霍尔默是贝尔瑙县洛贝塔地方希望之谷疗养院的院长。作为无家可归之人完全应验了基督教会负责人的辛酸话：这是一场悲剧，几个月前还向他热烈欢呼的那些人就不能为他至少弄个只砖片瓦吗。我也感到这是让人丢脸的量小德薄之见。我相信，文明世界对此只不过是摇摇头。已经走向民主人道目标的国家没有必要这样做。

基督教会的态度多么富有人情味，看来由于他们人道的表示固然也会受到强烈的攻击，但是大多数人对教会的关切心情还是理解的。我也对教会的决定怀有感激之情。

牧师乌韦·霍尔默在一份通告中向希望之谷疗养院的朋友们介绍了教会接纳昂纳克的动机。当我看到这篇文字时就想：还是教我们容忍的教会，我们共产党人就无法做到。

牧师霍尔默的声明原文如下："您们肯定也已获悉，一段时期以来，埃里希·昂纳克和他的夫人住在我们这里。对此，有人向我表示惊奇，有人诧异，有人恼怒，甚至表示憎恨，但是也有理解和鼓励。因此，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决定向大家、我们的朋友们解释清楚：

——我们是通过教会领导提出接纳请求的。教会领导告诉我们，国家机关不可能在他们的范围内安置这对夫妇。

——我们接纳他们，并不是干预对昂纳克先生的司法程序，也不是对他进行判决。那是法院的事。

——从1990年1月31日，埃里希·昂纳克必须离开万德利茨那天起就无家可归，也就是头无片瓦。另外，他是两次大手术后的病人，而且已经是77岁。因此，他是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在洛贝塔有一座耶稣基督的塑像，就像主邀请众人，并向你们召唤：'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牧师博德施文立起这座塑像，并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你们不要为我拒退任何人。'我

们的主要求我们仿效他接受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想到采取这一决定，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去学习耶稣的榜样，学习耶稣在税吏扎克豪斯处留宿的例子，遵守主关于热爱敌人的诫律，耶稣吩咐我们祈祷：‘宽恕我们的罪过，正像我们免了人的罪。’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这样祈祷。我们相信耶稣指教门徒的话，也适用于我们。我们不仅要传基督的福音，而且也要按耶稣的榜样去做。

——没有人因为这次接纳而失去护理床位，护理人员也没有失去住房。昂纳克住在我们这里属于私人性质。但是，这一决定是洛贝塔的领导人员做出的，并且得到了多数居民的同意。

——我们家做出这一步并不是出于对旧政权制度的同情。我们10个孩子当中，有8个已经提出升高中的申请。尽管他们的分数都是优良，但没有一个孩子被录取。我们心里并不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我们按照主的意思真的给予宽恕。我们也已经体验到，即使没有考上高中，主也使我们的孩子们很快活。

——使我们感到震动，甚至害怕的是，某些人的反应充满了仇恨。我们认为这对人民的新开端不是好的出发点。我们要鼓起勇气走向新思维，那就是清醒的爱。

——如果现在把过去所有的弱点、错误和罪行都推到一个人身上去，我的夫人和我则认为应当反过来看这件事。我

的夫人常常从学校的家长会上非常沮丧地走回来，并且说：‘我又是唯一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几个忠实于路线的积极分子对我进行攻击。多数人都不吭声。’如果我们不学会从自己身上找过错，那我们就不可能克服过去。不是只讲转折，而是要转回头。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忏悔我们的不是，虽然现在回想到成年节、军训、选举以及类似的事情，我也不会说不做任何形式的妥协。新的方向已经宣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非基督徒也许可以一起走爱和宽恕的路，以便把仇恨的毒素从人民当中排除出去。

——我们坚信，对我们最为重要的是，本着真正民主的基本立场尊重别人的信念，即使是同我们的信念是对立的。我们恳求公民们支持这一民主的决定，我们请求宽恕、人道和善良。

我觉得，我的‘声明’现在几乎已成为‘号召书’。请您们原谅吧，我已为此花了大力气忙碌奔走，而且我坚信，这件事不仅仅是，而且不主要是为了埃里希·昂纳克先生，而是为了我们大家，为了您和我，以及我们的人民。”

昂纳克时代就这样结束啦。但是他的个人命运，以及许多其他同志们的命运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飘浮在新国家的上空：我们能够完全做到公平合理吗？

三、万德利茨症候群

万德利茨小镇位于柏林的北边，离市中心有半小时的乘车路程，属于法兰克福／奥得专区贝尔瑙县。自1960年以来，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就住在这里，或者更明确的说能够住在这里。我不知道，万德利茨人是否承认这块隔离保护起来的森林居住区属于他们地区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围墙里边的“沃尔沃格勒人”过的生活似乎太过于陌生和捉摸不定，在当地几乎看不到他们。党内决定进口比较经济的但来自西方瑞典的“沃尔沃”牌轿车代替费油的苏联“契克”牌大型高级轿车作为政治局的公务车。自那以后，便从苏联的城市名字伏尔加格勒转化出“沃尔沃格勒”这个别名。在我看来，万德利茨人和“沃尔沃格勒人”都各过各的日子，彼此之间很少了解。如果把这种小气候与国内的事件相比，这正是本来存在的问题。

我在万德利茨森林居住区也住了九年之久。这个地区就是一种带有神秘气氛的远离现实的象征，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隔绝的象征。许多典型的社会病症在这里融会在一起，我就把它称作为万德利茨症候群。

把这些情况写出来使我很为难。什么原因使我对这种生活保持沉默呢？是怯懦还是习以为常已经司空见惯了呢？也许两者都有。但是这种沉默今天对我们的压力更大。我倒是应该认识到万德利茨是个警告讯号，而且应当向领导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诚然，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我总算拖了四年之久才搬进

万德利茨。当时就有一条1960年5月31日通过的决议，规定凡在柏林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必须住进万德利茨。

当我还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能因为我是个青年团干部就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可能我和别人不一样，哪怕是随随便便也从未问起过，选进政治局是不是就能在森林居住区分到一栋小楼。直到1980年，我一直住在柏林—奎佩尼克区萨尔瓦多—阿伦德居民区。只要时间允许，我在那里经常参加居委会的活动，甚至还上街采购。每天清晨5点45分钟以后就围着米格湖在森林里漫步。

最重要的是，我生活在群众之中，可以比较准确地感受到群众日常关心些什么事，而且根本不知道与世隔绝的苦恼。当我1980年搬进去的时候，也许还可以推迟采取这一步。可是后来，我当上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时候，想躲开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在那样的职位上想在警备森严的大墙以外安家落户，原则上是非比寻常的事。

修建万德利茨村从50年代末就开始了。在此之前，党和政府的首脑就住在所谓的“小城”内，这是位于潘科区内与尼德舍恩豪森宫为邻的小区，进出该区只能凭一种特制的证件。这个马雅可夫斯基圈圈内的小住宅区在冷战的年代里成了西方多种用途的流行口号。潘科就是“东德政权中心”的同义语。另外还有诸如“潘科的山羊胡子”，“潘科的错误决定”，“潘科阴谋”等等之类的说法。潘科是“中德恶魔鬼域”，后来转变成里根称苏联的“同义语”。

“潘科”的比喻维持了很长的时间。甚至当这个受到精心照料的居住区已经对外开放，而万德利茨已经进入要闻栏

的时候，潘科还仍在“其中”。乌多·林登贝格让他的著名“专列”开往那里，并且想象有一位住在潘科的埃里希·昂纳克。他穿着磨破了边的皮夹克，愉快地哼着德国摇摆文化老歌手的流行歌曲。

同时修建万德利茨居住区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必须回想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1961年8月13日以前，也就是冷战中期的时候，柏林当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1953年6月17日的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认为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却没有真正分析过它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斯特凡·海姆的小说《六月里的五天》对我了解这次事件有很大的启发）。这一事件的后果就是对民德政要的安全考虑更加突出了。最后，民德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副总理奥托·努施克在奥伯鲍姆桥从他的车子里被绑架到西柏林。在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抗议下，两天以后才被释放。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又一次促使政治领导人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我知道，某些政治局委员认为迁往万德利茨的决议是安全主义对个人生活讨厌的干预。我就经常听到赫尔曼·马特恩，保罗·维尔纳或是阿尔贝特·诺登等人说过，他们非常不愿意从潘科迁往万德利茨。在我们党内的所有问题上，甚至在个人生活问题上也都是：决议就是决议。

万德利茨最糟糕的就是那道墙，向老百姓保密的一座小城。每天早晨出去走走都出现在眼前。这道墙估计有五六公里长，粉刷成绿色，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警卫团负责警卫。这道墙给我的感觉是束缚、隔绝，还有单调。每当我空下来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每天工作14到18个小时以后，还有什么时间呆在大墙里边呢？最好的时候就是过周末，因为我也没有乡间别墅。平常工作的日子里，

万德利茨对我来说只是个睡觉的地方。

这种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做法就会使路过绍斯湖的人想入非非。我很理解这一点，因为只要不让往里边看，就会产生揣测。所以，人们就在谈论什么政治局委员“买东西不花钱”和有国外帐户等等。对此我只能说，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户头。我的工资收入整整5500马克。我们买什么东西都要支付民德马克，虽然那个“商店”是我所知道的万德利茨生活中不光彩的一章，这件事我还会谈到。自然是更没有什么镀金浴缸。我们也没有经常谈及的家用游泳池。如果领导上把自己封锁起来，这样一些说法也只好由它去了。事实上是有一个医疗、饮食和自由活动的综合服务区，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家属都可以随便去。

民德的《电视新闻》，随后还有联邦德国的电视台都播放了当时已经对外开放的万德利茨的情况介绍。看了以后想法很不一致。我早已注意到，第一次到万德利茨“圈内”来访问我的朋友们，大多数都感到吃惊。他们显然是认为豪华了一些。

另一方面，许多民德公民把电视上介绍的情况同他们自己的住房比较了一下，尽管有住房建筑规划，可惜他们的条件还是很差。

万德利茨小区日常生活中特别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住户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在这个问题上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霍斯特·辛德曼。我到万德利茨之后不久，他便表示要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去。他竭力想让我对这次访问产生兴趣。当地有个漂亮的湖。我的儿子可以去玩水上滑板，而我们也就有机会谈谈我们的

事。对这样一次很有希望的邀请，我自然是接受了。但使我感到纳闷的是，邀请一直没有具体日期。好几个月以后，辛德曼才顺便说了一句："你知道吗，埃贡，你不到我这儿来会更好些。埃里希·昂纳克太爱猜疑。"这是绝对明确的语言。我问我自己，像他那样一位老练勇敢的同志，对这样的约束竟会如此容易地就忍受了。但是，我很快也忍受下来，而且很晚才得到解脱。

埃里希·昂纳克自己却保持着一种牢固的友谊，那就是同京特·米塔克。这种关系使政治局很多人都感到不安。这位总书记，自己并不是一位有经验的经济学家，盲目相信米塔克的经济运算。他可能也会估计到，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向他和盘托出，但他丝毫不动声色。相反，任何时候他都依靠米塔克。直到仕途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仍拒绝一切忠告——可能是害怕面对事实——始终未对他的经济书记加强监督。

1962年，米塔克35岁的时候，便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四年以后已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他无疑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才能。1951年当他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时便以经济师的学位崭露头角。

1963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所谓的"国民经济规划新经济体制"，其中某些重要部分即出自他的手笔。京特·米塔克多年来都是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基本支柱。当他在70年代前半叶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这段时间称为"午间休息"①时期。可是后来又苦恼

---

① 德文为Mittagspause，亦可译作"米塔克式的休息"。德文米塔克，原义是"午间"的意思，这里是个双关语。——译注

地想到：啊，这段时间未免停顿长了些！瓦尔特·乌布利希时期，米塔克提供的错误意见所造成的不幸已经开始。昂纳克重新启用经济学家米塔克为党的经济书记时，这种不幸仍在继续发展。

随着昂纳克对米塔克的盲目信任，米塔克的自负虚荣感也在增长。他坐在政治局里除去当昂纳克的好学生以外简直不做任何事情。米塔克的日程表主要取决于是否接到总书记的电话或是有什么邀请约定的事。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同别人打交道时会使人受不了的。

星期三下午和周末一天，昂纳克和米塔克通常都是在绍弗海德打猎。最近几年当中的这种男人之间的友谊，周末时也去德雷维茨，到那里去杀鹿。

不要因此对我产生误解。对这样一种友谊，我有什么好反对的呢？我甚至还希望在政治局的同志们之间有更多的接触，就像我在青年团工作期间的那种友好气氛。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只要昂纳克和米塔克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致于形成派别活动就行了，总书记是禁止别人在我们当中搞派别的。在一起会面时，很多问题都事先讨论好了，并事先做出了决定，然后拿到政治局的会议上，或是书记处去办理。从米塔克对其他人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谁受到总书记的宠爱重用或是产生了猜疑。我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会如此亲密无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后来当我以总书记的身份有一次和昂纳克谈起来的时候，我问他，他是否现在已经看清，他的个人不幸是与京特·米塔克紧紧联在一起的。埃里希·昂纳克只是沉默不语。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观察万德利茨那段时间，我就会想到小区“圈圈内”的商业区。正如那道一人高的绿色围墙一

样，这座商店也把我们同“外边的”人隔开了。正式的说法是，这里供应的高级商品都属于国内用民德马克可以买到的高档物品。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有很多产品都是西方生产的，专门进口拿到这里来出售。这些都是用民德马克没有地方能买到的。这里有一种双重人格的问题，对此我也无法为自己开脱。供应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我们认为差不多是正常的，可这绝不是全国的正常标准。住在万德利茨的大多数家庭确实是仅仅买给自己用，可是少数从外边来访的家属也利用这种条件为他们自己以及朋友熟人进行采购。

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商店使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看不到民德国内的实际供应情况。谁如果几十年一直受到特别优待，那他对“外边”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条件也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体会。

我当选总书记以后过问了这件事。11月7日，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之前，政治局根据我的动议做出决定对这种购物中心也实行民德国内通常的供应。

我几乎不相信，万德利茨的供应问题会得到澄清。在此期间，有位民德新闻界的代表访问了小区，并形成了一种判断，因而一颗新的炸弹爆炸了。博恩斯多夫对外贸易协会“论坛”的工作人员向公众透露，某些商品悄悄地从万德利茨货架上消失了，并且存放到别的什么地方。这就是说，新闻报刊介绍的那些品种与购物中心平日供应的东西不是一回事。这怎么能让人不恼火呢！我认为这种欺骗舆论的做法没有别的解释，这只能说明某些集团势力企图使新领导的政策以及代表这种政策的总书记失去威信。这一企图侥幸成功了。可是今天我还要问，我为什么会对这样一种欺骗伎俩采

取了容忍的态度。对此我只能说，我和其他公民一样，只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的。

如果我当选以后立即决定搬出万德利茨，可说是实现这一决心的最好时机。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关心这些事。我的夫人在这样的问题上倒比我果断一些。她把这件事揽了过去，在柏林尼德舍恩豪森区马耶考夫斯基大街找到一栋房子。房子固然是在过去的潘科“小城”内，当年就是从这里搬到万德利茨去的。但是今天已经没有隔离墙。这里是公开的地段，可以和群众往来。这正是我所关心的。一个礼拜之内，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看房子，我的夫人已经在忙着搬家，于是我们就搬进新居。民德电视台认为这件事值得上电视，就把我那个新环境里的家做了介绍。

也许我要在这里说：很多地方要归功于我的夫人。没有她的理解，我既不能在莫斯科苏联高等院校学习毕业，也不可能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党团和国家的工作任务。在过去的30年里，她固然一直在工作，而且今天还在柏林师范学院进修。可是，她的丈夫如能帮她分担家务和子女教育的重担，那她的工作生涯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今天考虑到几个月来我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正是她从精神上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支持。有那么一位记者，最近访问我们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埃贡·克伦茨认为最好的就是他的夫人。我无法，也不愿意反驳他。我们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托尔斯滕，28岁。小的叫卡斯滕，18岁。一再让我高兴的是，他们都已生活自立。托尔斯滕攻拉丁美洲学。卡斯滕即将高中毕业，想当记者。属于我们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的儿媳安格拉，她在柏林学教育，一度想当德文和英文教员。我

们四岁的孙女卡特琳娜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她使我们全家有了生气。

我也不想向我的读者隐瞒住址，这是因为带来的烦扰已不可能再增加到哪里。自从我轻率地同意电视台播放以来，反正住址已经是都知道的事。图片报甚至联想到棚加乐①。它们的明星记者中有一位是个可靠的持不同观点的人，他要在另外的地方和我重新约见一次，因为我那座房子的上空每分钟就飞过一架特格尔机场的飞机。我倒是希望记者们比我更加对嘈杂声过敏，那我就有安静日子了。

但是，我也并不认为，我完全讨厌别人知道我的住址。我收到很多信件，其中有些信是坦诚的，我非常高兴看。处在这种对我和对我的家庭都非常复杂的精神状态之中，我从这些信里能够获得勇气和信心。一位挪威人写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是您的朋友，如果你是忧愁，可以给我写信。"他确实用了"是"字。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理解我会说这样的话：当我失去党和国家职务时，我必须重新学会日常的活动。例如我突然不再有公车可乘。过去我喜欢自己驾驶，今天我却害怕开车。宁肯乘公共汽车，或是徒步。我甚至自己去邮局取信件，或是时而在商场排队买东西，必要时还要在房前铲雪。唯一的一件没有改变的事，就是我仍在新鲜的空气中漫步。过去是在万德利茨的树林里，今天就在宫廷花园旁边。好就好在不再是身旁老有一道一人高的绿色围墙。就像柏林墙一样，万德利茨围墙同样也倾倒了。两者我都有份。我已经学会，如

① 欧洲国家有一种简易别墅称棚加乐，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地基的避暑用的简易平房。——译者

果大墙倒下，人们就会感到比较自由，就会超越他们的老框框。我并不想把自己排除在外。

有时请我去联邦德国参加电视专题座谈或是新闻话题等节目。多数情况我都是从特格尔机场乘飞机前往。我从沃兰克大街的边境哨卡过去，离我的住处不是太远。有人说，边防人员今天比过去友好多了。这肯定是对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在新的条件下显然会使他们愉快许多。穿蓝灰色制服的海关人员在大墙开放后不久便加强了检查，以便防止把民主德国买光，民德公民充分理解这一点。每当他们把蓝色的民德护照退还给我时，总是微笑着。也许他们在想：为什么不会是他？——最后是他把大墙打开的啊。

一天，我在飞机上读民德的晨报。马上有一条标题刺进我的眼帘："贪污和滥用职权——下一步还会暴露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过去和现在我都对这种欺骗群众的严重程度感到吃惊。我们可以在公开的新气氛中对事件进行讨论。这种事情对一贯宣誓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人民的悲愤痛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里发生的事到别的什么地方可能只会引起一阵冷笑。生活在民德的人们有理由把这样的事拿来同我们的理想同我们领导人的说教进行比较，如果他们……

从这方面来考虑，我所有的事，包括住在万德利茨的情况都没有什么会受到指责的。我并不提心吊胆，所有滥用职权和损公肥私的现象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揭露，凡是对违法行为有根据的揭发都请总检察官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我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当时还不了解全部案情。我又想起我所描绘的万德利茨"共处生活"的情况，当时彼此之间从不邀请访问。例如我就一点也不晓得同事们搞的"业余服务

部”，后来新闻媒介已有所报道。我丝毫也不知道那件令人气愤的事，就像报道所说的，京特·米塔克为了不使他的狩猎爱好受到干扰，竟让一家小工厂迁走。我知道，许多人不会相信我说的，可这是事实。

我感到成为悲剧的是，许多同志都同我一起参加了为撤换埃里希·昂纳克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他们表示准备和我共同承担个人风险。可是由于被指责犯有贪污罪和滥用职权罪，他们被拘留审查。这些同志是：维利·斯多夫，哈里·蒂施，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甚至还有过去的建筑部长沃尔夫冈·容克。他是一件难以令人相信的阴谋活动的牺牲者，受到过中央委员会的处分。他曾指出水泥生产卡脖子的情况。可是，米塔克竟把这些说明中央经济规划失误的材料扔在抽屉里达数月之久。当事情发展到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时，容克受到了打击。昂纳克宁肯从国家机关方面找原因，也不愿意把党拖进去。这里所说的党就是：米塔克。

我认为，凡是侵权和违法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刑事制裁。但是，我反对任何草率从事的判处，反对用刑事手段处理政治错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共同行动的问题。不能让报复心理主宰我们，而是要树立民主的法治。这两天，我饶有兴趣地读到联邦德国政治家们发表的谈话，他们谈到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时，表示要本着“内部和解和重新开始”的精神。不要再搞思想恐怖，现在就必须用理智来迎接未来。不要再搞什么政治案件，多少年以后必然要重新为那些人平反。如果这样多的墙都已倾倒，为什么仇恨报复之墙不会倒下去呢？

四、过于迟缓，必受生活惩罚

10月6日，10时30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夫人赖莎陪同下在柏林—舍纳费尔德机场降落。埃里希和玛戈特·昂纳克迎接客人。但是欢迎仪式有些单调。埃里希·昂纳克说："热烈欢迎来我们这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们高兴到这里来。"教育部长玛戈特·昂纳克陪同她的丈夫参加这样的礼仪是非比寻常的事。

1986年，苏联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到民主德国来作客时，是由我的夫人陪同赖莎·戈尔巴乔夫。当时，我的夫人陪她穿过首都，向她介绍我们国家的成就。我认为两人相处很融洽。赖莎·戈尔巴乔夫非常有兴趣，而且想法同我们的公民进行接触。"她是一位热心肠的人，文化水平很高，对德国艺术和文学非常熟悉"，我的夫人同赖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见面后晚上就对我说了这些话。她坚信，赖莎·戈尔巴乔夫会设身处地为她的丈夫着想从旁辅佐。另外，我们也很快就认识到她为人之周到。她走后没有几天，就给我的夫人寄来了在民德一起时的照片，上边亲笔写着："为四月的美好时光表示衷心感谢。"

当时，玛戈特·昂纳克一直是站在一边。现在时候不同了。埃里希·昂纳克受到国内事件的冲击，竭力想改变反对改革的名声。所以，在舍纳费尔德机场就出现了成双成对的家庭照。

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埃里希·昂纳克的车队朝着贵宾下榻的潘科方向开进的时候，车子必须穿过由柏林人组

成的密密的欢迎行列。其中引人注意的是有很多青年人。过去，这种“站呼队”是老百姓应尽的一种义务，所以不受欢迎。但是，戈尔巴乔夫是受欢迎的，所以这种欢迎也就不当作义务去完成了。

戈尔巴乔夫自然会感到，他是在自己的场地上进行球赛。戈尔巴乔夫对热烈欢迎的场面和“戈尔比—戈尔比”的狂呼声感到喜悦，但他并不想让昂纳克对他的高兴产生误解。他说：“你们的国庆也是我们的节日。”这就把人们的振奋心情引到纪念意义上，而不是为了他个人。当他到达尼德舍恩豪森宫官邸后举杯寒暄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第二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官邸的大厅里同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成员会见。这一天大厅里摆成圆桌形。

在此之前，先由昂纳克和戈尔巴乔夫举行秘密会谈。原来规定只有他们俩个人参加，但还是把京特·米塔克拉了进去。这就再一次表明，埃里希·昂纳克既不依靠总理斯多夫，也不依靠政治局其他同志，而只是依靠京特·米塔克，他也陪同戈尔巴乔夫。国际部的朋友们向我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完全了解这一决定的内幕。

在随后举行的会见政治局成员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表现出友好的气氛。他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它的存在有助于大陆的稳定。他肯定了民主德国在经互会中超过平均水平的经济实力。这是民德公民勤奋的结果，工农业和科技文化发展的结果以及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德国进行合乎时代的改革具有最好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也引了他的一句世界名言：“过于迟缓，必受生活

惩罚。”

他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似乎他在试探，谁真正理解他。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民德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已经意识到如果民德发生变化将会影响到欧洲的政治平衡。东部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还有希望的话，他认为唯一的可能道路在于使民德转向符合本国条件的改革路线，转向改革，更多的是转向符合新思维观念的迁徙自由。

苏联的重要盟国之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国庆的政治形势自然使戈尔巴乔夫深为忧虑。他密切注视着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民德的形势发展，因为这与苏联国内的形势是不可分的。

5月间，匈牙利的边界向奥地利开放。这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起着讯号的作用。夏天，联邦德国驻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后来还有驻华沙的代表处都在难民问题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消息作为头号新闻传遍世界，对我们国家却是感到羞耻的事。大量逃亡的人群跑到奥匈边境，后来拥向捷克通往西方的边境站。

9月间，特别是莱比锡的抗议示威游行明显地增加了。反对派在形成。我国的摇摆歌手，作曲家和消遣艺术家于9月18日向舆论界提出了一项无法再明确的决议：“我们……为国内的目前状况，为许多老同志的大量出走，为社会选择的信仰危机，为党政领导人让人难以忍受的无知状态而感到忧虑。党政领导人看轻了现有的矛盾，而在坚持一种僵硬路线。”这就是抗议浪潮的“第一枪”。抗议主要来自，但不仅仅是来自艺术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个别的地方，工厂里已经出现罢工危机。

国庆40周年前夕的一段时间，可说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最复杂的时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一股洪流向我们冲来。党的领导人，还有政府领导人让人感到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这就使现有的冲突更趋尖锐化。我在陪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过程中就在想，我们的共和国决不会再像不久前的那个样子。

戈尔巴乔夫在等待埃里希·昂纳克的讯号。可是这位总书记在谈到民德的情况时，仿佛这个国家就像幸福岛一样。他介绍了我们要争取到达的新彼岸，介绍了在民德出现的具有重大价值的大型集成线路，介绍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所需要的尖端技术，介绍了从未像今天如此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介绍了巩固的全党团结一致和同人民之间的紧密信任关系。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从我的心中升起。我望了一下会议上同志们的面孔，对我们的尴尬处境做出如此脱离现实粉饰太平的评价，他们很多人都感到羞耻。非常明显，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大多成员一样，显然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民主德国40年的发展，怎么能把命运仅仅压在僵硬思想、错误评价和自以为是上呢？但是，我们这些更了解情况的人却缄口不语，甚至心安理得地根据政治局决定按照国庆40周年的口径大讲民德形势，因而我们是跟在民德政治事件的后面慢慢跛行，事件的自身动力很快就不再允许我们对其行使影响。“自下而上的转折”已经全面展开　而且进展迅速。

关于民德改革的讨论多半都是在基督教教堂里进行的。教会中德高望重的人承担起了本应属于国家而国家又无法发挥的作用。牧师在同公民们对话。政治局里对这一点是以怀疑的眼光在进行观察。其实是很多怀有良好愿望真心希望民德继续存在的人士在自愿承担义务，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去

考虑，反而顽固地认为“敌人在向内部渗透”。现在很多公民都在耽心民德会被买光，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教会，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对势力能够唤起多大的热情去克服我们的缺点和痼疾。但是，9月间我们还拒绝正式承认“新论坛”，并且包围了莱比锡尼古拉教堂。我们的政策批评者就是在这里聚会，并建立了星期一游行示威的传统。可惜必须指出，莱比锡的民众，当他们容忍“共和主义者”喊出亲法西斯的口号时，就失去了任何建设性的意义。

今天，我对同教会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进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会见固然有助于证明我们取得了成功的合作，但是一定要就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对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对话，比国家首脑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参加热热闹闹但毫不承担义务的教堂开幕仪式要有益得多。今天正在表明，恰恰是在这种复杂的时刻里，教会在我们国家中起着多么大的安抚作用。我坚决相信，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信任教会的这种影响能力，那时大多数老百姓的不安情绪和神经质状态已经达到严重的程度。听天由命和一筹莫展的情绪也在蔓延开来。

甚至很多党员也都忧心忡忡。他们生活在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他们每天亲身体验到的，和党以及新闻报刊正式让他们知道的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应当代表的看法，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如果长期推来推去不给解决，那么积累起来就是制度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即使在当时边界封锁的情况下，很多人每天都可以通过看电视与西部德国邻邦的

情况进行比较，也许这种比较并非事事都用客观的尺度来衡量。人们经常问起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解决极为明显的供应问题呢，高级消费品，水果蔬菜，零部件……这在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社会主义有伟大的理想，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生活水平上不去呢？地球仪上的大部分地区为什么竟成了民德公民的禁区呢？人的生命从生物学上来说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在最有活力的时期过得像个样子，而不是作为领养老金者拿到一本渴望已久的私人旅行护照时再去享受。人们不愿再去迁就现有状况，而是最终要独立自主地去参与塑造未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国庆前夕的形势就是如此展现在不怀成见的观察者面前。前来柏林参加国庆活动的有80几个国家的代表团，都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总书记或是党的主席率领。

尽管存在着听天由命的情绪，但在40周年国庆前夕，老百姓仍然暗地里怀着一线希望。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担心如果谈论过多这种希望就会成为泡影。人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也许是一种迹象，说明在民主德国也有可能实行改革。但是，当人们从电视上看完昂纳克的国庆讲话，并从中获得一种完好世界的印象之后，这种暗地里的期待便成为痛苦的失望了。昂纳克以后同戈尔巴乔夫进行内部谈话介绍民德社会情况时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完好的情景，但是这种情景已经不复存在。

《新德意志报》为昂纳克讲话加的标题是：“完成大业既要通过人民也是为了人民”。仅仅是在一个小标题上羞羞答答地承认了困难：“解决我们的问题，用我们社会主义的方法”。

埃里希·昂纳克回顾历史时提到一些与民德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人名。他们是：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马克斯·费希纳，奥托·努施克，另外还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约翰内斯·贝希尔，安娜·西格斯，阿诺尔德·茨威格和埃里希·魏纳特。接着就开始罗列他的成就："我们共和国今天已跻身于世界十大工业国的行列，是20几个最高生活水平的国家之一。对此，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国家的繁荣既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也不是靠牺牲别人获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几百万人的事业，是几代人的事业，在艰苦劳动中建设起来的工农国家，一个拥有现代工农业、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繁荣的科学文化的国家。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是一个世界体育大国。"《新德意志报》第二天发表时在此处注明"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坐在大厅里和电视屏幕前的大多数人事实上都承认民主德国的历史成就。但是，他们也愿意听一听日常的现实矛盾。他们肯定想让领导上了解这些矛盾，并认可群众有权公开讨论，以便找出一条走出社会危机的出路。大街上的抗议和"跺脚式的表决"就是明显的语言，所有这一切堪称筑墙以来最大的逃亡浪潮。

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埃里希·昂纳克也都漠然置之。"如果反对者们"，他放尖了喉咙喊道："现在以从未有过的程度污蔑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也并不是偶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40年，也正是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失败的40年。他们不会容忍德国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因为往昔受他们剥削的群众在这里证明，没有资本家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新德意志报在这里没有注明"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没有人还能理解这种抽象化的东西。这样的

东西离人们天天经历的事情相去太远。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处于危机之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也包括那些在共和国宫主席团第一排就坐的人，如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米洛什·雅克什和匈牙利的国家元首布鲁诺·费尔伦斯·施特劳布，托多尔·日夫科夫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体会、忧虑和难处。

某几个人肯定和昂纳克此时此刻完全有同感。另外一些人则会问，他为什么要用这种不学无术的态度惹怒众人呢。一些政治局委员，其中有京特·沙博夫斯基和我都想通过交谈在国庆讲稿中加进一些平衡的内容，增加一些看到问题的方面。但是，谁也没能真正对讲稿产生影响。

对我们国家怀有诚挚的感情，衣领上佩戴着民德国庆纪念章的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通并非令人不怎么紧张的讲话。

第三句话就谈到战后时期两国共同的发展道路，他说："在这条道路上有很多困难需要去克服。"戈尔巴乔夫谈到直线发展和急剧转折。他对"运动着的世界"采用具有本人特色的辩证方法进行观察，这与昂纳克讲话中制造的静止观察历史的气氛相比，使听众感到大为欣慰。他就是这样谈到民主德国的成就，但同时也谈到"民主德国和其他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他说，"既是由于社会不断继续发展的内部需要所引起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过程和革新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而且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并不怀疑，德国统一社会党……同所有的社会力量合作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能够解决那些由于共和国的发展而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并为公民们所关心的问题。"他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补充道："其实也就是开拓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可能

性……"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表示，划一和标准化的试验是属于过去的社会发展问题。我认为，他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观点，而且他也是指那些有的还很粗暴的表示要划清界限的言词，这些言词都是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一级，矛头指向克里姆林宫，反对公开性和改革。

但是，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特点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也正是进行合作的重要理论根据。

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现出明显的吸引力。他最后说："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对苏联的急剧变革怀有多大的兴趣。"他向大厅高呼：民主化，公开性，社会主义法制，参与国家一切事务，人民自由发展等等，这些口号与新的政策是密切结合的，而且也符合民德群众的觉悟。很多同志当天就对我说，他们认为，民德党政领导指望群众表面做到的事，有了这篇敏感的讲话就都给包了。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必须拿出看法，而且越快越好。

晚上，在"菩提树下"大街举行了青年团的火炬游行。40年前的10月11日，埃里希·昂纳克领导下的青年团就在这个地方集会庆祝共和国的建立，并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致敬。现在，10万身着蓝衫的青年团员参加了游行。设在洪堡大学大门前的主席台上站满了来自国内外的贵宾。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始至终在向行进中的青年招手致意。如果我说这次游行是为他举行的也并不过分。预料到

这一点并不需要先见之明。我很了解青年的情绪。实际上，“戈尔比—戈尔比”的呼声一晚上都没有停止过。我觉得，这位苏共中央的总书记把这一切不仅仅是看作对他个人的一种姿态。青年们要在民主德国实行政治变革，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主席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一信息，即使埃里希·昂纳克也是如此。可是当火炬游行结束后他登上车子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也有人对这种戈尔比呼声感到无法忍受，责问青年团的负责人：“难道就不能阻止？这全是组织工作的问题。”

但是，究竟还有什么好阻止的呢？庆祝活动结束后，早晨版的报纸登出这样一条德通社的消息：“10月7日晚间，柏林有些喧嚣闹事的人企图扰乱民主德国40周年的人民节日。与西方舆论相配合，他们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周围聚众闹事，并呼喊仇视共和国的口号。由于保卫和安全机构以及参加节日活动的人员保持镇静，蓄意挑衅未能得逞。闹事的头头已被拘捕。”

实际情况怎样呢？10月7日，18时在共和国宫开始举行国庆招待会。埃里希·昂纳克同维利·斯多夫和霍斯特·辛德曼，以及各国主宾在一张大六方形桌子旁落了座。昂纳克在祝酒词中表示，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有着坚实的基础。彼得·施赖尔、特奥·亚当、路德维希·古特勒，还有极其有天才的青年小提琴手安婕·魏特哈斯、著名男高音约亨·科瓦斯基，以及其他的艺术界名流都在共和国宫的各个大厅里演出精采的节目。路德维希·古特勒由于对政治局委员们的特权感到特别恼火就在晚会快结束的时候喊出了：万德利茨的灯光还在亮着。以前他也知道，如果需要解决问题，如何就能找到政治局。在离这里不算太远的施万台（奥拉宁堡

县）成立了以易卜拉欣·伯默为主席的民德社会民主党。在离共和国宫不远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几千青年人在聚会，用抗议来发泄他们的不满。令人吃惊的是，国家安全部对共和国宫靠施普雷河的一侧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当那些青年人拥向只被一条施普雷河隔开的"人民之家"时，维持秩序的人员受到很大惊吓，因为"人民之家"经常都是社会主义世界最高领导人聚会的地方。我在共和国宫内对发生的事情只是收到一些简短的消息，向我报告的全部过程都不怎么严重。我必须考虑的是，要保证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能安全度过。

我无法估计，这天夜里以及第二天10月8日，从这场看来是无害的抗议示威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普伦茨劳贝格城区拉开了真正的封锁包围圈。示威人群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挥舞着棍棒的警察队伍面前。示威者被警察扣留时受到侮辱人格的待遇。拖延了一段时间才给我送来的报告却没有提及这些情景的细节。我所了解到的具体情况都是从西方报刊以及艺术家们和对我信任的人给我寄来的信中逐字逐段读到的，这些人都有子女亲友受到牵连。我只是一点一滴地从办公桌上的报告中看到有关的真实情况。我竭力主张查明事实经过。不管是对柏林调查委员会，还是在圆桌会议上，我都对事情的发生深表惋惜。虽然我绝对没有参与这些行动，但我还是要向民德的人民，特别是向那些因安全主义错误向内而牺牲者请求原谅。对此我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年轻的警察都是第一次与和他们年龄相仿的人在大街上处于对抗状态。谁做出决定说服他们相信，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些反革命分子，这是一种耻辱。他们一时不可能弄清楚事实真相。另外一些人对已经被拘捕的人暴露了人民警察所不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很多警察

都催促调查事情经过，而且在全国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群众和警察取得了默契和配合。

现在再一次回到10月7日那一天晚上。我认为游行示威是无害的，可是全国所处的形势却是高度爆炸性的。国宾的高级轿车大部分都在当天晚上就朝飞机场的方向开去。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再次看一看党政代表团领导人都在思考什么。在飞机滑向跑道起飞之前，他们从机舱窗口上向主人挥手告别。他们已经离开的共和国，非常明显已经进入决定性的日子。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登上汽车要去飞机场的时候，我不在场。据可靠消息说，他又一次向少数几位信赖他的民德同志号召式地高呼："行动起来！"

第 二 章

暂 定 的 接 班 人

一、“致我的朋友和战友埃贡”

1980年《世界领袖人物》丛书出版了埃里希·昂纳克的自传《我的经历》。尤其因为一直还没有一本系统叙述他生平的书，所以年近70岁的昂纳克欣然接受了出版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的建议。迪茨出版社用美术彩印纸印刷此书的民主德国版，这种光滑的纸钢笔字写上很容易被抹掉。1981年6月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很小心地把我的那本递给昂纳克，请他签名。在主席团里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力地在光滑的纸上写下：“致我亲密的朋友和战友埃贡。埃里希·昂纳克。1981年6月4日。”

坦率地说，对这一友好姿态我当时十分高兴。我很重视与昂纳克密切信任的关系，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在青年联盟受他直接领导，而且我很赞赏他的政治品质和人品。

我第一次见到昂纳克是在1951年，也和签名有关系。当时昂纳克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主席，在罗斯托克尼普顿造船厂的文化宫讲话。那年初夏，我们正为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作准备。战争结束六年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万

青年将第一次聚集在民主德国的首都柏林——这里是一片废墟，有的是期望，缺少的是粮食。选中柏林举办联欢节我们很高兴，因为各国人民中仍普遍存在对德国人的惧怕。一些报道含糊地说，在大家不熟悉的叫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东部有了反法西斯民主的新开端。对此人们仍然抱有很大的疑虑。我们愿意让大家了解，希望能消除成见，建立起友谊。当时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筹备委员会主席恩里科·贝林格（后来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至少可以对战后东柏林为接待来自104个国家的青年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感到满意。

我是作为家乡达姆加腾少先队代表团团长参加罗斯托克大会见到昂纳克的。那时我14岁，被柏林联欢节前那种难以形容的热情所感染。一群青年联盟盟员扛起昂纳克进入会场。他作了简短而激动人心的演讲，听众报以暴风雨般的鼓掌。他讲完回到主席团坐下，我拿着少先队证冲到前面，翻到印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昂纳克照片的一页——当时有这样的证件——请他签名。他很乐意地签上名，看着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像我现在坐着写书一样——问道："你也准备成为一个好的青年联盟盟员吗？"我毫不犹豫地以"少先队员誓词"回答道："时刻准备着！"在后来的很多年月，我都感到应履行这一义务。对这一时期我不感到后悔。经过这么多年，那本少先队员证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大多数朋友说我走运，大家都很想要昂纳克的签名，他受到大家爱戴。有时我们也听到关于他同爱迪特·鲍曼离婚，与后来的教育部长玛戈特·法伊斯特结婚的议论——由于昂纳克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关系，玛戈特认识了他。但这些谣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埃里希是个好人。

我是怎样到营垒这一边来的呢？因为我出生在科尔贝格，今天位于波兰，那么我究竟是怎么到德国这一部分来的呢？

我母亲在达姆加腾附近一个村子认识了她第一个丈夫。他是养牛的，按今天的话说大概是“具有牛奶加工知识的挤奶工”。他们结了婚，但这段婚姻不长久。母亲的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于1915年阵亡。我们用的是他的姓——克伦茨。

我的祖父住在科尔贝格附近，于是母亲带着小女儿玛丽亚东迁，去帮助祖父操持家务。我的父亲是母亲第一个丈夫的兄弟，他是一家商店的裁衣工。我的父母没有结婚，父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没有回来。我生于1937年3月19日，于是我对父亲的了解只是通过母亲的叙述以及幼年时经历的模糊回忆。

1944年战争临近科尔贝格时，我们回到达姆加腾。父亲的另一个兄弟的妻子死了，母亲便像以往在别处那样，在他那里料理家务。我们及时离开科尔贝格只是运气，使我们免受攻占科尔贝格城堡激战和乘德国船经波罗的海逃难之苦。

我是不是母亲的宠儿？也许是。在这困难的岁月，母亲把我看作她的希望。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从没有机会受教育，而以善良和真诚弥补所缺的教育。她倾囊相助陷于困境的人。母亲对我是名副其实地忘我牺牲，我是如此依赖她，任何想把我送幼儿园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本来我有三个名字：埃贡、鲁迪、恩斯特。恩斯特是我父亲的名字。但鲁迪是谁呢？埃贡就是母亲起的，她喜欢这个名字。很多年以后我已结婚，母亲还对我妻子说：“爱丽

卡，埃贡是个漂亮的名字，不是吗？”以后因为约阿希姆·沃尔格穆特写的畅销书《埃贡和世界第八奇迹》中的人物与我同名，我常被人嘲笑。这是一本青年读物，在民主德国脍炙人口。我能理解，因为这本有名的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她（克里斯蒂娜）把嘴凑到他耳边，比以前更小声地耳语道：‘你马上可以用你称呼我，埃贡。’”或者是克里斯蒂娜的叹息：“太妙了，埃贡。现在我们来数星星。”还不止这些影射。再往后，当《奥尔森一帮》——在民主德国特别受欢迎的丹麦侦探连续喜剧——中的一帮骗子胡作非为时，我不得不在任何场合忍受剧中典型对话的嘲弄：“真棒，埃贡，没治了！”但是母亲恰恰喜欢这个名字，这是她当时唯一能赶的时髦。

我曾三次入小学。第一次是1943年，我6岁，还在科尔贝格。当时各个州开学时间不同，所以当我到达姆加腾上学时，那里的学生已经学得比我多，于是我只能在1944年再上一年级。但是1944年的学年也中断了。之后，1945—1953年我上完了八年制学校。

在科尔贝格我们住在离大海只有两分钟路程的海滨街14号，住得很挤。有一间起居室，是没有窗子的小房间，我们叫它“内阁”，还有一个厨房。我们五个人——母亲、比我大21岁离了婚的同母异父姊姊带两个孩子和我住在这几间屋里。在达姆加腾处境好一些。那是一座僻静的小城，附近有个飞机场，或者说当时称它是飞行员站。在郊区为飞行员和家属造了带花园的住宅区。旁边就是里布尼茨。隔开梅克伦堡和波莫瑞的国界线穿过里布尼茨这个小城和达姆加腾之间。有一条界河叫雷克尼茨，还有一座过境桥和边境小屋，还是德国分裂成无数小国时期留下来的。1950年两座城市联

合成“里布尼茨—达姆加腾”，但波莫瑞和梅克伦堡从未这样真正联合过。

1945年苏军开进达姆加腾之后，飞机场成了开放地带。从那里我们拿来降落伞绸，做成小降落伞玩，妇女们把绸子缝成衬衫。

野战炊事车也随着红军开来了。我们总是闻到香味就去，每个孩子都分到一点吃的，也有那种大的很有味道的烤面包，因为带甜馅总有一点湿漉漉的。至今我还能回想出这种香味。在苏联兵当中我还认识了一个年轻军官，他把定量的面包和糖分给我，他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只要我闻到新鲜的牛奶味，便下意识地联想到战后在达姆加腾的岁月。逃亡地主的牛被拴在一起集中到市郊，但却没人挤奶。于是我的母亲——挤奶工的妻子就干开了，我们便有了牛奶、酸奶酪、奶油和黄油。黄油自然是淡的，因为盐在那时特别紧缺。

当然孩子们也到地里去拣东西。我们捡土豆或拾麦穗，那时常常带着剪子久久地等在麦堆后——一俟没人注意——干脆把麦穗剪下来。这样我们也有了粮食磨面烤面包。还有一种香味令人回味——烤土豆，一辈子都忘不了。

1945年初我染上重伤寒，在家躺了几个月。因为母亲自己也病了，我不得不短期住进医院。

上学的最初三四年，我学习困难。也许因为家里生活艰难，我必须帮助做许多家务：到树林里捡柴禾或去找可吃的东西。比如达姆加腾港口给附近一家糖厂卸甜菜，有时甜菜倒进港坞里。我们便削出长长的杆子，前端绑上一个钉子，像世界冠军一样在水里来回地杵，如果杵到甜菜就切小了煮成糖浆。

当我和母亲迁往达姆加腾时，姊姊玛丽亚带着孩子留在科尔贝格。她第二个丈夫是科尔贝格海军的厨师，后来调往弗伦斯堡。于是姊姊全家经过达姆加腾迁到西德。母亲和我1946年去那儿看过他们。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决定留下将是什么结果。然而母亲留恋达姆加腾，于是我们返回那里。之后我只匆匆见过姊姊一面，但那时我们之间已有很大的距离。

1946年大选，统一社会党的竞选名单是最强大的。但是我为了每星期挣5个马克，为基督教民主联盟贴竞选宣传画和跑腿儿，直到我的朋友阿尔诺·席尔使我改变想法。席尔的父亲曾多年在党中央工作，那时是统一社会党的县委书记，他成了我的“政治父亲”。此外他们家还常常留我吃晚饭，但不仅仅为了这个我才常去。席尔的父亲对我产生了重要深刻的影响，我无法也不想摆脱它。

在他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少年先锋队。1948年少先队成立时，母亲拿出一条蓝色被罩为我裁了两条少先队领巾。当初只有极少队员有蓝领巾，我格外地自豪。

我当少先队员第一个重要经历是收到奥托·格罗提渥的感谢信，因为我同其他少先队员为西德罢工工人募集了105马克。我的政治生涯似乎就这样开始了。我当上队旗手、队委会主席和友好委员会主席，参加民主德国第一个少先队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的西特诺。

在家乡我们少先队对市政府施加压力，使它改变一些街名。根据我的小队的建议，“新街”改为“菲利普·米勒街”。菲利普·米勒是共产党员、年轻的工会干部，1952年在埃森一次游行时牺牲。我们把“里布尼茨街”改名为“席尔街”——但不是我的“政治父亲”，而是反拿破仑民族解放战争中有名的英雄的名字。我们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只是

没能搞成游泳池，因为市里的反对意见太强烈——当然有很重要的财政原因。

我13岁时在学校已当上人民通讯员，为县里的《波罗的海报》工作。《达尔斯与雷克尼茨之间》① 要登载新闻和报道，我尽全力写稿，所得报酬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母亲久病不愈已不能再工作，每月领取45马克养老金，这在当时也很微薄。

1953年我从学校毕业。许多同学没有按正规上学，八年级毕业时，虽然有几个学生才14岁，但许多人的年龄却较大了，最大的正好17岁。

毕业前我差一点砸了锅。这是在6月17日前后，当时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发生的事后来作为“反革命政变”载入民主德国历史书，我们在达姆加腾只是间接地经历。人们谈论或从收音机听到一些，但感觉不到什么。然而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一些人十分害怕。我记得下面一件事：大约在6月17日之后一天或两天是公民课毕业考，我看到主考老师把党徽戴在上衣翻领里边！这激怒了我。当他开始向我提问时，我直接了当地说：“如果你能诚实到把党徽戴到外面来，我就回答。”我听到他说了“放肆的捣蛋鬼”之类的话。但陪考的女教师同意我的看法，说我是“正直的”，给我解了围。主考老师也没事，他只是害怕而已。我没有再提这件事。其实我们对老师们并没有什么意见。

母亲60岁了，她把人寿保险金600或者是700马克取了出

---

① 《达尔斯与雷克尼茨之间》（Zwischen Dars und Recknitz）是《波罗的海报》的专栏。达尔斯和雷克尼茨是克伦茨家乡的两条河。——译者

来，这笔钱本来是安葬费，但我们总得生活啊。母亲给我买了一件大衣。后来她再想保险，但因为她健康情况太差，医生拒绝了。

1953年我加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西方常有偏见，说是“硬拉进去”的。只有2/3适龄青年加入青年联盟，这一事实驳斥了上述偏见。至少我是完全出于信仰参加的。那是1953年夏天，我进普特布斯师范学院之前，学校是9月15日开学。

我怎么到师范学院去的，又是一段特别的故事。我当了多年人民通讯员自然愿意成为记者。因为我不是高中毕业生，只能绕个弯路：上工农学院，这是走另一条道路受高等教育的办法。于是我决定当钳工，开始在罗斯托克柴油机厂学徒，在一位极认真的师傅手下学锉工，他以“德国人的高级手艺”使我爱上了这一精工细磨的活计。我刚学完14天课程，一个青年联盟干部找我说：“我们要搞一场运动，需要教师，教师，教师。”我被说服了。我迟到14天赶到普特布斯，在那里学习4年，准备当低年级教员。那时我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1955年青年联盟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我第二次见到青年联盟主席昂纳克，当然只是从远处。显然我成了不错的青年联盟成员，否则不会当上罗斯托克专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次大会上解除了昂纳克担任10年之久的青年联盟主席职务。公开的理由是，他将在统一社会党里担任主要的职务。海因茨·凯斯勒——当时已是将军，正在领导建立民主德国空军——用很热情的讲话感谢卸任的青年联盟主席。但内部传说是，书中已提到的昂纳克与卡尔·谢德万的争论涉及范围越来越广。谢德万是政治局委员和主管青年问

题的党中央书记，他要求撤换昂纳克。这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其实很清楚，青年联盟的建设与昂纳克的名字分不开，对他在青年联盟的工作评价很高。不管怎么说，在埃尔富特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送他。

青年联盟埃尔富特大会之后不再提起昂纳克了，他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我第三次见到他是1958年夏天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我是国家人民军党组织的代表，因为在普特布斯大学毕业后，我自愿服兵役两年。在军队人们很希望我当职业军官。要不是格奥尔格（朔尔施）·埃瓦尔德，也许就成了。但这是后话。

在维尔纳一塞伦宾德大厅开会时，党代表二等兵克伦茨坐在他的将军和师长旁边。顺便说一下，我只是偶然地当上二等兵。当全团列队喊到炮手克伦茨时，我对提升还根本不在意。我疑惑地看着连长。连长自己也很惊讶，对我说："虽然我没提你的名，不过既然叫到你，就应该站出来。"我站出去领了肩章。发到最后还剩一个人，那可怜的家伙也叫克伦茨。尽管如此让我保留了我的肩章。

使我难忘的是，白发苍苍敬爱的威廉·皮克总统在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的搀扶下出席党代会开幕式。大家都知道他病得多重，他的出席更加表明他内心对党的感情。

在这次党代会上昂纳克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他担任中央书记直至1971年5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我与他没有个人接触。1964年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匆匆见过他一面，他是乌布利希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成员。那时签订了新的苏联—民主德国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列宁山一座宾馆里为此举行的招待会上，昂纳克与我握了手，但没有交谈。

再谈朔尔施·埃瓦尔德。他是吕根岛统一社会党县委第一书记（后来当农业部长，直到不幸死于车祸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劝我到青年联盟当干部。我不愿意，因为我分到阿尔特菲尔岛的一个小村子，我喜欢去那儿当教员。但是埃瓦尔德把我说服了，我当上吕根岛青年联盟县委第二书记，后来是第一书记。

起先认识我的妻子是在从住地去普特布斯看演出时。那时她还是我那个师范学院的学生。她是地道的梅克伦堡人，生于波罗的海边的巴尔特。我见到她时，当然周围有很多人在献殷勤。但我追得很紧，而且运气好，因为她的腿骨骨折了。当时在拉尔斯维克演出施托尔特贝克历史剧[①]。可以想象这是一次很轰动的文艺活动：进港的轮船、疾驰的快马和来来往往跑龙套的熙熙攘攘。剧作家库特·巴特尔（也称他库巴[②]）的作品常常由不幸已故的汉斯·安塞尔姆·佩尔滕[③]——后来我与他关系很好——导演。爱丽卡担任跑龙套，在拥挤中摔倒，一条腿骨折。为什么说是运气呢？因为她是教员应去波茨坦治疗，而我是青年联盟吕根县委书记理当跟着去，在医院里她没法躲开我。我老去看望她，她的腿上裹着石膏时我认识了未来的岳母。1961年4月8日我们结了婚。

这时我已是青年联盟罗斯托克区委第一书记，我妻子在

---

① 施托尔特贝克是14世纪罗斯托克地区一位人民英雄。50、60年代该专区举办一年一度的“波罗的海周”，其活动包括演出大型群众性历史剧《施托尔特贝克》以示纪念。——译者

② 库巴（1914—1967）民主德国作家，艺术科学院院士。——译者

③ 汉斯·安塞尔姆·佩尔滕，民主德国著名导演，曾任德国剧院院长。——译者

离罗斯托克30公里远的格拉尔—米里茨当教员。起初，我们周末才团聚。她在格拉尔—米里茨有一间带家具的小房间，我在罗斯托克只有一间旅馆房间。这样开始家庭生活在当时条件下是很普遍的。1961年夏天我们在罗斯托克分到一套房子——两间半屋子和一间阁楼。但请别问我们一起在那儿住了多长时间。

1961年12月我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我的办公室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负责大学和专科学校的青年联盟工作。在民主德国除青年联盟外没有单独的大学生联合会。当时统一社会党罗斯托克专区第一书记，后来的计委主席卡尔·梅维斯（流亡时期还是赫伯特·魏纳的对头）试图把我留在罗斯托克，说让我当罗斯托克市长。但我才24岁，决定宁愿留在青年联盟工作。

起初我保留在罗斯托克的住房，但当时的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霍斯特·舒曼坚持要我搬家。于是我们打起行李搬到首都。在那儿刚习惯，又有了新的意外：到莫斯科学习三年，1964—1967年。后来我才理解，这段时间我对妻子的要求多高。尽管如此她支持我。特别在1964年10月，我感到她总是和我想到一起。柏林时间20点，莫斯科是22点，她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里西方电台报道赫鲁晓夫下台了。我在莫斯科打了几个电话证实消息确凿，赶快叫醒同宿舍的苏联人沃洛佳，从斯摩稜斯克来的一个聪明家伙。我摇醒他喊道："赫鲁晓夫下台了。"他只是翻个身，嘟囔了一句："我知道，他得了个人迷信症。"

我学完回来，本应接替霍斯特·舒曼当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当时的统一社会党中央青年部长库特·图尔巴是这么考虑的。图尔巴具有闪光的思想，思考问题很有逻辑并善

于表达。他曾领导过《论坛报》的工作。但是1965年举行的统一社会党中央二中全会上对艺术界知识分子横加迫害。一些电影被禁映和收到档案馆里，一些艺术家后来去了西方。图尔巴因为属于“修正主义者”，还曾袒护过知识分子，因此不得不下台。于是他的干部计划肯定也是错误的。

过了很久，到1974年我才当上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在此之前是主管宣传的书记和“恩斯特·台尔曼”少先队组织的主席。

正如我所写的，1971年5月党中央第十六次全会解除瓦尔特·乌布利希第一书记职务前，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此事我在1970年11月我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当时的党中央青年部长）过40岁生日时才第一次知道。

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来祝贺生日。突然电话铃响，洛伦茨看到这是昂纳克的直通电话，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如果以为是昂纳克来电话祝贺生日，那他想错了。相反，昂纳克生硬地提了一个问题，而且说话响得连我们都听到：为什么青年联盟的报纸《青年世界》这么详细地报道乌布利希参观莱比锡全国“明日能手展览会”（即青年技术革新展览），还发表了他的讲话？为什么在同一期《青年世界》上登了埃贡·克伦茨纪念1950年青年联盟干部大会20周年这样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写得不符合历史事实嘛，是为乌布利希说话。克伦茨到底想干什么？昂纳克缓和一下又补充说：“西格弗里德，你可要为你的前途着想！”这个电话向我们当中许多人表明，在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之间一定有很严重的意见分歧。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后来才知道。1970年秋天筹备统一社会党中央第十四次会议时，对党在乌布利希领导下的经

济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这表现在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提出了听起来很特别的口号"不用赶上就能超过"，意思是要走新的路子，要采用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艺技术。昂纳克把那些反对乌布利希经济政策的中央委员和专区第一书记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时候，青年联盟对乌布利希的效忠声明对昂纳克自然不会有用，所以他批评《青年世界》的文章。

1971年6月第八次党代会已经处在昂纳克政策的影响之下，不久人们就说这次党代会标志着民主德国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当时可以说是出现了社会振兴，创造了"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相统一"的概念。党的计划中工人农民重新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有几座豪华型国际宾馆也供工会的度假者使用。作出了有关青年福利措施的决议，制订了新的青年法。妇女今后将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孩子，什么时候不要孩子。还制订了住房建设规划。有一句重要的话广为流传："党为人民，而不是人民为党。"当时我们深信，将永远信守这一原则。

第八次党代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把这看作是生活新阶段的起点。那时我经常看到昂纳克，感到他对我的工作很关心，并有一定好感。作为台尔曼少先队组织的主席，我与他的妻子教育部长玛戈特·昂纳克有很多接触。很可能昂纳克提名我当中央候补委员是她起了作用。确切的我不知道，但她明显的意图是不容置疑的。常有人问我：这个玛戈特·昂纳克是怎样一个人？1952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参加少先队中央在柏林举行的一次集会，她是台尔曼少先队组织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她善于说服别人。她在青年联盟的工作以及之后在教育部担任的各种职务，使她60年代初在

乌布利希时就被提名为教育部长。据我所知，她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那个时期在教育事业上有许多新做法。制订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法，规定从幼儿园到职业教育的各阶段教学内容应上下衔接，这使全国所有儿童机会均等。

我乐意回忆与玛戈特·昂纳克合作的许多美好岁月。1989年夏初筹备最后一次教育大会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教育部和青年联盟中央之间对增强学生独立性的问题有不少争论。许多青年联盟干部也认为，教育应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我支持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埃尔哈德·奥里希和台尔曼少先队组织主席维尔弗里德·波斯纳的立场。遗憾的是教育大会没有重视他们的意见。很多人责怪玛戈特·昂纳克。教员们早就抱怨，教师集体中的创新气氛未得到足够的支持，对学生的创造精神要求不够。

如果我说与玛戈特·昂纳克合作得不好，那不是真话。虽然她在讨论时会变得十分激动，谁要是得罪了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和好，但我只能说，她具有这种风格，是个女强人。无疑她对丈夫的影响不是微不足道的。

1973年10月我当上党中央委员，很快便知道是什么原因。昂纳克热情地祝贺我道："啊，埃贡，你也许不久要接青年联盟的工作。"1974年1月9日青年联盟中央选我当第一书记。我还记得很清楚，两天后昂纳克接见青年联盟新领导，作了一次谈话。此外，他把与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处的这种会见变成一种传统。会见时他很坦率，为青年工作提出许多政策性和具体的建议。第一次会见时，我请他在旧弗里德里希宫为纪念颁布1974年青年法举行的青年集会上讲话，他认为："这可是你的事！"他信任青年联盟，那时候有很愉快的合作气氛。这样持续了很多年。他常常过问我们的工

作，让我们知道青年联盟是由他直接领导，而不是由名义上主管青年部的党中央书记保罗·维尔纳领导。

1976年统一社会党九大时，我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前一天已有所闻，我仍感意外。哈里·蒂施打电话告诉我，昂纳克同他谈了此事。政治局的工作对我是陌生的。最初我佩服昂纳克作决定之快。另一方面，政治局的工作方式与我先前的青年联盟工作可很不一样。在青年联盟，我们习惯于在书记处会议上实实在在地辩论，十分对立的意见常常争论得很激烈。而政治局会议通常很短，很少超过一个半到两小时。提案看来准备得很好，并经各方商定，于是不需要在会上公开讨论。只在有反对意见时，才进行讨论。敢于提不同意见的有库特·哈格、阿尔弗雷德·诺伊曼或者还有维尔纳·费尔弗。昂纳克不喜欢别人提不中听的问题，并且让“刺儿头”们感觉到这一点。当时我还不认为“顶头上司”这种迅速决断的工作作风是缺点，而认为是效率。

有时昂纳克暗示过我的政治前途。1976年5月在筹备青年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我要求同昂纳克谈一次，想与他商量干部问题。几天以后他请我到办公室，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快40岁了，或许代表大会可以选一位新的更年轻的第一书记。比如我考虑当时台尔曼少先队组织主席黑尔加·拉布斯。昂纳克仔细地听我说，却摇摇头，表示不必尝试。他说：“留在青年联盟，直到我们党内工作需要你。”因为我喜欢青年联盟的工作，便听其自然了。

我在这段时间与许多人结下了友谊。几乎所有的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处成员后来都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例如沃尔夫冈·赫格尔、埃里希·波斯特勒、黑尔加·拉布斯、哈特穆特·柯尼希、弗兰克·博霍夫、冈特·雷特纳、京特·

伯梅、京特·施奈德、克劳斯·艾希勒、埃伦·布罗姆巴赫和约亨·维勒丁。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支持并致力于转折，遗憾的是现在都被撤了职。我只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正在这里占上风。

自从我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便背上了别人加于我的包袱，即昂纳克想以选拔我表明他的人事安排。从此也就戴上了“接班人”的桂冠。西方新闻界就此大作文章，不久还给我加上一个定语：强硬派。

我很关切地注意昂纳克是如何对待历史的。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处和罗斯托克大学曾共同筹备出版《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史》一书。这位多年的青年联盟主席自然很关心该书的文稿，亲自动笔修改，尤其是书中几乎没有涉及到的斯大林的形象。似乎为了强调他的话的重要性，昂纳克用粗黑塑料笔在我们1000页文稿的扉页写上：“历史就是历史，后人不能更改。”这一结论使我吃惊，我们可是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党代会是如何改变历史观的。而随着年龄增大，昂纳克本人也在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否则如何解释，按他的阐述萨尔州一下子成了比萨克森或柏林更加重要的工人运动中心？①

过了几年我便感到，“专职青年”这个词是针对我生造出来的。46岁了，怎么还能把我当作青年干部呢？于是1983年10月我去找昂纳克，对他说：“如果你让我继续留在青年联盟，那我当青年联盟主席的时间就比你还长了。”这话昂纳克要考虑考虑。当然他有经验，知道人到一定年龄就不容易再去接近青年，与他们有共同语言，了解他们。但也许是

---

① 埃里希·昂纳克1912年生于萨尔布吕肯，该地后属联邦德国萨尔州。——译者

昂纳克想到有人竟然比他当青年联盟主席的时间还长，也有点不高兴。算上他从1945年当反法西斯青年委员会主席，昂纳克领导新青年运动达10年。我还差三个月。“好吧，”昂纳克说，“我提议你当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

这更令我吃惊。我曾估计，会把我调到某个专区，像以前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卡尔·马克思城专区）或者京特·雅恩（波茨坦专区）那样。我仿佛又看到北极光在眼前升起，也许去北边的罗斯托克？但昂纳克对我另有安排，我在1983年10月21日的政治局星期二例会上才知道。

但在前一天，青年联盟临别还有一项棘手的任务等着我。10月20日晚在共和国宫举行一场反对欧洲部署新中程导弹的和平音乐会。青年联盟中央邀请哈里·贝拉方特和乌多·林登贝格① 来演出。中午在共和国宫前已经开了锅。我们的市中心一看就知道是个敏感的地点。那些没票的乌多·林登贝格的崇拜者为了出气向人民警察挑衅。我从共和国宫的窗户往外看，很担心。一些党的领导人认为邀请林登贝格是青年联盟滑向西方堕落文化，而与警察发生冲突就证明他们都对了。当然青年们没有把这一切看得那么严重，没有发生令人担心的骚乱。我们总结了经验，有助于以后举办更大的摇滚音乐会，如鲍勃·迪伦或布鲁斯·斯普林斯廷② 的演出。

第二天上午快10点时我去参加政治局会议，看到一份由昂纳克签署的简短提案，内容是提议解除我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提名我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以及授于民

---

① 哈里·贝拉方特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流行歌星。乌多·林登贝格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摇滚乐歌星。——译者

② 鲍勃·迪伦和布鲁斯·斯普林斯廷是美国有名的摇滚乐歌星。——译者

主德国最高的“卡尔·马克思奖章”。我确实感到惊讶。而今后的工作范围至少使我同样困惑。昂纳克提议我主管国家和法律、安全问题、青年和体育部门。虽然有一些工作我能想象，但昂纳克把他直接领导的安全部门交出来引起——当然不止是我的感受——不大不小的轰动。“接班人”一说愈传愈盛。

11月底第七次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局这些提议。此外，这次全会还具有特殊意义，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马上认识到这一点。对在联邦德国部署北约导弹，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不久前说过：“一旦部署了导弹，德国人只有隔着一道导弹篱笆互相讲话了。”昂纳克的回答却是温和的：“现在更应该全力以赴争取和平。”在这复杂的年代，当我们许多人为前途担心时，昂纳克在政治对话的道路上无疑迈出了勇敢、独立自主的一步。

我的工作开始了：昂纳克清理他的保险柜，把至今他管的党中央安全部有关文件交给我。我了解到以前不那么详细知道的事情：国防开支，军队人员配备和有关国防状况的材料。我熟悉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

1984年2月昂纳克去莫斯科参加已故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葬礼，把我列入代表团。我很感激，因为在安德罗波夫执政的短时间内，有了不平常的有生气的新调子。每当安德罗波夫谈当前和未来的事，很少只是描述现状，而多半突出应解决的任务。我回忆起他在苏联建国60周年时在克里姆林宫的著名演讲，他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时说：“我们现在当然也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一切困难，理想已经实现。过去还行的事情，今天需要改进。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面临许多严重的任务。”当时我不知道将有个戈尔巴乔夫上

台，他会把这一思想萌芽坚定地发展下去。更没料到我们没有能力来完成安德罗波夫所预示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我只知道，安德罗波夫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敏锐的现实社会主义观察者，一位有惊人眼光的人物。

世界各国人士前来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当安德罗波夫的灵柩放入地下时，我站在列宁墓前注意到，新当选的接班人契尔年科健康情况有多糟糕。他想举手致意，但人们感觉到，他已经没有力气抬手了。我想起了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几年，相信眼前这种景象决不会在我们国家里发生……。

那年我陪同昂纳克出访还不止一次。参加了6月经互会最高级会谈，了解到在我们同盟国之间的经济谈判是多么艰巨。在这之前我只参加过强调友好的会晤。而经互会的议程涉及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有几次几乎无法达成一致。在那几天里我丢掉了一些幻想。

7月，我代表昂纳克参加波兰解放40周年庆祝活动。我特别仔细地准备了讲话稿，除了青年运动以外这可是我第一次出面参加国际活动。我把讲稿也送到昂纳克那里，他在首页写上“同意”通过了。由于我知道许多波兰人对联邦德国极右力量增长以及新纳粹和复仇主义倾向日益发展感到震惊，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讲稿中有几段措辞相当激烈。奇怪的是民主德国报纸没有登这几段，而波兰的新闻媒介则着重强调这一部分。后来我才明白背景。昂纳克正在准备访问联邦德国，不需要那些他认为会影响即将举行的会谈的表态。西方新闻媒介第一次放出所谓统一社会党领导意见分歧的谣言。我1984年夏访问希腊向帕潘德里欧总理转交昂纳克的信以后有记者甚至问，我和昂纳克之间的分歧到底有多深。我

很吃惊，斥之为纯粹胡说八道，顶了回去。我庆幸提问的不是联邦德国的无聊小报记者，因为这些报纸首先是供柏林的领导人看的，而且人们往往信以为真。

1984年，在苏联——民主德国关系中发生了一件我一直认为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莫斯科仍满腹狐疑注视着昂纳克联邦德国之行的准备工作。《真理报》在1984年夏发表了两篇关于联邦德国复仇主义倾向的文章。同时相当明显地攻击昂纳克在第七次中央全会提出的对话和现实主义政策。党内许多人不理解莫斯科的反应，包括我在内。但别忘了：这是契尔年科时期。昂纳克、赫尔曼·阿克森、库特·哈格和埃里希·米尔克去莫斯科与契尔年科及苏共其他领导人会谈。这又有什么用呢？

如今，人们在德国问题政策方面是耳聪目明的，如果追忆一下当时苏联领导内部的讨论时，会遇到很有意思而往往被忽略的一个情况。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那时一定看到我们在某些具体方面与联邦德国合作的设想，但他们指责我们拿不出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案。他们说对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我们党的名称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我们看的是《新德意志报》，但不再歌唱共产主义诗人贝希尔在国歌中写下的前景——“德国，统一的祖国”。而别人则把这个口号写到旗帜上去了。那时苏联同志想必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根本问题没有搞清，这种访问能有什么结果呢？我想，他们是害怕民主德国单独行动。

1984年6月昂纳克向政治局提议，选我当国务委员会副

主席。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个前景问题。"这又为很多猜测提供了材料。1984和1985年之交昂纳克第一次要求我，当他不在时代理他的职务。但他没有说明理由。

昂纳克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不知所措。他虽然认识这位苏共新总书记，6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随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时有过短暂的接触。但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人，推行什么政策以及将怎么处理苏联—民主德国关系，对此还没有结论性的回答。我们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昂纳克马上与戈尔巴乔夫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当天华约国家代表团团长会晤，他得到的初步印象仅仅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领导沉默的时代。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昂纳克与别的国家不同，对此不怎么高兴。他显然有保留。前几个星期他还一再抱怨说，再也无法与苏联领导商量问题了，并批评苏联某些外交步骤。但现在当苏联自己谈到停滞不前，戈尔巴乔夫要求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他却持怀疑和疏远的态度，不是在（昂纳克支持得最多的）苏联外交政策方面，而是在苏联内政方面。然而，只有从内政、外交政策的总体看，才能理解戈尔巴乔夫的苏共新路线。全世界，不仅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抱着希望欣然以待的事，对昂纳克来说却是不可行的。"我们究竟要加速什么？"他用煽动的口气问。"我们的住房建设规划？那只会造成比例失调！我们的肉类、黄油消费？我们本来就是欧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每个反对改革的论点最终都间接或直接地归结到这个问题："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比我们好？你们要改革和公开性还是要充足的货架？"

类似"自治"的概念都被列入修正主义范畴。反对过分

集中主张多一些民主的讨论，他都觉得可疑。于是——像马赛克画一样——日益清晰地拼成一幅不赞成苏联新发展的景象，这给我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后果。

我常想，要是我们这些领导人当时认识到时代的信号就好了！要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戈尔巴乔夫，他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价值，而是反对歪曲社会主义价值，那就好了！要是我们及时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国家的主权肯定能更好地得到维护；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就会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从一开始起就是民主的；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保护这样的社会制度免遭资本主义的吞并。

如前所述，在"改革"和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问题上，昂纳克原先对我信任的密切关系有了裂痕。这也有一段插曲。1985年12月我作了清除胆结石手术，住院几天。那时，维利·斯多夫和京特·米塔克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会议，其间与苏共领导同志进行了双边会谈。会谈中，苏方间接提醒民主德国要更好地与苏联协调外交步子。昂纳克来医院看我时，对莫斯科这种反应非常生气。我回答说，单独同戈尔巴乔夫谈一次一定很有益处，他的政策确实是明智的。这时昂纳克明显流露失望。我很清楚，这一时刻他和我之间良好的关系破裂了。虽然他11月还曾通知我，参加民主德国出席苏共第二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团，但后来我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1985年11月昂纳克还同我商量政治局人事变动的考虑，而准备统一社会党十一大时他就不找我了。如果说我曾经是接班人的话，那现在这一切都预示着撤销。是否是最终的撤销，我不知道，这也不是我考虑的主要问题。我只是清楚地感到：将有一场严峻的斗争。我准备顶住，然而是什么代价？被赶走或者听天由命，是两个可能

的极端。倒不是从机会主义出发，我希望有一条中间道路。

二、跟着而又反对昂纳克

对于我来说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每个草案、每句话、每个姿态都要细细斟酌，以免增加“顶头上司”的不信任。我甚至害怕那些我确实无法施加影响的文章和报道的发表。在多疑者的眼中，即便是明显的谣言总好像有一半是真的。

我家里人和朋友们知道，有时候我几乎听天由命了。不仅昂纳克自己，还有他的亲信们也一有机会就挖苦我。好几次我想用苏联人的方式“直话直说”。有些朋友今天责备我没有及时这样做。

我无论如何要促使我们党的领导内部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苏联发生的事情形成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我相信，为此必须“留在船上”。此外，起初我认为可以和昂纳克一起做到这一点。于是我徒劳地试图建议昂纳克对1987年苏共一月全会作出可以接受的评价。

我当然同党中央国际部里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同志也有很好的联系。他们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也能向苏联朋友打招呼。

我鼓励党中央青年部和青年联盟中央在估计青年中的问题时要区别对待。众所周知，我们并非没有“髶克”、“重金属乐”①、“光头帮”和“黑衣士”②。

---

① 重金属乐：比摇滚乐更强烈的一种现代派音乐。——译者

② 黑衣士：西方青年中极少数人身穿黑衣，有的甚至睡在墓穴和棺材里。这也是一种对社会不满，与常规生活背道而驰的心态表现。——译者

去教堂的青年急剧增多，他们带着别处解答不了的问题去那儿寻求答案。这一切的原因在于社会状况。但是，尽管当时这种分析是多么克制和谨慎，“顶头上司”却置若罔闻。不久前我被请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我听到那些支持民主德国的人提出颇有见解的问题，看到他们真诚无偏见地努力解决矛盾，我感到羞愧，我们当时对仅仅是有时有点不同看法的人理解太不够了。这也是事实：有一些青年文艺形式必须先在政治局通过。如果要办成请西方歌星演唱的摇滚乐和流行音乐会，那就要等待心理上有利的时刻。在政治局我多次引用出自昂纳克之口的问句：“我们评价一个年轻人是看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思想和行动？”这个问题自然是逼人作出我所需要的回答，但是很有效。于是直至那时我们还是搞成了几次不寻常的活动。

我从昂纳克那里接过党中央安全部时，要找一个新部长。我选了沃尔夫冈·赫格尔，这一人选有争议。他不是老牌军事专家，而是文职人员，还是个搞哲学的。一些人看出我的意图，很不高兴。另一些人同样看出我的意图，认为这是合乎时宜的现象。我只是想把这一对许多人讳莫如深的传统军事工作置于一个文职内行的监督之下。我同那个时期的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过去的西班牙战士）和海因茨·凯斯勒（“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创始人）合作得很好。

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力图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他将开诚布公地吸收我参加研究所有重要的安全问题。然而我也看到昂纳克和米尔克在政治局每星期二例会后单独谈话。到底在那儿谈些什么，我不知道。

国家安全部解散后以及圆桌会议的调查表明，这个部的

许多事都避开了人民和政府的监督。国家安全部是独立王国。甚至我也是在安全部不复存在时，才知道它的工作人员的真实数字。一些十分敏感部门的任务和组织是绝密的，我也不知情。常有人问我，当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时是否被窃听。以前我总是态度鲜明地否认。今天我不再那么有把握了。

国家安全部的材料按内容分发。总书记得到所有重要的情报，给政治局委员的是有选择的。谁看哪些材料，由米尔克决定。一再有人问国家安全部和我，去年春、夏时安全部是不是睡大觉了，没有把国家的具体形势报告上面。他们报告了，甚至相当准确和详细。我本人从中得出许多有助于自己工作的论据。可惜别人没有这样做。就如同分析青年中的情况一样，有人是眼不见为净。

在个别情况下，经与昂纳克商量我还是有可能施加一定影响的。回想起一件发生在1987年的具体事。当时一些持批评态度的名人被捕，他们参加了传统的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一月游行，打的标语上写着卢森堡的话："自由向来也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在被捕者当中也有女版画家贝贝尔·博莱，后来的"新论坛"的创建人之一。她被释放到英国去了，她希望返回民主德国。于是福尔克主教在1988年6月30日请求昂纳克允许博莱和维尔纳·菲舍尔，另一个被驱逐者，重返民主德国。当时昂纳克在休假，我写信给他建议接受福尔克主教的请求。于是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意他们入境。

律师亨里希在西方出版他的书《被监护的国家》，引起很大的反感。而我阻止了对他的刑事追究。这是我看到并能利用的施加影响的机会。

然而我不得不向自己提出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也许因为我害怕知道了就免不了会得出的结论。我也学会了苟安。不过至今我还认为，安全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出于信念在工作，相信他们是服务于美好的事业。例如对外谍报工作。这可是其他国家也做的工作。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不能放弃这项工作。我理解我国的公民组织也不是反对这一工作，而是抗议监视和污辱人格地对待民主德国公民。我和沃尔夫冈·赫格尔已经一起为国家安全机构的这些行为向民主德国人民作了道歉。“立即实行民主”组织里的基督教徒乌尔曼博士在圆桌会议上以公正的态度接受我们的道歉，这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在“宽容”问题上的一次补课。

那一时期我曾面临三个棘手的问题：作为全国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民主德国1989年5月7日地方选举中的工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件的态度以及对1989年10月9日和16日莱比锡星期一游行和平过程所起的作用。这三方面问题在后来评价“转折”前的事件时一再提到。

对此有过许多猜测，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选举委员会官方公布，投票率约为98.78%，有效选票约为98.85%。

在5月7日夜间，西方新闻媒介已传出选举作弊的消息。起初我把它当作是对我们——应该承认——急需改变的选举制度的习以为常的一再攻击。然而，在官方结果公布并经国务委员会通过之后，公民个人以及公民组织拿他们自己的观察和调查与官方结果作比较，越来越多地提出问题和申诉。我们的党员也对选举结果的准确性提出怀疑。社会上日益强烈的谴责使我这个选举委员会主席受到很大震动。转折时期

的历次游行中人们说我篡改选举结果。那时正是大觉醒的时期，但有时也缺乏调查研究。后来，当对我的指责还不时地冒出来时，我曾同牧师埃佩尔曼部长和民主德国副总检察长一起在电视台发表如下声明：

"在越来越多有关篡改地方选举结果的证据公布于众，在我国人民的民主思想受到无法忍受的侵犯的时刻，我作为当时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对此再次表态。

我有材料为依据可以向民主德国人民担保，我与各政党、组织代表和一些个人共同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协商一致，曾坚决要求必须严格按规定进行选举。县级选举结果上报时按规定进行汇总，中央选举委员会未作改动即予公布，并由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交国务委员会确认。

但是我不能这样说了就了事。我们的社会状况是：越来越无法对现实作批判的分析；选举中完全一致同意的浪潮取代了民主意志的形成，还把这同社会主义民主联系在一起；对此要由我们当时所有对造成这种政治状况起决定作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承担政治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重复在圆桌会议上已经说过的话：我承认对当时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政策负有政治责任。无论现在和将来我都无意诿过于人。我同我的政界友人试图在统一社会党内造成另一种情况，却为时已晚。我们失败了，未能及时与歪曲社会主义并用假选举使我国在世人面前名誉扫地的政策决裂，可能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

业已查明的选举舞弊究其原因，我认为不在于个别人的错误态度，更不在地方一级，而在于40年来形成的选举制度不允许作出真正的民主抉择。党和国家领导丧失现实感，他们以为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将近100%的赞成。这是造成在

社会生活各方面片面追求数字的起点，选举也如此，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追逐高指数的竞赛。今天我们知道，这与我国的政治情绪是不相符的。”

实际情况如何呢？在公布选举结果和选举委员会向国务委员会报告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选举不公正的报告。所有227个县都报来了由县选举委员会成员签字的总结报告，作为选举结果的证明。全国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法汇总地方选举委员会上报的结果，不作任何改动即予公布，并报告国务委员会。

一份由国家中央统计局长东达教授、国营数据处理联合企业总经理冯克教授和国营柏林数据中心经理米勒签署的声明送到我那儿。声明原文是：“兹证明国营柏林数据中心作为民主德国选举委员会的计算中心，于1989年5月7日和1989年5月8日将县、专区选举委员会呈送的乡、市区、市和县人民代表机构选举结果输入电子数据处理设备，按顺序、不作任何加工、准确无误地进行整理，并送交民主德国选举委员会。所使用的电子数据处理程序已归档，程序以及送交计算中心的数据均备复查。”因此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当天晚上以及向国务委员会报告时，除上报的结果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否则就意味着宣布227个县的报告无效，而在当时是没有理由这样做的。

选举委员会对严明地进行选举作了清楚的规定。1989年4月15日在一份给昂纳克的内部通报里我写道：我们最需要的莫过于真实的选举结果——“而不是那种出于县、专区之间竞赛的考虑和头脑发热支配下得出的结果”。党应该施加影响，保证选举委员会统计选票的工作绝对不出差错。同时我在给县、专区选举委员会主席的信里又提到这一前提，信

中说："特别应当注意严格遵守有关设立投票站、选举过程和统计结果的选举法规定。"从形式上看，我们在全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无可非议。

但如果要真正寻根问底，就应该看看从共和国成立之时起我国的选举制度。我们的选举制度不是真正的自由选举，因为我们的选举只不过是把选票叠好投入票箱，在这种气氛下选民失去了对选举内容和趋势的关心，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进行的是阉割了社会主义民主实质的选举。因此我同意教会代表在10月19日对话时的意见：应该总结选举中的一切经验，尤其是反面经验，并在制订新选举法时予以重视。根据这一思想，10月24日我在当选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时的讲话中谈到这个题目。

写这几行时，人民议院通过的新选举法已摆在我面前。我坚信我们痛苦的经验将永远不会重复。我在电视声明中还说过：

"今天人民通过斗争取得了另一种境况，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自由自决权。自由选举即将来临，希望我们首先向前看。现在尤其需要这样做，因为各地的生活必须正常运转，并由不需承担前领导遗留包袱的各级地方政府来领导。我主张从历史角度公正地、通情达理、宽容地对待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主张真正改革我们的社会，赞成属于民主德国历史优良传统而在两个德国和平融合过程中不应丢弃的价值观。"难道不可以这样地走向未来吗？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它的未来。我们全球的未来取决于各国人民塑造自己的未来的方式。各国人民的命运是互相关联的。戈尔巴乔夫说过"世界是矛盾的，但由于相互的密切关系和依存，归根结底世界又是整体性的"。我也是从这个

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六月事件的国际反应，这一事件深深触动了我们。我记得，戈尔巴乔夫正好在学潮达到高潮之前及时结束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访问。我说戈尔巴乔夫这次访问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在长达几十年的分裂、疏远之后重新恢复了曾是十分密切的友谊。我认为这一估计至今仍然正确。

此外，昂纳克是改善经互会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气氛的最热心的建筑师之一。民主德国很早就重新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高潮是1986年昂纳克正式访问中国以及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回访。学潮后赵被解除了职务。

昂纳克和政治局理智行事，很重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如果长时间放弃机会，不与这个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流毒的、有广泛影响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合作，那是不能原谅的。60年代中苏之间深刻的意见分歧导致中国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破裂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昂纳克很巧妙地把现在同40年代末、50年代的友谊联系起来。朋友们叙述：访问中国时在上海一次招待会上，他回忆起1951年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他做得很聪明，唱起他喜爱的一首歌《八月玫瑰开》。这首歌是为联欢节写的，内容是讲“胜利了的中国”代表与华沙建筑工人的队伍并肩进入联欢节大会场。昂纳克用手打着拍子，大声地唱起来。当时在联欢节，中国和民主德国青年之间的气氛就充满了友谊和热情。在中断几十年后，1989年中国青年学生组织重又首次参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这一热情又重新焕发出来。当然“天安门事件”投下了阴影，但没有影响

到两国的青年，他们体现着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希望。人们提问题，解答问题，双方都努力实事求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危害正在恢复的友谊。

当我1989年6月7日、8日访问西德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方丹时，又面临这个问题，我有类似的感触。

拉方丹曾多次来民主德国会谈，长期以来我跟他很熟，他邀请我以及一个专家代表团去萨尔布吕肯参加一次安全问题讨论会。我们降落在一个小型机场，在两个德国合作史上我第一次由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弗里茨·施特雷勒茨大将陪同。联邦军领导认为不宜派同样规格的代表参加讨论会，对此拉方丹公开表示遗憾。联邦德国代表团的成员有：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埃贡·巴尔、霍斯特·埃姆克和卡斯滕·福伊格特。

讨论会开始前，拉方丹单独与我谈话，让我对他在关于安全政策的讲话中将强烈反对民主德国有关中国事件的官方表态有所准备。我反应克制，说我将按准备好的讲。拉方丹按他说的做了，在谈到人权问题时，尖锐地批评民主德国有人把中国民主运动称作反革命暴乱。我没有理会他的评论，讨论会按预定的题目进行。但按后来西方通讯社的报道好像讨论会仅仅谈了中国问题。他们报道拉方丹的看法，却根本没有客观介绍民主德国代表团就裁军与缓和问题提出的建设性建议。

第一天会议结束后，一位萨尔州电台记者问我，为什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事不表态。我回答大意如下：我认为如今不能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我们公布了中方提供的中国国务院、党的领导和北京市长的公告。每个人可以从中得出自己的印象。对我们来说，最糟糕的是通过歪曲、造

谣、断言和掩盖事实来煽动情绪，造成新的对立。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有助于在世界各地建立和维护和平的气氛。

这是我说过的话，对报纸上登的其他一切我不负责。附带说一下，我在萨尔布吕肯的表态远不如6月8日星期四人民议院各议会党团一致通过的决议那么尖锐。我从没有为动用武力对付游行者而造成双方众多牺牲的行为辩护过。然而和国际上许多政治家一样，我也担心在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发生类似内战的情况，这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我希望别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关于秩序和稳定的说法。

民主德国领导人——我是其中之一——对中国事件的立场已经确定。6月6日民主德国各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信》、《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给执行戒严部队的信》以及北京市长致市民题为《坚决镇压反革命动乱》的一封信。

事实上统一社会党领导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即认为事件是由反革命叛乱分子煽动起来的，为了恢复安定和秩序必须坚决对付反革命。尽管后来传开的许多有关中国情况的背景我还不知道，但当时我——至今仍坚持这一点——反对双方任何形式的流血。人们可能会责备我“客观主义”的态度，引用中国公布的消息，自己可以不表态。但我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克制谨慎是最明智的。其他政治家迫不及待地谴责北京事件，而后来很快又去实现对他们说来也是不可放弃的对华关系正常化。

显然，国内认为我前一天晚上在萨尔州电台发表的声明“太软”，因此通过德通社往萨尔布吕肯给我发来一份也是

直接针对拉方丹观点的措辞更强硬的表态，但显然不是记者写的，当晚民主德国电视台播放了这一表态。在我们那里，把政治局的意见假称德通社的看法下令发表是常有的事。同样，给政治家或记者规定表态口径也不奇怪。责任不在记者，我在统一社会党九中全会上已明确说过，责任在于也正蔓延到新闻媒介的党的领导指挥一切的制度。

我接到任务后就通过拉方丹汽车里的电话对他说："奥斯卡，我接到任务要对你的声明讲些话。"拉方丹正在参加一次竞选大会，他只说："那是你的事！"似乎已经预料到了。我诅咒这种不可思议的作风——不单指报道本身，也指那种让我发表本非我所写的声明的做法。

晚上，记者在电视上宣读我根本没有发表的"我的"声明。第二天早上在报上就能读到它。

为什么我那时的表态一再被歪曲？为什么关于我早已计划，后来推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时才实现的中国之行有人散布说，我曾对"当权者"的行动表示祝贺？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企图使我所代表的转折政策名声扫地，使人害怕我是有可能在民主德国也采取中国式解决办法的人。然而我没有为流血事件辩护。我在北京完成了交给我的政治任务，像其他国家的代表一样，向中国人民祝贺共和国成立40周年。曼弗雷德·冯·阿尔德纳后来在人民议院说，也许我正是在中国懂得了那种解决矛盾的办法在民主德国是决不可取的。这非常接近我的真实思想。

11月4日作家克里斯多夫·海因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对50万游行者提出一条不寻常的建议："我们的记性不至于坏到不知道是谁开始冲破强大无比的制度，是谁唤醒了理智。

是街上的理智，是人民的游行……首先要提的是莱比锡。柏林的市长应该以全体聚集在这里的柏林市民的名义向国务委员会和人民议院建议，把莱比锡市命名为民主德国英雄城。”如今莱比锡星期一游行时常出现反革命行动，不知海因是否还坚持他的意见。但在当时，在11月刚刚转折以后，他的建议赢得了许多掌声。

事实上莱比锡的示威游行对我们后来称作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有重大的影响。而正是在莱比锡，我国的革命转变是否能真正和平实现，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游行者高呼："我们是人民！""不要武力！"负责安全和秩序的武装力量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说："我们也是人民。我们也不要武力？"

我很清楚，关键在于"我们上面"。面对点点滴滴报来的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时柏林发生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避免任何武力升级，不允许发生流血。

我知道统一社会党各专区第一书记收到过一份电传，内容是："必须把敌对行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并得到指示，"注意孤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联邦德国的《明星》杂志说，莱比锡人民警察参谋长发出的命令是："由联邦德国操纵的、以反革命分子打头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光头帮、黑衣士、髭克和其他流氓分子已成为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威胁。今天莱比锡的游行将是最后一次。同志们，这是我们结束反革命活动的一天。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事后，我无法再核实这份调查的真实性。但我至少怀疑那是原文，因为这类命令决不会这样措辞。但是我估计，那份来自柏林的电传对莱比锡制订阻止星期一游行的政治措施起了作用。

另一方面，我从中国回来后，与主管武装部队的部长埃

里希·米尔克、海因茨·凯斯勒和弗里德里希·迪克尔商量取得一致，无论如何要避免同游行者冲突。如果不发生对武装部队使用暴力，部队就应克制。

当我的老朋友瓦尔特·弗里德里希10月9日星期一上午激动地到我办公室来报告说，在莱比锡人们担心晚上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时，我也对他说明了这一点。

我一向信任瓦尔特·弗里德里希的政治判断力。他本人以及莱比锡的中央青年研究所以无可非议的科学性著称。当时只有“中青所”（这是研究所的简称）才有权进行民意调查。自然，按严格科学性进行调查的结果毫不掩饰地反映出民主德国的实际状况，并常常使人大吃一惊。把这种调查材料列为“秘密文件”，并禁止公布，算是最轻的处理了。我甚至常常不得不为该研究所的继续存在说好话。党内那些愿意实事求是分析现实的领导人，尤其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以及与中央青年研究所协作的机构，从这个独一无二的莱比锡研究所的工作受益匪浅，这样说不会过分。瓦尔特·弗里德里希肯定也因为我十分尊重中央青年研究所的工作以及我俩由此形成的多年友谊才鼓起勇气在那个决定性的10月9日到柏林来找我。

我仔细地听弗里德里希述说。他告诉我，在莱比锡谁都知道调集了军队准备晚上用。“埃贡，今晚在莱比锡不能动武。”他恳求我，“不能流血，不能开枪。”他向我说明星期一游行者的动机，交给我一份对人民情绪全面详细的调查。其中批评党的领导脱离生活和完全不起作用，说人民对党的信任正在急剧消失，党员中反对教条、僵化和批评面对矛盾无能为力的情绪在增长。材料中写道：“我国很大部分人中间，对民主德国的认同感和亲密感正面临崩溃。”

我试图让弗里德里希放心，告诉他我同米尔克、凯斯勒和迪克尔部长的协议。我们将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武力，不会开枪。但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教授叙述的莱比锡形势和据称为了“晚间战斗”而采取措施的细节却使我不安。我再次给党中央安全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以及米尔克和迪克尔打电话。我们再次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游行者不动武，维持安全秩序的部队也不动用武力。之后我才知道，教会的一些工作小组为保证游行和平进行曾十分紧张地奔忙。10月9日上午教会发出呼吁：“我们担心。为我们自己担心。也为我们的朋友们以及面对我们穿着军装的人担心。我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心。我们请求大家：不使用任何武力！”

当这份呼吁书在莱比锡印发时，弗里德里希在我办公室里考虑的问题已经超出10月9日这一天的范围了。在此以前，弗里德里希扣下了他报告中的三页，这时他交给了我。我读到：“以下的事我难以启齿，然而我不得不说。我认为昂纳克同志应该马上辞职。我深信，不是50%，而是大约90%的党员同志欢迎他这样做。昂纳克同志已完全丧失了他以往在人民中的威望。”

我拿着这张纸就像烫手的土豆一样。不过我以诚相待，问我的客人：“瓦尔特，你认为应该由谁来干呢？”我的朋友说：“你。”这时我想起我那份违背昂纳克意志为24小时以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准备的声明，对他说：“等到明天吧。”弗里德里希像来时那样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我，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莱比锡。

在莱比锡，下午游行开始前几个小时，六位当地知名人士发出号召：“今天，共同的忧虑和责任感把我们聚集到一起。莱比锡市的形势发展使我们受到震动，我们正在寻找解

决办法。我们大家需要自由地就我国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交换意见。因此我们六人向所有市民保证，竭尽全力并运用我们的威望，争取不仅在莱比锡专区，而且还要与我们的政府进行对话。我们急切地请求你们要谨慎，以便有可能进行和平对话。”签署这一号召的有莱比锡市音乐厅乐团指挥库特·马祖尔教授、牧师彼得·齐默曼博士、讽刺剧演员贝尔恩德—卢茨·朗格以及统一社会党专区书记库特·迈耶尔博士、约亨·波默特和后来的统一社会党专区第一书记罗兰德·韦策尔博士。

当时的代理专区第一书记哈肯贝格同志打电话报告我这六人的愿望。我说，我同意，但还要回他电话。在这一谈话和我回电话当中间隔一点时间，因为我再次给有关部长打电话互相通气达成一致，决不动用军队。莱比锡和平度过了10月9日。那个号召无疑对该市的形势起了镇静作用。但军队的克制是在柏林决定的。

理智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是下一次游行在一周之后，我们需要的是保证理智继续占上风。于是我决定，1989年10月13日星期五同国防委员会书记弗里茨·施特雷勒茨上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鲁迪·米梯希上将、内务部副部长兼德国人民警察参谋长卡尔—海因茨·瓦格纳上将以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安全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一起飞往莱比锡。我要同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当地部队指挥机构首先讨论如何保证1989年10月16日的游行和平进行。

这个时候我本应同昂纳克、京特·米塔克和约阿希姆·赫尔曼一起参加一次与各民主党派主席的会晤。但由于我认为莱比锡问题在政治上更加重要，向昂纳克请了假。我去莱比锡还因为我应该给参加倡议号召书的三位专区党委书记撑

腰——即使是在他们本单位专区统一社会党书记处内部。莱比锡人已从电话中得知我个人的支持，但当昂纳克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得悉此事时，引起了很多怀疑。

还是回到我们的莱比锡之行。当哈肯贝格同志近下午一点在统一社会党莱比锡专区党委汇报了有关形势后，我与随行人员商量，一致认为：政治问题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我们将起草一份国防委员会主席令，包括两个原则规定：第一，只有当人身和建筑物遭到攻击时才动用警察，否则不使用任何武装警察对付游行者；第二，在任何情况下禁止开枪。

在讨论形势过后，我对哈肯贝格同志说："不管有什么别的命令，不管下命令的人是什么军衔或级别，只有我们讨论的结果有效：不使用暴力！"我重复了一遍："即便有人给你下别的命令！"这一指示已大大超出我的职权。我明白这一点，我的随从也清楚。就这样我们返回了柏林。

施特雷勒茨上将在我办公室口授应呈昂纳克签字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令。幸好他手头总有国防委员会的空白信纸。我的女秘书作记录，她吃了一惊，因为她懂得这一纸文件的签字意味着什么。

将近下午5点，昂纳克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弗里德里希·施特雷勒茨和我。施特雷勒茨同志汇报了形势。昂纳克仔细听着。上将毋庸置疑地说明，首要的不是作出军事决定而是政治决定。他说，至于治安形势本来就很复杂，因为很难控制数十万人的游行。昂纳克提议封锁莱比锡市中心，这样在莱比锡市四个教堂做礼拜的人就不能汇合到一起。为此需要准备投入相应的力量和技术手段。此外，为了解市中心的情况他要找地图看。我先避开这一点说："我认为，实行封锁

而不发生游行群众与国家政权对立是不可能的。”到这时昂纳克还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形势多么严重。不过，他还是在按我们莱比锡商定精神起草的命令上签了字。

10月16日星期一。埃里希·米尔克、弗里茨·施特雷勒茨和我一起同内务部长弗里德里希·迪克尔在他的内务部办公室碰头，商量一旦莱比锡发生意外事件，无论如何要以非暴力精神协调行动。下午近2点55分时昂纳克也来了，其他人很惊讶；在这前一会儿昂纳克打电话通知我要来。他显得疲劳而烦躁，一次又一次同我们商量。下午和晚上我们两人都和莱比锡的哈肯贝格通电话，听他汇报形势，当游行和平结束时向他表示感谢。迪克尔和施特雷勒茨一再让昂纳克放宽心。

昂纳克在游行结束后回家。我很清楚，第二天10月17日星期二必须作出抉择。昂纳克决不会再是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即不再是我们军队和其他安全保卫机构的最高统帅。我从内务部回到党中央委员会，再次与沃尔夫冈·赫格尔商量形势。有关部长报告，全国游行均和平结束，之后我们也回家了。我们希望，10月16日这一天为保证我国革命变革和平进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希望，第二天将开始的“来自上面”的变革取得成功。

三、转折的中央全会前夕

1989年10月17日星期二早上，当我在家门口与妻子告别时，其实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只是她的手似乎比往常握得更紧；虽然我已为今天将要作出的决定思绪翻腾，但我感觉到了。我不是那种人，可以对过去的战友和信任的人冷若冰霜

地说："你让位吧，这是时代的要求。"想想昂纳克将如何接受政治局让他下台不当总书记的要求，真使我感到痛苦。在这种场面看到他，我很难过。其他政治家可能会笑话这种伤感。但我是这样的。甚至现在，当我写这本书时还是这样。

然而这种感情不能成为我作决定用的尺度。昨天，在莱比锡20多万人上街。人民要改变现状，国家迫切需要变革。要避免一场灾难，党的领导中深思远虑的人现在一天也不能再犹豫了。再等下去就意味着坚持过去几个月，以至几年的错误。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需要改革，我们必须处理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但这只有改变党的领导才行。

我坐公车从万德利茨到市中心的党中央大楼。一路上，想起了我的好朋友维尔纳·费尔弗，原先党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他去世太早了。那时，我和他很坦率地考虑过改变我们领导的政策。好几年前我们的思想已经达到了今天的地步。然而维尔纳的去世不仅是我们政治局令人痛心的损失，也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汽车行驶时，我回忆起昂纳克从华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布加勒斯特会议提前回国。那时我护送总书记回家，代理他的职务直到他做手术。之后硬让我去休假，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时期我不得不把这理解为放逐。在昂纳克手术及手术后不能执行公务时期，京特·米塔克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这一事实向我表明：昂纳克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让我的政治主张起作用，其原因是我对戈尔巴乔夫纲领的分析以及我那份被锁进保险柜里的对国内政局的估计。

我在迪尔哈根度过折磨人的假期，有很多时间思考。问题多得像门前波罗的海海滩的沙子。我仔细研究了为定于1990年5月15日至19日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而写的内部分析……设想了应急措施，也还有中期和长期发展问题，这些思想后来——在转折之后——成为我在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九、第十次全会上讲话的基础。我同柏林我信任的同志保持联系，但面对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和京特·米塔克的权术，这只是增加我的不安。米塔克也多次给我打电话，通报昂纳克的健康状况。这是在海边度过的可怕日子，谈不上休养。而为了完成面临的工作，本来我可以在那儿好好休息。

我已叙述过，在从北京回国途中如何起草那份被昂纳克称之为对他人身攻击的政治局声明，但由于党的领导内部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他已不能阻止声明的通过。10月12日我国公民在报上看到这一仍带有妥协性质的文件。他们不是人人都会明白，这中间包含着多么艰苦的路线斗争。人们读了这份声明一方面会说："啊，终于来了！"另一方面又不满足："就这些吗？"但政治局内部已经明朗，我们政治决策的天平将倾向哪一边。

10月13日我们曾去莱比锡，接着在党中央大楼让昂纳克在保证莱比锡星期一游行和平进行的国防委员会命令上签字。

10月14日星期六。在这个周末进行了有关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议程的内部讨论，会上必须决定党的领导换人。我先找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我们很快取得一致，在政治局会上要求解除昂纳克的职务，由斯多夫来提议。

次日星期日晚上，在前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政治局委员哈里·蒂施的家里举行三人会晤：蒂施本人、京特·沙博夫斯基和我。我们商量了10月17日的程序。原先我们主张，几个政治局委员在星期二早上决定性会议前半个小时到昂纳克那里去，直率地对他说："埃里希，我们认识到我们党的领导需要有个变动。形势发展迫使我们走出这一步。请你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予支持。"这几个政治局委员是：维利·斯多夫，京特·沙博夫斯基，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埃贡·克伦茨，库特·哈格，哈里·蒂施和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这当然是一种很合乎情理的解决办法，但斯多夫提出了无疑是中肯的异议：如果七个人去，那么总书记可能会问：是谁派你们来的？那就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宗派去找他。如果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向昂纳克提出要求，那就好些。

当我星期二不到8点在党中央院内下车，乘电梯到三楼，走过通向我办公室长长的走廊时，必须经过昂纳克的办公室门口。他还没有到，他通常近9点来。我心神不定，两位女秘书一定感觉到了，这天早上的问候比平时严肃。我踏进办公室，电话铃已经响了。沙博夫斯基打电话给我鼓气，说了"全看今天的了！"之类的话。我自然很激动。到10点开会前的这两个小时对我就像是永无尽头。我想幸好只需经受这一次。

不到10点，除了在尼加拉瓜的大将海因茨·凯斯勒，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到齐了。25位同志，加上凯斯勒26位——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数最多的政治局。昂纳克像平时一样在会议桌首坐下。他宣布开会，提出议事日程。议程不如说是些无

关紧要的事，连总结那次与各专区第一书记相当有争论的会议都没有列入。

昂纳克问："对议程还有什么建议？"此时维利·斯多夫发言，既不抬高也不压低声调地说："是啊，我提议：第一项议程——解除埃里希·昂纳克的职务，选举埃贡·克伦茨当总书记。"昂纳克反应很平静、克制，仅仅说："那好吧，现在开始发言。"我当时觉得，今天也还要这样讲，从人情上说我被他这种态度深深感动。不管该怎么指责昂纳克的错误政治决策，但他在这一刻神情坦然自若。显然使他很伤心的是，讨论更换领导时京特·米塔克要求发言，这一点我们每个与会者都有同感。

米塔克早就看出风向，并一如既往地随风转舵。他第三个就发言说："我也同意。"尤其是他的补充使我们大家莫名其妙，他说："早就该作这样的决定了。"这话恰恰出自此人之口，这个自称是昂纳克最好的朋友和顾问，并确确实实促使总书记作出错误决定的人。这是卑劣的态度，大家一定都这样想。于是政治局的反应也很快：米塔克和主管新闻媒介的党中央书记约阿希姆·赫尔曼同样下台。有关决定以及提我当总书记候选人的提议一致通过。表决还是昂纳克主持的。

此后在昂纳克办公室里，我同他就明天第九次中央全会的声明取得一致。他在声明里宣布，由于健康原因辞职。我知道这将引起一连串的做事不彻底，对新的开端是个严峻的考验。但不管别人怎么指责我，当时我只能这样做。如果今天我再处理同样的情况，我将会说："是的，我同意当总书记，但只有在下述前提之下：首先召开一次特别党代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而且是马上开，以便选出新的政治局。其

次，授权总检察院调查所有已发生的违法情况。”然而，遗憾的是历史并不按照人们事后明白过来时的愿望发展。当时的情况，就是我叙述的那样。

10月18日早上8点，我召集统一社会党各专区第一书记来柏林，向他们说明政治局的决定。昂纳克、米塔克和赫尔曼已不再参加这次会议。更换干部的提议得到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会赞成政治局的提议吗？今天要见分晓。但愿所有中央委员还能及时收到开会通知。

四、50天接受的“遗产”

10月18日我刚一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就从西方报纸上看到：“克伦茨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解决。”这说中了，我们一些政治家也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很少有人猜到我也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在后来。因为，我越来越详细地了解所接受的“遗产”状况；一些站在我一边，其中一部分确实致力于转折的同志卷入腐败事件的消息越来越令人痛心；由于转折一开始在内容和人事问题上就不彻底，我们越来越落在基层党员的要求后面；凡此种种我越来越没有把握，不知自己坦诚的意图是否能够实现。

在党中央第九次会议上我就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我说：“我们正经历着矛盾的激化……国民经济、国内商业和外部市场的问题日益增多。为居民供应符合需求的优质产品方面有待解决的问题成堆。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现象越来越多。有关工资政策、补贴和社会福利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我补充说：“十几万人——其中许多年轻人——离开我们国家出走。这是复杂局面的又一征兆。”

在十中全会，我进一步探讨原因，指出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不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估计形势的基础上。“因客观发展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越来越多的主观判断错误而产生的不良现象在许多领域蔓延：在经济、信息政策和新闻媒介，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在国民教育，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工作，还有在我们党内。”当我透过日常生活的具体现象观察时，“遗产”就这样呈现在我面前。何况我不能那么轻松自在地面对新的前景，担子就更重了。多年来我是政治局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对错误也负有责任。但我真心诚意地愿意承认这些错误，并提出了党为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所负的责任是：“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应该是：党通过向自己本身提出最高要求来维护领导权——运用民主和科学潜力为解决面临的问题预作准备，进行令人信服的社会协作，善于在同社会各种力量对话中学习，党员负起职责，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艰苦地工作。”我认为今后统一社会党不能再用行政命令，而只有通过工作成就才能在社会中起领导作用。因此在人民议院第十三次会议上有充分理由从民主德国宪法中删去了统一社会党的——正是用行政命令规定的——领导地位。

但是该怎样同时抓所有这些日常工作和战略任务呢？每时每刻都要准备出现新的丑闻或问题。我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地感到问题的压力：我们不仅行动太晚，而且想到作准备也太晚了。我们简直是毫无准备。

我还认为，我们对——主要是青年——党员同志们的倡议反应太迟。在那几个星期里他们来找我们，带着有些当时看来不一般的建议。虽然我们试图在制订行动纲领时纠正这一错误，但已丧失了时间和机会。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

我曾指望有些人的帮助，而他们却小心地退缩了。也许因为他们认为，我的当选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解决。我们在选举新政治局时的不彻底性也造成了恶果。中央委员会犹豫不决以及基层党员中对无法接受的决定的不满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工作瘫痪。尽管如此，我试图完成我的政治任务。

我像昂纳克一样担任三个职务：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是严重的错误。我身兼三职并非出于贪权的虚荣心，而是当初认为，鉴于最初政治局内部不完全明朗的力量对比，这样可以保证转折不可逆转。后来很多人正是把这一事实看作是个人权力膨胀的复活加以反对，游行时打出“使人民议院成为对克伦茨的检查站”① 等口号，这时我认识到身兼三职是个错误，但我只能，也必须坚持到底了。也许我应该早些纠正，早些听取善意的劝告。其实我也化了很多时间通过许多谈话征求意见。低估会见群众，尤其是会见劳动群众的意义是目光短浅的。因此在我当选总书记的第二天，便在柏林“十月七日国营联合企业”早班时去那里同人们交谈。后来还去了“贝格曼·博尔西希”机器制造厂以及与莱比锡市民对话。

我当选为总书记之后立即会见福音教会领导人会议的代表：全国大主教维尔纳·莱希博士、主教克里斯多夫·德姆克博士、教会监理会主席曼弗雷德·施托尔佩和民主德国教会联盟秘书处主任兼高级教区委员马丁·齐格勒。齐格勒后

---

① “对克伦茨的检查站”（Krenz-Kontrollpunkt）是德文“边防检查站”（Grenz Kontrollpunkt）的谐音。——译注

来是"圆桌会议"主持人之一，成为通情达理的调解人。

1989年10月23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我同戈尔巴乔夫一次电话谈话的内容。苏共中央总书记再次热烈亲切地祝贺我当选。我向戈尔巴乔夫重申，两党、两国的兄弟联盟是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基础，戈尔巴乔夫一向清楚这是我的政治主张。他邀请我访问苏联。11月1日我在莫斯科会见了他。

戈尔巴乔夫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在欢迎仪式之后就鼓励我。他认为，我不应被我们面临的问题吓倒。他从亲身经验十分清楚地知道，因为还有这么多的问题要解决，有时使同志们感到沮丧。即使出现感情冲动、激烈的争论，也不能忘记：马鞍已备好，任重道尚远。

我回答说，我们很认真对待戈尔巴乔夫这句话："过于迟缓，必然受到生活的惩罚。"但由于党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已经遭到破坏，人民对党通过新闻媒介制造与实际生活不符的海市蜃楼很反感。许多问题成堆由来已久。同时我表示道歉，由于我们领导目光短浅的错误决定使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这是我国无论青年还是老年人都不能理解的。但我们现在已经撤销对《伴侣》杂志的禁令①，并给予我们的新闻媒介一切报道自由。我的原话是："民主德国的问题现在不再通过西方传入民主德国，而是在我们自己国内讨论。"

然后，我向戈尔巴乔夫介绍自他10月初访问民主德国以

① 1988年11月19日民主德国禁止苏联杂志《伴侣》(Sputnik)在境内发行，理由是该期《伴侣》对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大林的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昂纳克下台后，民主德国政府撤销禁令，恢复《伴侣》杂志的发行。——译注

后发生的事情。他自然消息很灵通，但我重视阐明我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此外也谈了我们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

戈尔巴乔夫同志注意地听我说，他答应苏联将尽全力认真执行对民主德国已承担的经济义务。我听到此话自然感到很大的宽慰。然后我们谈到国际问题，也谈了两个德国的问题，当时还看不到这个问题如今具有的性质。但我必须重复一下，戈尔巴乔夫当时已丝毫不认为德国问题的现状具有永久的意义，而认为在全欧接近的范围内发生变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当然那时他设想的时间与现在出现的情况不一样。当我仔细考虑戈尔巴乔夫的话时，也有我的设想。

接着我们一致认为不能全盘否定过去，这样做是不尊重我国人民迄今取得的成就。确切地说，问题在于复兴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合列宁精神的社会主义、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

道别戈尔巴乔夫时，我感到从这次谈话吸取了工作的力量。政治家也有绝对需要“加油”的时候。我在莫斯科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由于疏忽，我在一个重要表态的措辞上出了差错，可能引出错误的解释。我说到，“我党开始了转折”。但当时我本想说，“我们在党内开始了转折”。于是许多人理解为：根本没有人民争得的转折，转折是党一手从“上面”搞的。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对这一口误我感到遗憾。

记者招待会后，我立即飞回柏林。

两天之后，我向我国公民发表电视讲话，预告实现“转折”的“行动纲领”将在已召开的十中全会上讨论。同时宣布赫尔曼·阿克森、库特·哈格、埃里希·米尔克、埃里希·米肯贝格和阿尔弗雷德·诺伊曼本人要求辞去政治局委

员的职务。

11月4日柏林举行一次“下面”组织的大规模游行。游行由柏林戏剧工作者发起，50多万人参加市内游行，接着在亚历山大广场集会。他们与人民警察事先谈好互相保障安全，还合作得很好。柏林的艺术家身披写有“不要暴力”的绿色绶带。这一思想后来无数次重复。民主德国电视台实况转播游行和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演讲。我们经历着一种全新的政治空气，它能包容讽刺、想象和诗意，但也容易被破坏。我们看到怎样产生着新的偏狭。逆着人们的期望很难在广场上讲话。我回忆京特·沙博夫斯基上台对着扩音器喊：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我们大家都走上对话的道路。但人们却不愿听他的。

早就该提出更为幽默、深刻的口号了。现在出现了大批口号，人们自己制作标语牌，自己扛着。据我了解，这些标语被当作当代历史文物保存了起来。但我也想起在亚历山大广场演讲中许多我认为重要的段落。例如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说：“我希望大家想到一个老人，一个现在也许很孤独的老人。我说的是埃里希·昂纳克。此人有一个梦想，为这梦想他不惜坐牢。后来他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这不是好的机会，因为被打败了的法西斯主义和极其强大的斯大林主义是接生婆，于是产生了一个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的社会……我相信，对这个老人来说，我们的社会也决没有实现他的梦想……我想到这个老人只是为了提醒我们，现在不要也建立起一种体制，有朝一日我们会束手无策任其摆布。让我们建立一个在法律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一种人们可以诉诸法院而获得的法律基础。建立一种不是漫画式的社会主

义；一个适合于人，而不是使人隶属于体制的社会。”

施特凡·海姆说：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克服了语言上的困难，现在正在学会挺起腰杆走路。他补充说：“但是说话，自由地说话，走路，挺起胸膛走路，这还不够。让我们也学习掌权……”这个权大家都应该有份。“无论谁在哪儿掌权，都必须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

克里丝塔·沃尔夫说：“我要说说‘革命的改革’。革命从下而起，下和上在价值体系中倒换了位置，这一倒换就把头朝下颠倒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放正了。伟大的社会运动正在发展。在我国还从没有像这几个星期说得那么多，互相谈得那么多，从没有这样的热情，这么多愤慨和悲伤，也从没有这么多希望。我们要利用每一天，我们不睡觉或者睡得很少。我们与原先不认识的人交朋友，痛心地与另外一些原以为了解的人辩论。这就叫‘对话’。我们曾要求对话，现在这个词几乎听得太多了，但却还没有真正懂得它要表达的意思。我们怀疑地看着有些突然伸出的手，看着有些原先呆板的面孔。怀疑固然好，检验效更高。我们用曾经压制、伤害过我们的旧口号随即回敬对方。我们害怕被利用，但又害怕拒绝了真诚的建议。整个国家就处于这种矛盾之中。我们知道，必须掌握这种艺术，即不让矛盾转化为对抗。这几个星期，这些可能性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只能给我们一次。”

前国家安全部负责谍报工作的副部长马库斯·沃尔夫，也是《三驾马车》这本引人注意的书成功的作者，在广场上讲话不容易，因为他审慎地反对把他过去部里的工作人员不加区别地当作国家的替罪羊。当然他赞成不偏袒地调查每一项指控、每一桩不公正的事，确定责任，公开、公正地对待有关人员。沃尔夫关于非暴力的话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

说："过去在战后，每当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或领导变动，人们感情冲动地上街、到广场去提他们的要求时，事情就升级，就流血、死人，常常死很多人。现在人们对我国人民，也包括在这里广场上的人的慎重只能表示钦佩。10月9日以来没有再流血，让我们保持这样。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使理智占上风。让我们共同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社会主义和名副其实的民主联结起来。也许我们可以向给我国带来改革和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人回赠一些勇气和希望。"

格雷戈尔·居西，当时还作为热心的律师说话，演讲的结尾特别打动人：他祝愿所有需要电话的人都有一部电话，而一句日常用语："这话我最好不在电话里说"在这个社会里将成为无的放矢的话。

四天后11月8日，统一社会党中央举行第十次会议。当时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在准备全会时，赫尔曼·阿克森、库特·哈格、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埃里希·米尔克、埃里希·米肯贝格、阿尔弗雷德·诺伊曼、霍斯特·辛德曼、维利·斯多夫和哈里·蒂施通知我，他们将不再当政治局委员候选人，要把位置让给年轻些的人。于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对提名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逐个表决。

全会一致确认我为总书记。接着由157名有选举权的与会中央委员经认真协商选出下列政治局委员：汉斯—约阿希姆·伯梅（66票反对）、维尔纳·埃贝莱因（一致通过，同时被选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赫格尔（一致通过）、维尔纳·雅罗温斯基（3票反对），海因茨·凯斯勒（2票反对）、西格弗里德·洛伦茨（一致通过）、汉斯·莫德罗（1票反对）、沃尔夫冈·劳赫富斯（4票反对）、京特·沙博夫斯基（一致通过）、格哈德·许雷尔（7票弃

权）。

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约翰内斯·克姆尼策（10票反对，8票弃权）、英格·朗格（10票反对）、玛加丽特·米勒（一致通过）、京特·西贝尔（一致通过）、维尔纳·瓦尔德（5票反对）、约亨·维勒丁（一致通过，此前一致把他从中央候补委员选为中央委员）。全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书记：埃贡·克伦茨、约翰内斯·克姆尼策、沃尔夫冈·赫格尔、英格·朗格、西格弗里德·洛伦茨、沃尔夫冈·劳赫富斯、京特·沙博夫斯基、京特·西贝尔和约亨·维勒丁。全会提议克劳斯·赫普克主管文化，格雷戈尔·席尔默教授主管科学、教育。由于这两人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党章没有规定增选中央委员，于是选举赫普克为政治局文化委员会主席，席尔默教授为政治局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席。后来他们以这个身份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选举新政治局时，霍斯特·多卢斯、京特·克莱伯和格哈德·米勒没有得到必需的票数。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人民议院统一社会党议会党团建议，在组成新政府时提名选举汉斯·莫德罗为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

下午，柏林统一社会党基层组织的党员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的党中央大楼前集会。黄昏时人越来越多，他们高呼："统一社会党采取攻势"，"社会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转折"或者"统一社会党＝社会主义、诚实和民主"。演讲者痛斥党的领导脱离基层，纵容弄虚作假和教条主义。人们齐声呼喊要我到话筒前去，但此刻我还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也许我们应该中断会议到前面广场上的群众中去，这样更好。

京特·沙博夫斯基临时离开会议，已在那儿与集会的党

员同志们见面。不到下午6点我发完言也到党中央大楼前的游行群众中去。面对游行者提出的许多——部分是有争论的——要求我说，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开始讨论，我不愿，也不能在会议作出决定之前表态。但答应全面认真讨论大家提出的问题，包括召开一次特别党代会的要求。集会结束时唱了国际歌。

第二天上午十中全会开会时，得悉统一社会党各专区领导作出了与全会不同的决定，不同意前一天选出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这导致了解除汉斯—约阿希姆·伯梅、约翰内斯·克姆尼策、维尔纳·瓦尔德和英格·朗格上述职务的决定。

虽然有人建议召开特别党代会，但中央委员会决定1989年12月15—17日在柏林举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三天后在基层组织的压力下，不得不撤回该决定。

人民议院第十一次会议选举德国民主农民党主席京特·马洛伊达为新的人民议院议长，马洛伊达同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曼弗雷德·格拉赫竞选获胜。汉斯 莫德罗被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受命组织新政府。莫德罗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政策的支持者。在昂纳克时期作为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专区第一书记，他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地方政策很不容易。

11月29日根据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为罗伯特·哈韦曼、鲁道夫·赫恩施塔特和莱克斯·恩德恢复名誉。他们在50年代因错误的指控和所谓宗派活动被开除党籍。同一天我在《为我们的国家》呼吁书上签名。前一天，我国的知名人士为坚持民主德国的独立性发出呼吁。在给呼吁书倡议者的信中我声明："我们负有历史责任，要把这个具有反法西

斯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传统的国家保存下来，作为德国未来发展中的一种社会主义选择。”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在呼吁书上签了名，其中有汉斯·莫德罗。

11月的最后几天，党内党外的问题尖锐到新选的政治局已无法继续工作。由于不断地修正政策，也由于我自己的缺点，我作为总书记的回旋余地也小到极点。在这种情况下，12月3日星期日召开了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上最后一次中央会议。会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辞职，成立了以新当选的埃尔富特专区第一书记赫伯特·克罗克尔为首的工作委员会继续筹备特别党代会。

12月3日这一天对我是痛苦的日子，尽管我知道九中全会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我对要解决的问题之多不存幻想，不排除在解决问题时要失败，然而我曾希望，我们能成功地使党再次走出谷底，使她强大，使她获得新的民主特性。我在党中央主持最后一次会议，把党今后的命运——也许有点儿太直接了——交给工作委员会。以后工作委员会决定党代会议程并组建新的工作小组筹备党代会。

12月4日星期一，我同莫德罗一起飞往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领导人会晤。这次工作会晤是应苏联邀请举行的，目的是通报苏美马耳他首脑会晤情况。莫斯科会晤的参加者很注意地听取关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条约共同体的考虑。这是我作为国家元首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

不少同志和朋友要求我别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我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我也没有能力适应当时的混乱来完成这个任务。

因此12月6日我向国务委员会声明：“为了有利于民主

德国的稳定和我国必要的革命改革，我辞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希望，民主德国人民不让自己奋斗得来的改革进程发生逆转。但我们也要看到反社会主义力量对我们祖国的威胁。每一次革命都蕴育着反对力量聚集的危险。这些反社会主义力量想要打掉我国人民的自豪，出卖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大家应该共同来防卫。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所有关心这个国家的人出于爱国的责任心必须团结在一起。”

曼弗雷德·格拉赫代理国务委员会主席。从10月18日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起，我任职50天到此结束。后来我作为罗斯托克的代表参加统一社会党特别党代会，会上统一社会党改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ED/PDS）。

沃尔夫冈·赫格尔、沃尔夫冈·劳赫富斯、赫尔穆特·塞梅尔曼、维尔纳·雅罗温斯基、西格弗雷德·洛伦茨、京特·沙博夫斯基、京特·西贝尔和我交给新当选的党主席格雷戈尔·居西一份报告，题为《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原因》，并附一封给他的信。这份报告当然不可能再由辞职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通过了。虽然党代会上散发了报告，却没有受到多少重视。

几周以后，我和几乎所有的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起被开除出党。这确实是迄今为止我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事。尽管仲裁委员会里那些真正了解我的同志投票赞成我留在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内，但这也不能使我感到安慰。我怀着矛盾的心情接受这个决议，没有交出我的党证，虽然要求我这么做。

现在我的党就只叫“民主社会主义党”了（PDS）。我不是她的党员，但这是我的党。我承认，如果朋友们称我“克伦茨同志”，我感到高兴。我信任莫德罗和居西的力量和深思远虑，衷心祝愿他们今后工作成功。

我果然是“过渡人物”。我能忍受这一点，因为这是一次和平过渡。我们至少为党的革新创造了条件。在莱比锡关键的时刻，我们力主非暴力。革命是和平进行的，没有流血。

还有：我们打开了墙，因为人们不愿再隔着墙生活下去。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值得单写一篇。

第 三 章

柏林墙开放之际

一、11月9日清晨

11月8日到9日的夜晚对我来说是短暂的。我睡了三个小时．使我心境难平的政治问题就象恶梦一般重压在我的身上。

昨天起举行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中全会。自从昂纳克在上次中央全会上被解职以来，已过去了三周。我们的国家处于一种灾难性的政治、经济状况之中，民主德国公民移居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浪潮仍持续不断。显然，在这样一种变革形势下，党内外各种政治派别的利益会纷纷暴露出来。我们始终关心的共同目标是：确保我国革命变革的和平性质，履行我们的联盟义务，注意根据变化了的条件理智地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为同国内反对派的合作建立更加充满信任的基础，共同对付正在出现的右翼激进倾向，使这些不正常日子里的生活尽可能保持“正常”。另外，还有政治局的人事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前一天引起了激烈争论。

当我5点醒来起身时，这些问题立刻再度向我袭来。怎样才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好像向我们提出了一道求圆

的面积的习题。外面天色尚暗，下着蒙蒙细雨。我想，恰恰在今天的马拉松会议之前，早晨跑上五公里还是有益的。在慢跑时，我头脑里一直在考虑这即将开始的一天，清理思绪。然而这一天最重要的事件，即开放柏林墙此刻还不可预见。

约7时45分我到达党中央大楼的办公室后，翻阅了当天新闻，看了有关昨天中央全会的报告。当我读到一份关于柏林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在党中央大楼前举行示威游行的报告时，不禁马上又生自己的气了。为什么不给这些抱着很大期望来到党中央大楼的同志们鼓鼓气？为什么不采纳他们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的要求？我当时遵循的是党中央内占优势的一种看法，认为筹备党代表大会太耗费时间，召开党代表会议足可以评价国内局势，并进一步作出必要的人事决定。但是基层的许多同志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出现了争执。

当时还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的《新德意志报》，在头版刊登了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致民主德国人民的呼吁书。头天晚上，她曾在电视里宣读过这份呼吁书："我们大家深感不安。我们看到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我们国家。我们知道，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天的错误政策，加强了他们对革新这个社会的不信任。我们明白，面对群众运动，言语是软弱无力的，但我们除了言语之外没有其他手段。现在还在出走的人们，减弱了我们的希望。我们请求你们，留在你们的家乡，留在我们这里！我们所能允诺你们的，是一种并非轻松、然而有益和有趣的生活；并非迅速富裕，而是共同参与巨大的变革。我们愿意为民主化、自由选举、司法安全、迁移自由作出保证。不能不看到，数十年之久的扭曲在几周内迸发了出来，我们刚刚处在我们国家根本变化的开始。请你们帮助我们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

它保留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幻想。如果你们同我们一起防止民主社会主义重新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不是梦想。我们需要你们。相信你们自己，相信愿意留在这里的我们。”

在呼吁书上签名的除克里丝塔·沃尔夫外，还有诸如福尔克·布劳恩、路特·贝格豪斯、克里斯多夫·海因、斯特凡·海姆、库特·马祖尔、乌尔利希·普兰茨多夫等著名艺术家，以及“新论坛”的贝贝尔·伯莱、“民主觉醒”的艾哈德·诺伊贝特、社会民主党的乌塔·福斯特豪尔、“现在就要民主”的汉斯—于尔根·菲施贝克、“和平与人权”倡议组织的格哈德·波珀。这份呼吁书也给我带来了勇气。同时，我不由得想到，有多少在这份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呼吁书上签名的人过去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们是我国错误的安全主义的牺牲品，曾遭到监禁或被驱逐出境，有的长时间只能在西方出版他们无疑是民主德国优秀艺术的作品。而现在他们却面向我国人民，坚决请求：留在我们这里！相信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恰恰信任是如此的重要。在民主德国，许多许多的人失去了信任。

翻阅当天新闻后，我又阅读来信。许多来信都是集体写给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基层组织的党员写道：我们想知道过去的全部真相！基层组织要求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或特别党代表大会，许多人主张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共产党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也有人为拟议中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行动纲领提出了具体建议。但最主要的依然是对新旅行法草案的不满，这种不满来自居民的各个阶层。

我想，目前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在六周前，这项“出国旅行法”草案(已在11月6日报上公布，供广泛讨论)一定会使大多数人感到兴奋不已的。但这些日子事态发展太快，以致

于昨天的事情马上就变得陈旧了。来信主要批评法律草案中还有那么多不批准的理由，也提到了其他的官僚主义障碍。一位来信者的要求表达了群众的普遍看法，他说："我就想凭着身份证出境旅行，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乐意。"意见最大的是这一条：如果"出于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卫生、道德或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可以拒发签证。

在批评这一限制时，公民以往同当局打交道的经验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又看到了以前经常遇到的约束和随意决定的危险。由于我了解这种普遍的情绪，所以我在回答西方记者关于法律草案是否已经完善的提问时，予以了回避："如果我相信它是完善的，我们就无需将它付诸讨论了。我要说，人民将使它完善。"

事实上，也正是后来群众中极为不同的看法，促使我再一次在政治局提出对旅行法草案进行实质性修改的问题。

11月7日，我请代总理斯多夫和内务部长共同提出建议，怎样在人民议院最终制订和通过旅行法之前能够订出满足公民对自由旅行往来所抱期望的规定，并请外交部长同我们的盟友商讨此事。

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看了看表，时间已是9时30分。我必须马上结束对来信的审阅和处理，前去参加中央全会。我要再次请斯多夫加快制订关于改进旅行往来的规定。我从苏联朋友那里获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凡涉及民主德国的事情，必须由民主德国来决定。当然我仔细考虑过，莫斯科衡量我们一切决策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缓和政策以及建设欧洲大厦。毫无疑问，"旅行自由"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内容要比仅仅准备一项有关的条例多得多。首先必须谨慎地并从联盟的角度考虑可能产生的影响。决定一切

的结论是：推倒大墙。但这是德国和欧洲战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二、对民主德国公民的禁锢

当我考虑可能开放柏林墙的时候，我也在日夜不停地思索着这个两德现象的发展历史。

1989年5月7日地方选举的前一周，匈牙利开放了它同奥地利的边界。人们把铁丝网当作纪念品一份一份地加以出售。当时尚无迹象表明，不久就会出现无疑是1961年建造柏林墙以来民主德国规模最大的出逃浪潮。但我们还是预感到可能要出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匈牙利是民主德国公民喜爱的度假胜地，此外通向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黑海海岸的全部过境交通也都经过匈牙利，当时还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我们想，匈牙利边界的开放虽然还不适用于民主德国公民，但会对我们去匈牙利的旅游者提出考验吗？当时匈牙利当局禁止民主德国公民进入奥地利，但这还能坚持多长时间，“绿色边界”会出现什么情况？

夏天，学校开始放暑假，我们有些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民主德国公民驾驶的小汽车像洪流般地涌向匈牙利—奥地利边界，也有人乘坐火车或飞机到达，他们通过出高价找“黄牛”带他们出境。其中许多人被匈牙利边防哨抓获，并在旅行证件上盖章“加注”。他们后来大多留在匈牙利，企图在什么时候重新一试。与此同时，联邦德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也开始人满为患，8月7日有200人在那里住宿，而且越来越多。我们政治局主要认为，这是联邦德国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收容呢？8月19日，“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奥托·

冯·哈布斯堡及其“泛欧联盟”在奥地利—匈牙利边境举行了一次所谓“和平野餐”，事先有目的地在民主德国度假者中散发了传单，数百人赶来并冲破了匈牙利一侧的边界栅栏。士兵们躲闪开了。

越来越多的企图出境的民主德国公民来到匈牙利，当然造成了外交关系中的紧张气氛。我记得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同匈牙利外长霍恩·久洛有一次谈话，谈话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举行的宴会上进行的。“民主德国显然在对匈牙利进行一场新闻战”，他在这次颇令人不快的谈话开始时就这么说。我不同意“新闻战”的说法，而代之以“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但霍恩仍坚持并问我们是否知道，公开论战将走向何处；说谁开始的，就必须准备得到相应的回答。我明显地感到我处于守势，因为事实上我们对匈牙利诸如市场经济、反对派、多元化、革命和反革命等观点的确不乏批评之词，但我坚定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辩护。最后，我对霍恩说的这一点表示满意，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介已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了。当时我还不想接受，我们不久应该同样这么做。

霍恩谈话中的另一点倒使我更感兴趣。他告诉我，下星期五将举行卡达尔·亚诺什的葬礼，此事已向各社会主义兄弟党作了通报，但未发出邀请，是否派遣代表团由各党自行决定。霍恩以同样的口气指出，卡达尔的葬礼是在纳吉·伊姆雷被恢复名誉四周后举行的。

我力图把这两件事区分开来。我简要称赞了卡达尔的毕生事业，说他毕竟是由于错误的指控在1951年被捕、直至

1954年才被恢复名誉的，兄弟国家的正统势力往往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讥为“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同时我强调，为纳吉恢复名誉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事情。当然我并不讳言，1956年我作为大学生曾见过，匈牙利共产党人是怎样被吊死在树上的。

霍恩说，他是匈牙利现代史审查委员会成员，可以说，在匈牙利人民起义事件中之所以出现过激行为，是因为人民对匈牙利40、50年代迫害的情绪极大。拉科西是斯大林的优秀学生。可以认为，匈牙利的迫害并不逊于苏联30年代的迫害。相反，匈牙利的迫害更加残酷。

我争辩说，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这是违反当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霍恩答道，纳吉所做的一切，事先都同苏联同志商量过；纳吉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考虑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分歧。赫鲁晓夫经过较长时间的争斗显然占了上风，并命令苏联军队进行干涉。纳吉正是想通过退出华沙条约来阻止这一点。我未来得及作答，因为齐奥塞斯库宣布宴会结束了。

1989年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宣布，自午夜起也对民主德国公民开放通向奥地利的边界。《新德意志报》根据德通社一则几乎不可能在通讯社撰写的报道这样记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据布达佩斯消息，滞留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德国公民，在违反国际法条约和协议的情况下，在一个雾夜行动中得以非法经奥地利边界前往联邦德国。这是对民主德国内政的直接干涉，在打着人道考虑的幌子下，进行有组织的人口贩卖活动。必须遗憾地指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竟然违反协定和协议，支持联邦德国这一蓄谋已久的行动。”

民主德国领导人对匈牙利决定单方面废除协议感到非常恼怒，他们指责匈牙利人被联邦德国的许诺收买了。

匈牙利外长严厉拒绝了这种说法。但我们的正式观点仍然是：波恩代表利用匈牙利的态度为其反社会主义和复仇主义的目标服务，而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国家表现了忍耐、灵活、坚定的原则性。《新德意志报》一篇评论称，民主德国仍准备"实行宽容，使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想离开我们共和国的有关公民回到法律和秩序的道路上来"，这符合"我们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可惜这个建议并没有改变"有关公民"离境去西方的行动。要是我们能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一含糊不清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并为我国引出结论，那就好了。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把我们未解决问题的过失推到匈牙利同志身上。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同样挤满了民主德国难民。我们先让我们的盟友"去干"，只是当共和国成立40周年前夕每天有数百人进入布拉格使馆，并在世界公众面前出现一幕幕令人震惊的场面时，我们才行动起来。同情是没有的。昂纳克的看法是坚决的：不为出走者感到惋惜！只是邀请了全世界国宾前来参加的庆典不能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对占领使馆者采取了一项快速解决办法。

9月30日，联邦德国外长根舍走上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阳台，赶在电视台播放新闻前，宣布了民主德国准许出境的消息。不难猜出根舍这么做的目的，当然他与这个行动本身毫无关系。运载着几千名民主德国公民的专列刚刚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向西驶去，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又复人满为患。赴捷克斯洛伐克的免签证来往暂时宣告中断。10月4日又有一辆专列运载几千人，从布拉格郊区一个小车站出发驶

向联邦德国。此时，民主德国方面不幸作出了一项错误决定：行车路线要经过民主德国领土。这就使我们在国内增加了一个问题：年轻人沿着铁路线纷纷往列车上跳。在被封锁起来的德累斯顿中心车站前出现了混乱的情景，人们同警察发生了冲突。令人不快的场面再次传遍世界。这时，离我们的国庆节只有三天。

到11月9日我们开放柏林墙和通往联邦德国的边界时，已有30余万人通过不同途径到达了西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必然在于社会状况，但同这种现象的真正交锋还一直没有展开。

如果把大规模逃亡归咎于人民对分成两个国家始终抱有反感这一点，则不免过于简单了。“柏林墙必须消失”，这一呼声几乎长时间无人赞同，尽管今天不再有人为这一冷战残余物的倒塌而感到惋惜。许多人自然忘记不了，在当时边界开放的情况下，投机商和从事非法劳动者大发横财，而我们的人民在商店里买一块黄油还得出示身份证。在西柏林兑换所，联邦德国马克这一偶像可按投机比价兑换成民主德国货币，它在1961年导致了民主德国劳动力黑市的兴盛。正式登记的经常出入国境者有65000人，加上无法统计的临时工、清洁工等，实际上超过10万人。诱使专家离开更是经常发生的事。对于这种不花钱就把人带出境的高超本领，规定了人头奖，有时竟达四位数联邦德国马克。大康采恩在西柏林设有合法的策反办公室。像民主德国这样一个具有较大战后负担的国家——与较富的邻居西德相比——不可能长期承受得住。开放边界给民主德国带来的损失达1000亿至1300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向战胜国支付的赔偿。

我们许多人一谈到边界和柏林墙时，就会想到这些事实。努力阻止廉价拍卖民主德国的决心，要比西方一般认为的更大。现在人们由于对开放边界感到喜悦，可能以为这是一句可怕的话，但我不害怕把它说出来：柏林墙作为现状不可侵犯的象征，在10年后对缓和起了促进作用。从此冷战宣告结束，东西方缔约政策的时代开始了。

但我要从今天的角度说：这不是全部的真理。把柏林墙看成是静止的建筑物和固定不变的划清界限原则的时间太长，而很少把它看作是一个活力政策应当提出质疑的对象。毫无疑问，几年来它变得开放了一些，旅行和访问来往有所发展，但这主要是从西方到东方。例如关于通行证协议，西柏林人据此可以探望他们在柏林东部的亲戚。当然在从东到西的方向上，也能比较宽容地解决民主德国公民的出境和旅行问题。

1975年签署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我们对此持何态度呢？

我们的做法就好像只存在“第一篮子和第二篮子”，即最后文件中关于安全、合作和经济协作问题的部分。但是当涉及到旅行来往中的迁移自由时，我们就羞愧地垂下了眼帘。

虽然不能不看到，1972年以来民主德国公民的旅行和访问来往有了显著发展。昂纳克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1988年仅去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公民就达600万人次。当然除了获准出差的“旅行干部”外，只有领养老金者和在“对面”有亲属的公民才有资格旅行。这就在民主德国公民眼里产生了一个分有两种等级的社会：一种人可以旅行，另一种人由于缺

乏亲属关系而没有这个权利。此外还有私人旅行中缺乏外汇的问题。这些情况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尤其是去社会主义国家度假也不断出现问题，主要是在兑换旅行支付手段方面规定的上限太低。

如果民主德国公民向往改善生活质量，旅行便是他们的头号愿望。其实，几十年来我们侵犯了一种重要的人权，这大大加速和扩大了出境浪潮，而我们的论据则是软弱无力的。在同联邦德国政治家或其他西方会谈伙伴的几乎所有讨论中，人们都向我们提出人权问题。假如有人不想认真同我们谈裁军和缓和，他只需要搬出“旅行”的话题，他知道他这样又可以处于攻势了。我们则用这种说法加以辩护，即这符合人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每当西方政治家会谈后离开国务委员会大楼或党中央时，就有人拿着信件和请愿书站在人行道旁，几乎总是涉及到一些未解决了的出境问题。

但也经常发生民主德国公民胆怯地隐瞒他们与西方完全是无害的联系。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的年代里，许多人中断了和亲戚朋友的关系，他们不愿影响自己的“干部档案”，因为决定一个职业之前，都需要在履历表上填写同西方的联系情况。这也许同当局的错误认识有关，以为通过这个办法就可以隔绝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当缓和时代开始时，政治家旅行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变得家喻户晓，我们国家电视台或西方电视上每天闪烁着民主德国政治家与西方同事握手的镜头。开展了频繁的旅行外交，但是公民本身却不能享受缓和政策的这一好处。

我们不遗余力地强调，旅行来往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经济障碍，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越来越大的反对，特别是年轻人提出问题：这怎么能同民主德国属于世界十大工业国的事

实一致起来呢？我们很少疏忽强调这一事实，因此现在就有义务解释，为什么我们对旅行中的迁移自由拿不出必要的外汇数额。

实际上，限制旅行往来首先是我们错误的安全主义的结果，害怕民主德国公民会像古代以色列人迁出埃及那样，尽管谁也无法估计，多少人去西方旅行时会最终离开共和国。我们只具有处理紧急家庭事务旅行的经验。我们常常对国际上的客人说，平均每年约有0.02％的旅行者不再返回国内。这个数字可能一度是对的，但据我了解，趋势是急剧上升。在访问旅行中不再返回民主德国的，1987年至少有0.22％，1988年为0.35％，1989年上半年为0.61％，1989年8月份达1％。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许多高等和专科学校干部，特别是医生、牙医、教员以及研究和开发方面的专门人才。

许多人离开我们国家，是由于他们的日常经历同新闻媒介把我们的现实描述得毫无矛盾不相一致。人们在自己企业里获得的主观印象以及通过与他们亲友的印象相比较，对民主德国经济稳定的信任感下降了。经济专家在为未能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准备的认真的内部鉴定中，证实了劳动者的“现场”印象，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我们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1986年）决定国民收入增长4.8％，但1989年年中预测表明，我们只能达到3.8％，这样就使我们减少了320亿马克国民收入，即840亿马克工业商品产值。人们一定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平时总是说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这也引起了群众的期望，但却不能完成全部的五年计划。生产性积累率下降已经是今后几年经济比例失调的前期行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已经在靠子孙后代来养活我们了。另据调查，生产设施的损耗程度达到55％，

在发展基础设施和地方城镇方面出现了复杂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总经理们提请注意，成品生产者和配件供应者之间的关系是灾难性的。难道这对劳动者的精神状态没有影响吗？不现实的计划和所谓的计划精确化，损害了人们对我们的经济模式以及社会主义生产能力的信任。按照五年计划决议，规定了231亿外汇马克的出口盈余，但实际达到的大大低于此数。

存在着隐性的物价上涨。价格低廉的商品越来越经常地从货架上消失，订购小汽车至少必须提前10年，对新的消费品质量低劣的意见越来越多，修理业、服务业的生产能力过小，想要安装一部电话可能成为一辈子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人也对我们社会福利政策的优越性提出了疑问。虽然医疗是免费的，但它的物质基础不断老化；我们尽管有发达的住房建筑，但住房政策是错误的，年轻人的许多希望在房管所变成了泡影。

但西方的希望却每天在陪伴我们，它们来自电视广告、包裹、带来的小礼品和外汇商店的供货。连孩子也问他们耸肩的父母：“为什么我们没有联邦德国那样的钱？”

此外，人们对我们的官僚主义态度感到厌恶。他们反感的是，从幼儿园起一切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他们向往拥有个性的活动余地；面对被剥夺了的决定权利，他们感到是无力的；他们产生了想解决官方认为根本不存在的矛盾的兴趣；他们想说一些同报纸上冗长的讲话不同的话；他们想发现和经历一些事情，但却好像被国家禁锢了似的；他们的旅行癖在增加。当这么多年轻人高呼“柏林墙必须消失”时，我们怎么想呢？这是反革命。但这些有前途的年轻人不仅是指业已变成石头的墙，他们也指不容异说、与世界隔绝、狭

隘的思维和清一色的想象，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渴望倒塌的墙。

三、小差错，大效果

11月9日10时，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中全会继续进行。我们经历了激烈的辩论，我记不清有多少人要求发言了。与以前不同，几乎每个人都想讲话，陈述基层组织的看法，提出如何能使我们摆脱危机的建议。不管观点怎样对立，我们都认为，现在重要的是采取建设性态度。这当然包含着一种危险，即我们又很快地转向现实政策中完全实际的事务，但另一方面，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过去和现在的问题。

因此，我在报告（我更多地理解为是讨论发言）开始时指出，我们的严重问题并非一夜之间，也不是从夏天才开始出现的。在拟订我国经济任务时，党的领导人的主观意愿起了作用。我们同苏联保持了距离。对生产力发展的新型进程，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趋势均未加考虑。严重的问题遭到了忽略，人们错误地认为，有朝一日可以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再加以解决。矛盾被排斥了，必要的答复被行政命令和监督所取代，民主成了一句空话，个性和职权日益受到轻视。

我谈及错误的经济计划的详细情况，但由于时间短暂，很难正确地把握和描述这一糟糕的遗产的各个方面。

我也没有回避出境问题。我在中央全会上这样说："8月份由于许多民主德国公民的离境出现了非常形势，激化的矛

盾突然从社会深处进入了公众意识。显然，积累了较长时间的未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严重冲突，从而使我国陷于一场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在持续。我们党中央致力于建设性的态度，目的是向群众和党员指明具体和可以理解的任务，以便在我国恢复社会主义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积极准备一个题为“革新的步骤”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行动纲领。中央全会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一位大胆的女同志首先说：“自从我1986年进入中央委员会以来，从未准确地向我通报过真实情况，我被欺骗了。”当时的建筑部长沃尔夫冈·容克提到格哈德·许雷尔的一份曾在1988年5月引起轰动的经济报告，在这份写给昂纳克的报告中，对京特·米塔克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提出了疑问。认真对待这样的呼声？昂纳克对他的朋友米塔克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许雷尔不得不因“偏离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而受到严厉处罚。

著名的泌尿科学家莫里茨·梅伯尔教授曾在苏军队伍中同法西斯作战过，他要求明确地赞成与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在民主德国革新社会主义。他生气地补充说：“在这里中央全会上，有些同志也不一定同意这种观点。”

赫尔曼·康德为这句话进行辩护，即人民的警察不应该殴打人民。他在谈到就10月7日、8日警察干预进行调查一事时，遭到一些中央委员的嘘声，但他勇敢地为自己辩护：“警察和人民警察之间的区别必须像私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区别那样明确。”

汉斯·莫德罗也许担心由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够激进而丧失时间，他说：“如果我们的反思还需要大街上的压力，我

们的勇气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我们的位置不放在人民对话的中间，那末我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利和信任，以在今后获得党和人民的赞同。”莫德罗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是一种完全正确的观察。基层组织对我们的推动要比我们在思想上给予他们的更多。但依靠本来就又成为问题的政治局，我很难做到这一点。辩论变得相当激烈，以往很少有的打断讲话的呼喊声充满了房间，我突然发现一个次要的问题：“记录员还听得清楚吗？”

我必须敦促及时地中断会议，因为文化部长汉斯—约阿希姆·霍夫曼请我中午休息时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约翰内斯·劳。他来民主德国，是为了参加当天在莱比锡举行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艺术文化展览”开幕式。党的前领导人曾决定，鉴于莱比锡的“政治动乱”而推迟这一活动。我担任总书记后最初作出的决定之一，就是不中断两个德意志国家文化工作计划的这一部分。

我以前曾多次见过劳，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个人谈话。谈话在国务委员会大楼进行，其内容我至今记得十分清晰。我们很快找到了一种相互间的个人联系。

时间迫使我们要谈得简短一些，我开始向劳介绍我国的形势。我对他说，民主德国的政治转折是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改革，是要建设一种经济有效、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着眼生态、道德纯洁和面向人的社会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革新路线确保了，除人民本身——民主德国的统治者外，任何人无权决定今后如何在德意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两个德意志国家理智地相互往来。

当劳请我进行单独谈话，并向“埃贡·克伦茨个人”提

几个问题时，我考虑，此刻是否要告诉劳，可能今天将作出开放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边界、民主德国和西柏林边界的决议。但我能确保此事不外传吗？我在党中央尚未谈及此事，能同劳谈吗？虽然改进旅行法草案是我们谈话的主题，但我话到嘴边，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另外，我还不完全清楚，至少尚未经过革新的党中央对开放边界的建议将有何反应。

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谈话后，我得赶忙准时参加15时30分开始的会议。会议前夕，政府首脑斯多夫交给我一份新的旅行条例草案。我仔细看过以后，比任何时候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文件包含着一部分世界政治。几小时后，将揭开两德关系的新篇章，我们终于将完全站立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基础上，东西方人民将为之欢呼。但无疑我们也将招致一大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作出这一决定并非易事。

今天，全世界都称这是一个历史性行动。但在11月9日那天，我们脑子里考虑更多的是一系列实际步骤。我们向自己发问，是不是一切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不能匆忙作出任何决定，因为在这里欧洲中心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涉及到我们本国人民，而且涉及欧洲的利益。世界注视着我们。

因此，我决定绕开正在举行的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我觉得手中的这个条例十分重要，不应该仅仅由政治局和政府作出决议，也有必要同党中央进行磋商，于是我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宣读了条例的全文：

1. 1988年11月30日关于民主德国公民出国旅行条例在新旅行法生效之前不再施行。

2. 下列关于出国旅行和从民主德国移居出境的暂行过渡规定立即生效：

a）申请私人出国旅行不需要陈述条件（旅行理由和亲属关系）。应在短时间内予以批准，只是因特别例外的情况才不予批准。

b）民主德国县警察局主管护照和申报的部门奉命立即发放移居出境签证，不需要陈述移居出境的条件。也仍然可以向内务部门提出移居出境的申请。

c）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移居出境。

d）取消民主德国驻外机构临时发放有关准许以及凭民主德国身份证经第三国移居出境。

3. 所附关于暂行过渡规定的新闻公告于11月10日（这个日子应当具有特殊的意义——作者注）发布。

我宣读完以后，文化部长霍夫曼建议将“暂行”两字从条例中删去。他的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人们以为这个条例只是短时间内有效，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这个修改建议获得了一致赞同。党中央没有一个人反对作出上述决定。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几天后有人怀疑说，此时开放边界是否适宜。我一直回答这些批评者们说，有必要更早地开放边界，我们不能与世隔绝，而必须把戈尔巴乔夫关于世界整体性的观点也运用于两个德意志国家关系。

此外，这些批评者看来不清楚我们所处的复杂形势。民主德国公民非常强烈地希望到操有同一种语言的邻居那里去，要采取不同于上述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除非考虑用武力压制人民对迁移自由的要求。但我无论作为德国统一社

会党中央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还是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都不能这么做。

中央全会的辩论在继续，还有三个人发言。这时，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专区第一书记京特·沙博夫斯基（他此刻也负责同新闻媒介的合作）弯过身来对我说，他想请个假，因为要去参加18时举行的国际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央全会的进展情况。他问我，他能否向新闻媒介谈及关于旅行往来的新规定，我告诉他："一定要说，这是世界新闻！"

沙博夫斯基点点头，就去莫伦大街的国际新闻中心了。在那里，由于他的一个小差错，引起了夜间对边界的冲击。19时差几分钟，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一位记者，我想是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问起为民主德国公民制订新的旅行规定的情况，沙博夫斯基答道："我刚获悉，部长会议已经决定……"他严格地按照正式的新闻公告说着，但后来却发生了差错。开放边界应该是11月10日，然而沙博夫斯基在回答记者关于时间的问题时搞错了："假如我的消息正确，据我所知是立即。"

记者们愣住了，足足花了几秒钟时间来理解这番话。这时，19时刚过几分钟。然后他们怀着发出头号新闻的良好情绪投入了工作。世界获悉了本应第二天才知道的事情。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主德国公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任何人都未预料到的情况。柏林的男女公民们立刻披上大衣和围巾，从冰箱里取出香槟酒瓶，半信半疑地动身赶往柏林墙。在高速公路上，朝西方向去的交通也很快变得频繁起来。郁结多年而没有得到满足的旅行欲望要在这个夜晚发泄出来。

四、人民载歌载舞越过边界

约21时，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打电话来，他对所报告的事情，语调显得异常平静。他说，将有更多的车辆和人群聚集在柏林各个过境站。我几乎掩饰不住紧张不安的心情，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所有这些不流血的革命的日日夜夜之后，现在决不能再出现对立！何况是在这一敏感的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

我与米尔克商量，应当把边境通道的栏木打开，现在早一天或晚一天也无关紧要了。就这样，11月9日倒偶然成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日子。

柏林墙边所发生的事情，也许最好用东西方人民的节日来描绘。当波恩的联邦议院唱起德国之歌时——我后来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听了——，第一批柏林人正在公路大街过境站漫步向西走去，这里响起了像“在墙上，在等待”的歌声。并不是所有过境站的通道都这么快地开放的，这是由于错误地提前了开放的日期，边防部队尚未接到明确命令。但在午夜前，我与米尔克商定的已有约束力地下达到所有的过境站，每个人凭身份证即可通行。人民真是载歌载舞越过边界。

当然西柏林人也被新闻媒介唤醒了，他们在边界两旁夹道欢迎，他们要在这个夜晚纵情欢乐。由于11月9日以后移民浪潮未见减退，这种情绪不久就明显平息了下去。但在11月9日到10日夜里，不存在社会的紧张气氛，重新见面的喜悦是真诚的。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人将“6月17日大街”

的路牌改写成“11月9日大街”，在我看来，这表明人们想发出消除冷战的信号。在库菲斯滕达姆大街和勃兰登堡门的墙上，人们在跳舞。

夜里2时左右，沙博夫斯基来电话，向我讲述了这段时间边界上的情况。他想立即从万德利茨赶往柏林。我刚想，“别忘了带身份证！”但又马上想到了局势的严重性，我们达成一致，我将晚些时候去。我再次向米尔克和国防部长海因茨·凯斯勒询问边界上的形势，他们都证实了沙博夫斯基的报告，并补充说：一派欢乐的气氛，“在秩序和安全方面没有问题。”只是无法再检查所有的身份证了，因为人群拥挤不堪，米尔克用一种令人惊异的轻松口气说道。我不禁笑了起来。难道一切都突然不再成为特别的问题了吗？这在两天以前还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尽管柏林男女公民的欢乐如此感人，人们也不能高枕无忧。

11月10日清晨，我放弃了在树林里的跑步，比往常提早去柏林。这个时候，城市里还充满了快乐的气氛，我让司机在边界附近停下车，我看到尽管人群拥挤，办理边防手续仍在正常进行。然后我去了党中央。由于目前出现的局势有助于正常化，其意义远远超出这个城市和两个德意志国家，因此决不可失去控制。我同国防委员会秘书弗里茨·施特雷利茨讨论了形势，并请他准备一些措施，以便我们能够对可能出现的非常局面和平地作出反应。他准备了有关命令，组成了一个由他率领的临时领导小组，并经常向我报告情况。

9时许，我们继续举行中央全会。我不讳言，我考虑更

多的是边界上的形势，而不是全会的讨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有谣传说，柏林工厂的许多劳动者都停工去逛西柏林了。另有报道说，银行里挤满了人，人们想提取存款，兑换成联邦德国马克购买东西；县警察局门口将出现人群集结，生产能力几乎得不到保障。这些报道中的有些情况符合事实，有些则被戏剧性地夸大了。不管怎样，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前结束十中全会。我们匆忙决定了讨论还不充分的行动纲领以及于12月15日至17日召集党的代表会议。

晚上在柏林举行了两个集会。舍内贝格市政府前聚集了两万名柏林人，联邦总理科尔专门为此而中断了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来到西柏林。他在讲话中马上把开放柏林墙誉为“重新统一”的信号，遭到一片嘘声。德国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维利·勃兰特（建造柏林墙时曾任西柏林市长）、现任西柏林市长瓦尔特·蒙佩尔和联邦外长根舍，由于他们对两德关系采取平静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而在柏林人中间占据了优势地位，赢得了许多掌声。

几乎同时，我在卢斯特加滕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党组织举行的集会上向15万多人发表了讲话。我对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边界，我感到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得到他们支持的。同志们的自信心给了我工作中迫切需要的力量。同我们党中央的决定相反，基层组织要求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印象，一天后我向政治局建议于11月13日举行十一中全会，就这项提议进行表决，即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以取代业已决定的党代表会议。三天后，中央全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卢斯特加滕的集会结束后，我即被告知，联邦总理科尔

打算同我再进行一次电话谈话（第一次是在我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后进行的），我们商定星期六，11月11日9时进行谈话。技术发达的世界听了会摇头，但是我说的却纯属事实：电话没有接通，电话网超负荷。显然，这个偶然事件是由这种思想导致的："不给科尔和克伦茨以特权，他们应当如同普通人那样等待他们的东西方会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科尔和我之间的电话谈话才告开始。

联邦总理对民主德国实行的旅行往来规定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关系。我指出，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民主德国的主权决定，体现了在民主德国进行革新的政策，核心是人的利益。我说，为了合作，现在需要双方的求实、可以测度和善意。在我们采取了方便旅行的措施后，联邦德国方面应该考虑，怎样能有效地支持这一业已开始的谅解进程，首先是经济负担不能仅仅由民主德国来承担。

同时，我对科尔说了大意如下的话：开放边界绝不意味着使现有的边界成为问题，两个德意志国家关系的稳定仍然是欧洲大陆稳定的决定性前提。我赞同联邦总理科尔的考虑，即目前必须排除任何形式的极端行为，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边界上发生暴力和极端行为，恰恰是危险的。应当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审慎和理智地解决一切问题。联邦总理科尔认为，遏制感情冲动和消除错误的幻想符合双方利益。我（当时还）说，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并未提上议事日程。联邦总理科尔援引联邦德国基本法，反驳我的说法，但同时建议，现在要把改进合作的实际步骤放在首位。他问，总理府部长赛特斯能否于11月20日来柏林进行会谈，我表示同意并答应会见赛特斯。

联邦总理科尔和我一致认为，双方对进行广泛形式的合作兴趣甚大，我特别指出了经济、环境保护、文化，但也有人道领域。联邦总理科尔提议，在民主德国举行他和我之间的个人会晤，我表示赞同并说，可以考虑12月下半月的一个日子。最后，联邦总理告诉我，下午他将继续对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我请他向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和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邻国的其他代表转致衷心问候。

11月10日到11日这个周末，大型和小型的边境来往就像民族大迁移，人民警察在72小时内发放了400多万份签证，这难道不值得记入创纪录的书吗？不仅在柏林，而且在通往联邦德国的过境站上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马林博恩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车队有时长达40多公里，夜晚也不见减少。

内务部长弗里德里希·迪克尔11月10日在民主德国电视台宣布，按照新的旅行规定，所有县警察局立即受理私人去国外、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旅行的申请，并尽可能在当天作出决定，这同样适用于移居出境。然后将私人旅行签证登入旅行护照，但目前用身份证就可以了。内务部长强调指出，新规定并不是有期限的措施，“它是长久不变的，将构成新旅行法的基础，我国公民完全可以信赖这一点，不必匆忙作出决定。”

同时他宣布，通过与西柏林市政府的谈判，已在短时间内就开放新的过境站作出了决定。不久就在埃伯斯瓦尔德大街、波茨坦广场、格利尼克桥、法尔肯塞大街设立了过境站。人们现在也可以经雅诺维茨桥和罗森塔尔广场的地铁站到达西柏林，这两个车站位于民主德国路段，西柏林交通公司在征得民主德国当局允许之后，得以运营这条线路。临时

设立了护照和海关检查处，民主德国公民可以用本国货币购买车票。车站长手持民主德国的圆牌信号发动了西柏林的车辆。"开往帕拉泽苏斯巴特……开往莱内大街，请上车！"——头戴红帽子的民主德国车站人员已经说得如此熟练，好像他们在两个柏林的地铁交通中根本不需要再学习什么了。就连轰动的事情也能很快地融入日常的潜意识！为了同西柏林的短途交通连接起来，设立了通往波茨坦、民主德国机场柏林—舍内费尔德、亨尼希斯多夫和瑙恩的公共汽车线路。

这一切听起来是这样的轻松、自然，但即使对富有经验的组织者来说，也是一桩西西弗斯的苦役①。此外，还有我们提出的一项任务，即沿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全部边界大规模地缩小禁区，我们称之为边境地区。我们今后要免除企业、设施以及整个城市、乡、镇迄今所承受的限制。

但这些日子，我们也已经有了新的忧虑。认为廉价拍卖民主德国的想法是如此错误吗？开放边界——意味着对吸毒和艾滋病也无限开放吗？我们迄今能够很好地防止这些东西，马上就有必要实行更加严格的海关检查，民主德国公民对此表示理解，尤其是因为我们这里所不允许的毒品、武器、弹药走私正变得日益严重。

星期日，11月12日，沙博夫斯基来电话告诉我，西柏林市长蒙佩尔希望与民主德国一位政治家在波茨坦广场会晤。我们共同考虑，应当由谁同蒙佩尔一起在柏林最富于传统的广场上开放新的过境站。显然，要为我们首都的市长开放绿灯。

---

① 西西弗斯苦役指徒劳无益的劳动。西西弗斯是希腊传说中的暴君，死后在地狱里被宙斯处罚推石上山，石推至山顶又复滚下，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编者

就这样，开放柏林墙也使这件事成为了可能，而过去最多只能顺便在举行某种活动时进行，即西柏林市长和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市长的会见。

那些日子，也经常有人问我，开放勃兰登堡门——柏林古老的象征，是否不适宜。原则上我没有异议，当然可以在那里设立一个过境站，并将紧靠柏林墙的大门开放供参观用，后来也这样做了。但我想，勃兰登堡门有它的历史，有好的和坏的传统，难道要把它的开放作为一种宣传姿态吗？后来这样做使情感发泄出来，在新年之夜达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可是我当时注意的不是这种示威性行动，而主张采取实际的步骤。如果勃兰登堡门今后应当成为共同性的象征，那末在弄清某些姿态的内在含义以前，不能通过先采取措施来冲淡它的象征性。附带说一下，我获得来自波恩的信息：那里的政府不太乐意看到，仅仅由柏林的代表来开放勃兰登堡门，显然联邦总理希望亲自在场。我们后来看到，他怎样实现了这个愿望。事态的进展证实了我当时的考虑，由莫德罗和科尔，克拉克和蒙佩尔开放勃兰登堡门，包含了这样的内容：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条约共同体。

在围绕11月9日的日子里，我觉得，民主德国的柏林人了解了西柏林市长蒙佩尔的最佳方面。作为新的旅行规定的结果，他称东西柏林人会见的时刻“不是重新统一的日子，而是重新见面的日子”。他谈到许多发泄出来的情绪，说现在必须把这些情绪同争取和平、裁军、环境保护以及两个德意志国家经济富裕的共同责任联系起来，从而表达了东西方许多人的思想；说在旅行和迁移自由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应

该给任何一方带来损害。有记者问，1989年的前提在何种程度上要比50年代的好，他答道："因为不再是冷战了，双方的措施不再以对峙，而以合作为目标，这在11月9日再一次得到了巨大的推动。"

蒙佩尔将11月9日这一天置于大的世界政治之中，他正确地把开放边界视作民主德国民主运动的结果，并把它纳入缓和政策和革新政策的范畴。我完全同意他所说的："开拓者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人们常常想从我这里获知："你首次访问莫斯科时同戈尔巴乔夫谈过11月9日的想法吗？"我们当时讨论了所有重要的双边问题以及国际形势，当然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关系和边界问题占有重要位置。戈尔巴乔夫是从建设一座安全可靠的欧洲大厦的前景来看待这一切的。

苏联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最清楚不过的，戈尔巴乔夫在题为《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也对此发表了看法。他转述了他同联邦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进行的一段简短对话。魏茨泽克——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有远见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援引全欧大厦的思想并提问说："在这幢大厦中，各个住家互相拜访能开放到什么程度。"戈尔巴乔夫："这说得都很对。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夜里有客人来访的。"魏茨泽克："我们也不很喜欢公用客厅中有一条鸿沟。"他当然是指穿过德国和柏林的边界。但是猜测有什么用呢？如果波茨坦协定得到坚定的执行，情况会如何呢？世界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种写法。

戈尔巴乔夫就此在他的书中写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话："现在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目前存在着两个社会政治制度不

同的德意志国家。它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两个德国都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而且各自都能对欧洲和世界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还补充说：“过100年以后将会怎么样，历史会作出回答。而现在则应当从既成的现实出发，而不应当煽风点火，从中投机。”①

显然，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当前两德现实的暂时性。他跟以往一样，也作好了承认正在变化的现实的准备。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1月底对莫斯科的访问表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就此机会对记者说，任何人在原则上都不怀疑德国人的统一。

也许是作为对戈尔巴乔夫书中100年这句话的回答，昂纳克向全世界说了一句完全不同的格言：柏林墙还将存在100年。许多人忽略了昂纳克的从句：只要导致建墙的条件还存在，墙就将保持下去。与戈尔巴乔夫不同，昂纳克对正在变化的现实失去了敏感，新思维被排除了。因此在他的时代，任何关于拆除柏林墙的要求都被视作反革命行为。就是为了能和平地解决这个对人民如此重要的问题，也需要来自“上面的转折”。

这就是说，我在11月9日可以认为，我的行动并不违背苏联的利益。我知道戈尔巴乔夫的原则：一切有关民主德国的问题应当在柏林作出决定。他在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来访时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同时，我记得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对我说过：“在不寻常的时刻，苏联坚定地站在民主德国一

---

① 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177页。

边”，我相信这席话。当我11月12日获悉，戈尔巴乔夫在致乔治·布什总统的信中表示苏联支持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最新决定时，更加强了这种信念。这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信中指出了民主德国业已开始的变化的意义，并期望这种变化能继续平静、和平地进行。

本着这一精神，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声明，在同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接壤的边界上实行新的旅行规定，是民主德国政府的主权行动，对边界的处理是民主德国的事务，是它的主权。格拉西莫夫说，就此而言，这对苏联来说并不是轰动的事。民主德国是苏联在最前线的战略盟友，它面对着联邦德国这么一个巨大的集群，联邦国防军这么一支强大的军队，还有英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武装力量。人们必须全盘地、在欧洲裁军范围内对待这个问题。苏联政府认为开放边界是同继续执行缓和政策和裁军政策紧密相连的。

柏林墙开放以后，我收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来函来电中欢迎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布什的电报说：“美国欢迎你们决定为那些移居西方或只想去西方旅行的人永久地开放民主德国的边界，这个决定以及沿着民主改革方向发展的运动将有助于欧洲和解的历史性进程……”

法国总统密特朗对四周后能够访问民主德国尤其感到高兴，他强调：“在使欧洲人分离的东西消失的时刻，重要的是防止出现经济、技术性的新紧张。我深信，扩大法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成为这个方向的重要因素。”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联邦总理科尔、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和全世界其他国务活动家也作了类似的表

示。

我也收到了东西方普通人的来信和明信片，他们作为个人想对开放边界表示感谢。其中有一个生活在曼谷的德国人和一个持有新西兰护照的波茨坦丑角，后者从日本的首都给我来信："你用新获得的认识，使许多人感到了幸福。当我昨天在东京的街头看到消息时，我只能高兴得流泪。"

我辞职后，从奥厄收到一位自称是"非共产党人"写来的明信片，上面写道："可惜话说得太多了，也许所有去西方的旅行者都已忘了，是你勇敢地开放了柏林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但愿历史能公正地记上一笔。"

两位妇女从波恩来信，欢迎柏林墙的倒塌和对民主德国公民实行新的旅行规定，但抱怨说，现在柏林墙对民主德国的德国人要比对西德人更为开放。事实的确如此，因为联邦德国公民还一直需要签证，并必须交纳法定的由联邦德国马克兑换成民主德国马克的最低数额。给我写信的两位妇女只是想作为旅游者访问瓦德堡，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曾在那里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启程要简便——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这个愿望在圣诞节前夕实现了：政府决定，允许联邦德国公民和西柏林人凭普通的旅行证件并无需交纳"门票"就可以进入民主德国。这封波恩来信用以下亲切的话语作为结束，一个政治家——我坦率地承认——有时也需要这样的话，以保持内心的平衡："人们现在是否重新选你，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对我们来说，你现在和过去都是改革者。祝你幸福和继续取得成就，并感谢你像已经做的那样做下去。"

人们还向我颁发了勋章，当然不是在国内，而是在西德

的亚琛。一个狂欢节协会给戈尔巴乔夫（红场克里姆林宫）和克伦茨（民主德国柏林）写了一封联名信，并通知两位收信人：柏林墙边发生的事情取代了所有本地的主题，人们不是庆祝狂欢节，而在庆祝政治，“因此请允许我们授予你小小的（狂欢节）勋章，以表达我们对你为东西方关系所作出的成绩以及为了一个更加安宁的时代所采取的勇敢步骤的敬意。”

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对此有何反应，反正我接受了勋章。

对于11月9日的决定在我们国内、联邦德国、西柏林以及国际上获得的积极反响，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作出这项决定是不容易的，它包含着许多危险。但如果我们不能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则对我国及其民主运动的危害更大。我看到这一必要性并采取了行动。有些人对此表示不理解，但人民的大多数理解和欢迎这个步骤，而我曾经为人民的幸福宣过誓。

五、在一个和平的欧洲中的德国

如果整个欧洲和整个德国在国际关系的改革进程中成为稳定的因素，则所有国家，包括苏联都不能反对事态朝德国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是苏共中央国际部长瓦伦丁·法林1990年2月初在同《新德意志报》谈话时说的，它证实了我在任期间所作的观察：苏联认为德国问题的现状是一种动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僵化以及对现实的回避都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格格不入的。

德国会怎样继续发展呢？

统一进程不可阻挡，我同意格雷戈尔·居西在年初说的："我们要一个欧洲的德国，而不要一个德国的欧洲……这同时机也有某些关系。"

我认为时间因素极其重要。

如果两个德意志国家应当真正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凑合在一起，必须具备成熟的情况和条件，东西方的许多德国人显然很明白这一点。我们的报纸2月下半月曾报道，每三个联邦德国公民中有两个认为统一进程太快，联邦德国电视台"政治晴雨表"节目进行的民意测验提供了这一数字。我觉得，马格德堡的一封读者来信，典型地反映了民主德国许多人的呼声，信中说："联邦德国各个政党就像珊瑚虫一样侵入民主德国，并在这里进行他们的竞选。难道我们是联邦德国的后院吗？他们想通过这个办法一举夺取我们共和国，而置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人民于不顾……"信的结尾说："询问一下人民的意见吧！我认为人民愿意德国统一，但要富有意义并使所有人得到社会保障，这需要时间和理智。"

顺利，但不匆忙——按照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愿，两个德意志国家应该这样实现统一。这是社会民主党联合委员会1990年2月19日第二次会议说的。

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欧洲方案（草案已在2月6日发表），对在欧洲范围内解决德国问题采取了建设性态度。其中，民主社会主义党支持"两德广泛和逐步的接近过程，即经过条约共同体导致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国家联盟。"它认为，这是对欧洲国家关系非军事化、民主化的贡献，是对一

个“协作、着眼于社会、团结和生态以及形式多样的邦联欧洲”的贡献。我也主张，在这一发展中，保留民主德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立性，应该将重要的价值纳入一个共同的德国。我认为其中首先包括社会安全，这是民主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我们这里的失业人数或未按其所受教育和能力而使用的劳动者不断增加，民主德国公民内心对社会福利大幅度下降的恐惧日益严重。我也坚决反对以德意志民族和复仇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由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东西方邻居把德国人问题也看作是自身的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同意”尊重欧洲的边界，尤其是波兰西部边界的不可触动性具有特殊意义。与联邦总理科尔尴尬的声明相反，我们始终强调了这一点。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在达沃斯第二十届世界经济讨论会上重申：两个德意志国家必须在“互相接近中为建设一座安宁的欧洲大厦作出贡献”。

我赞成这个建议，即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政府应当为缓和、大幅度裁军、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共同作出贡献，同时应当取消尚存的对两个德意志国家主权的一切限制。这就是我所支持的德国问题计划，它是更加广泛的欧洲方案的一部分。我过去和现在都寄希望于保留尽可能多的民主德国同一性的价值，如果诗人约翰内斯·罗·贝希尔的幻想——现在当然变得难以辨认了——成为现实：“德国，统一的祖国”。1990年3月18日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直至民主德国大选次日清晨，印刷本书的机器才停止运转。

当我去参加选举时，我看到住宅窗户上挂着民主德国的旗帜——比以前稀少，但更加执着，因为摆脱了我们错误的

礼仪。难道现在就要同锤子、圆规和穗环迅速告别？我没有预料到这个选举结果。显然，这是一种合并的情绪，也许是希望迅速和“一致”地解决我们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方案所遗留下来的那些问题。一场侵略性的竞选，其中包括来自联邦德国的演说和张贴纵队（这不是西德各党派在我们土地上进行的一场由我们负担费用的代理人竞选吗？），使许多人对理应注意的民主德国自信心的担忧失去了敏感。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尽管应当在各方面尊重人民的民主表决。

我知道，我的一些政治朋友和战友同我一样感到失望，他们现在会问：我们的转折不是助长了目前出现的情况吗？因为其结果可能使民主德国迅速灭亡。尽管我们现在面临的事件使我感到心情沉重，但我必须指出：我们失败的起源要早得多，它在于我们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生命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这种难以置信的煽动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接受。我估计，当动听的选举诺言同现实发生了冲突，当联邦德国公民在把钱投入解决另一个德国的经济问题前，要比竞选所许诺的花钱更多时，这种接受将被明显地取消。

现在的选举结果是民主德国和平革命发起者的结果吗？我想是的，因为诸如新论坛、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左翼或绿党等公民运动中的反对派力量当初发起了和平革命，他们现在又成了反对派力量。他们曾“为了我们的祖国”走上街头，想为我们社会的缺陷作出民主德国的选择。和平革命从他们的手中被夺走，这是惨痛的。尽管如此，这里已经

形成了一种保卫我们发展起来的价值和成就的潜力，今后可以依靠这支力量。

我很希望，我国民主的开拓者们现在不再把那些充满矛盾地拥护民主成就的人排除在外，他们也许由于职业禁止或各种“激进分子规定”而没有工作，没有自由的活动可能性。这将危及和平革命的最大成就。

大墙倾倒了，按照我的理解，这不仅仅是指将我们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绝开来并禁锢人的墙，也是指一种没有承载能力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墙，是沉默、容忍和错误接受的墙，是我们曾属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之间的墙，是我们根据自己关于德国问题的看法而建立起来的墙。这么许多墙倾倒了。现在会不会建立新的墙呢？对左翼持不同政见者的墙？对那些能从民主德国同一性中纳入德国统一进程的价值的墙？德国人及其安全需求应得到尊重的邻国人民之间的墙？我非常希望不致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肯定，一个强大的反对派懂得阻止建立这样一些新的墙。

历史将如何发展，可能任何人现在都无法准确预见。我们的左翼替代建议将面临严重、痛苦的问题，我们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会有很大困难。但我不能也不愿放弃我的信念，即并非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是它的错误实现被埋入了坟墓，我为此承担了共同的责任。我知道，我在一生中不止一次地出过差错，但在这一点上我没有错：社会主义没有死亡，它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社会公正、着眼生态、政治民主、道德纯洁和面向人的社会的思想存在着。我不会放弃这个理想。

第 四 章

1989年10月7日至12月6日纪实

10月7日

阅兵式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在尼德舍恩豪森宫召开会议。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为客人参加了会议。前一天的两个印象决定了会议的气氛：昂纳克在共和国宫发表节日讲话，他只谈民主德国40年卓有成效的历程，而未谈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菩提树下大街举行传统的火炬游行，10余万青年在游行中不断呼喊“戈尔比，戈尔比”。

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通报了他的国家在革新中的经验。他坦率而真诚地说，必须及时着手处理社会上已经成熟的问题。昂纳克阐述了民主德国的成就、尖端工艺、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内的紧密团结。

晚上是另外一幅情景。我们初步获悉了人民警察和主要是年轻的示威者之间在首都发生冲突。一个委员会今天还在调查是如何出现违法行为的。80多个由国家元首、党的主席或总书记率领的外国代表团参加了民主德国40周年庆祝活动。

10月8日

和昂纳克通电话。我请他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审议我起草的关于国家目前形势的声明草案，并把该草案送到他在万德利茨的住所。过不多久，昂纳克打电话告诉我，他不能同意这个声明。

我仍不愿相信他不准备结束党的领导的沉默，同社会各种力量开始对话，以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深刻危机。

10月9日

昂纳克接见前来参加民主德国40周年庆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新德意志报》用两版发表了群众希望安宁和秩序的来信。我看了下列标题："为安宁而担忧"，"干扰人民节日的活动被制止"或"公民对捣乱者表示愤慨"，"首都的冲突是如何策划的"，"明目张胆的挑衅"或"刑事犯罪分子企图煽动群众采取暴力"。我想，总是这样不加区分地一律对待，仍然没有把那些诚心诚意为了实行社会变革而上街的公民和混杂在他们当中的少数滋事生非之徒区别开来。

9点至10点，瓦尔特·弗里德里希教授从莱比锡来找我。他是青年研究所所长，和我有多年的交往。他对莱比锡的局势表示担忧，和博览会城的许多居民一样，担心在晚上惯例的游行中可能出现流血。听了他对局势戏剧性的描述后，我给党中央安全部长沃夫尔冈·赫格尔打了电话，以便再查证一下，和国家安全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达成的关于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的方针是否真正得到了遵守。赫格尔证实了这一点。我和昂纳克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再次对我违背他的意愿准备了一份政治局声明表示不理解。他声

称，此举会使党及其领导层的团结毁于一旦。我试图再次使昂纳克明白，我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党的行动能力，为了革新我们的社会，别无它求。昂纳克坚持其立场。尽管如此，我仍请政治局办公室主任将草案送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下午，我和莱比锡的政界朋友多次通了电话。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代理第一书记告诉我，库特·马祖尔、三个专区党委书记、一位神学家和一名歌舞演员发出倡议，呼吁不要采取暴力，我对此表示支持。我再次确信，不管是否有了有关命令，决不使用武力。然后，我告诉莱比锡专区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支持上述人士的倡议。我相信该倡议会得到实现。

10月10日、11日

政治局会议。首先讨论就国内局势发表的声明。昂纳克最初保持沉默，然后同意将声明提上议程。声明的主要内容如下：这么多人离开共和国，这对我们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只从敌人方面，也必须从我们自身寻找原因；必须同所有的人进行对话；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相结合的方针应该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得到体现；只有通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保证经济的崛起。这涉及到民主的合作和所有人积极的参与，涉及到良好的商品供应和按劳取酬，涉及到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新闻媒介，涉及到旅行可能性以及健康的环境。

在政治局会议上，围绕这一声明的内容出现了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声明并于10月12日发表。局势越来越复杂。关闭民主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又引起了很大的不满情绪。

10月12日

中央书记处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昂纳克发表长篇讲话，他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归咎于北约推行的计划和经匈牙利出境的可能性。他只是在讲话的末尾，才谈及政治局就国内局势发表的声明。

我在想，第一书记们将如何反应？我从新勃兰登堡专区党委第一书记约翰尼斯·凯姆尼策那儿获知，他将采取非常坦率和批评性的态度。莫德罗早在数月前就向我表明了态度，他对局势作了非常批评性的评价。波茨坦专区党委第一书记京特·雅恩指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上，有过如何通过理智的方式更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先例。

10月13日

昂纳克同友好党派的主席进行协商。京特·米塔克、约阿希姆·赫尔曼和我应该参加。我请了假，同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鲁迪·米梯希、内务部副部长兼德国人民警察总署署长卡尔—海因茨·瓦格纳、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委员会秘书弗里茨·施特雷勒茨上将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安全部长赫格尔一起飞往莱比锡。我们在那里同负责同志进行了协商，并准备了一项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命令。返回柏林后，我和施特雷勒茨约17时到达昂纳克的办公室，我们向他解释了形势，并请他签署一项命令，即在示威者没有对人或物施行暴力时，不对他们使用警具；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杀伤武器。在我和施特雷勒茨报告了局势的复杂性之后，他签署了命令。

10月14日、15日

我为下次政治局会议做准备。在这期间和维利·斯多夫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达成一致，在计划于10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之前约9时30分，和政治局一些同志去昂纳克那里，建议他辞职。这些同志是：维利·斯多夫、京特·沙博夫斯基、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库特·哈格、哈里·蒂施、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和我。后来根据维利·斯多夫的建议，我们放弃了这一想法，选择了政治局这条直接的途径。

10月15日晚，京特·沙博夫斯基、哈里·蒂施和我在蒂施的住宅碰头。我们再次商讨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准备情况。

10月16日

下午在弗里德里希·迪克尔的办公室，弗里德里希·迪克尔、埃里希·米尔克、弗里茨·施特雷勒茨和我进行了商谈。谈话涉及协调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保证莱比锡每周一的游行不出现暴力。近15时，昂纳克也来了，他是临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来的。我们注视着莱比锡的事态，并不断得到情报。当不必再担心出现严重的局势后，昂纳克告辞回家。我坚信，在下面的转折发展到如此广泛之后，现在也终于到了在上面转折的时候了。

10月17日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根据议程，这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会议。甚至对专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评价都没有列入计划，会议将处理一系列不重要的问题。昂纳克问，谁对议程还有什么建议。维利·斯多夫第一个发言，并建议：罢

免昂纳克，选举克伦茨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然后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维利·斯多夫的建议，免除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人民议院，也免除其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明日召开九中全会。实际上，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和我的工作人员共同起草一份讲话，我将在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九中全会上粗线条地阐述党的领导进行转折的思想。

10月18日

九中全会于14时召开。早上我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各专区党委第一书记见了面。10时举行政治局会议。昂纳克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再允许他行使职务。同这一声明相反，维利·斯多夫在前一天要求罢免昂纳克。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不仅是健康原因，而是错误的政策迫使昂纳克辞职。事后表明，九中全会没有进行详细的内容上的讨论是一个错误。

会议之后，我向党中央的工作人员发表了讲话，然后驱车前往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向民主联盟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的决议。

晚上，我发表电视讲话。预告的是新任总书记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发表讲话。由于时间短促，我宣读了我在党中央所做的同一讲话。

从电视台返回后，我收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电报。他祝贺我当选为总书记，说“我们应考虑时代的要求”，并祝愿革新和连续性的方针取得成果。

10月19日

早上和柏林“10月7日”国营机床联合企业的工人在一起。我同京特·沙博夫斯基以及联合企业总经理海因茨·瓦猜沙一起同工人们进行交谈。

我不愿在办公室，而愿意在同工人们进行这样的交谈中开始我的总书记工作。交谈主要涉及供应短缺和旅行可能性。工人汉斯—迪特尔·拉德马赫在工作岗位上对我说：“对你昨天的讲话有些不同看法，我想毫无顾虑地直接向你提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我们长时间来就在谈论按劳分配原则，对此会有什么具体的变化？第二，旅行问题牵动着所有的人，什么时候可以采取措施，包括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旅行？第三，商品供应什么时候能得以改善？”

我和京特·沙博夫斯基商量，将我们在企业里讨论的所有问题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

我请瓦猜沙总经理将他的意见写出来给我，这些意见将在政治局会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胡伯图斯施托克宫，我和基督教会负责人进行第一次会晤。在场的有民主德国基督教会领导会议主席、全国大主教维尔纳·莱希博士，基督教监理会主席曼弗雷德·施托尔佩，主教克里斯多夫·戴姆克博士，教会理事、民主德国基督教会联盟秘书处负责人马丁·齐格勒。我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调：“埃贡·克伦茨和维尔纳·莱希一致认为，应该保护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历史也是我国基督教会和信奉基督教的公民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一部分历史。为此，需要尊重各自的信仰和工作。”

晚上同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会晤。我觉察到奥尔特加对我国局势的担忧，试图给他一种感觉，即我们正

以巨大的责任感进行我国的革新。

10月20日

我为即将召开的人民议院会议准备声明，并于当天将声明送发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民主农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国家民主党主席以及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进行协调。

新闻界公布了对滞留在联邦德国驻华沙大使馆的民主德国公民的新出境规定。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暂时的决定，更好的出境途径是向县政府内务部门提出申请。制订旅行条例愈来愈紧迫。

柏林（西）市长蒙佩尔表示准备同我会晤。同一天，报纸发表消息说，《伴侣》杂志重新开始发行。随着《伴侣》的重新发行，过去被禁演的苏联影片也重新上演。

10月21日、22日

星期六，中欧时间9时30分，我和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再次祝贺我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邀请我访问苏联。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同苏联共产党紧密团结道路上的又一步骤。

本周末，在共和国所有地方都开始了同公民的对话，全国范围内的对话正在进行。在柏林，京特·沙博夫斯基、艾哈德·克拉克和其他人在李卜克内西大街同示威者以及行人进行讨论。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在大街上深入群众开展政治工作。这是有益的。

在莱比锡，500名来自各阶层的公民聚集在格万特豪斯音乐厅，曾于10月9日呼吁非暴力的知名人士：库特·马祖

尔教授、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党委书记库特·迈耶尔、约亨·波默特、罗兰·韦策尔、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博士和歌舞演员贝恩特—卢茨·朗格在举行一个无任何禁区的公民讨论会，并称今后每个星期日都举行此类讨论会。新论坛女发言人彼得拉·卢克斯强调："革新的动力来源于人民。"

我们的报刊首次将新论坛一位代表称为对话伙伴，而未称为被禁止的组织的代表。对我来说，这个事实要比这条消息更为重要。

10月23日

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们深入专区、县、企业进行座谈。不再有禁区了。

我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文灵，向他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九中全会。我们强调两党和两国的紧密团结，并讨论了继续进行合作的项目。

在柏林，从格特斯曼教堂出发，汇聚了约2000名示威者。他们要求在明天的人民议院会议上有多名候选人参加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他们反对权力集中。此刻我还坚信，将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集于一人对国家的革新是正确的。后来我发现，这种权力集中的代价是失去了信任，因为这使人们想起过去，想起过分的权力集中。

10月24日

在26票反对，26票弃权的情况下，我被选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在选举我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时，有8票反对，17票弃权。我将之称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新的信心。在人民议

院会议之前，人们要求对国内局势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人民议院主席团商定以后再进行这种讨论，因为选举国务委员会主席不应和讨论会联系在一起。

宣誓后，我在人民议院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一切应该为了人民的幸福，这是我工作的最高准则。为了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需要判断力、坚定和承认真理的勇气。我说，在我国人民中有一种觉醒的气氛。我呼吁进行对话，对话必须成为我们政治文明的一个必要而经常的组成部分。坦率、审慎、建设性是必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信任自己并熟练地做出所有决定。必须成功地把社会意志形成的过程发展成为人民的主权行动并这样去体验它。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尖锐化和对抗。社会正处于一个大的学习阶段。为了使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议院民主化，必须有一整套纲领。本着“我们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的精神，我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人民议院的工作，并建议制订一个立法计划。立法不能仅限于议员们的同意。政府只有责任向人民议院而不向其他任何人汇报工作。对于选举的准备工作，我要求：“对过去历次选举的经验以及指示、呈文进行彻底清理，作为选举立法的借鉴。”我向所有仍想离开民主德国的公民呼吁：“我们这里需要你。”联系到人们对10月7日、8日警方采取措施的反应，我说：“谁要是受到不公正或不尊严的对待，谁就可以要求法律保护并运用一切法律手段。负责的国家机关将认真审理举报并惩处有罪行为。总检察长就此向国务委员会提交详细的报告，其内容公布于众。尊重和保护个性的尊严和自由是所有国家公民劳动的宪法规定。”我在声明中强调，我们的意愿是，政治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我同时指出，任何人都不能从民主德国的发

展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北约的方案即使在将来也不受欢迎。

人民议院会议后，召开国务委员会会议。我在会议上强调了联盟政策的重要性。沃尔夫冈·赫格尔受人民议院国防委员会和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的委托，向国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沃尔夫冈·赫格尔强调，保卫和安全机关在最近几周的事件中，始终接到明确的命令，即保持最大的克制，只有在人群中出现暴力威胁和使用暴力时才进行干预。一项由当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签署的命令指出："只有在示威者对投入的安全力量使用暴力和对设施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才能动用警察力量和警具，原则上禁止对可能的示威游行使用杀伤武器。"

沃尔夫冈·赫格尔进一步强调，这项命令是由今天被选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埃贡·克伦茨准备并建议的。

当天下午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1月8日至10日召开十中全会。政治局建议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制订民主德国公民出国旅行法草案，并于11月将此提交公众讨论。会议建议，每个公民均有权申请得到一份旅行护照，并不必具备亲属关系和迄今所要求的旅行原因即可获得去所有国家旅行的签证。在对所有有关建议进行缜密的分析之后，旅行法草案应当在今年内提交人民议院讨论和表决。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我汇报了同莱希大主教以及民主德国基督教会其他代表的会晤情况。

10月25日

许多公民依然认为，来自联邦德国和柏林（西）的干涉企图是对民主德国民主化进程的干扰。因此我更觉得同自由民主党主席沃尔夫冈·米什尼克的会谈是令人愉快的。这是

我担任新职后第一次同一个联邦德国政治家进行会谈。我结识的这个人曾为两德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并在所有的政治对立中显得十分坦率。我想起他在70年代初曾和赫尔伯特·魏纳一起作为昂纳克的客人。这次会谈对解决人道问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多。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米什尼克强调，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民主德国的发展；主张为了人的幸福，两德应更加密切地合作；指出在民主德国开始了一个成熟的进程，转折不可逆转。当记者问，在民主德国是否允许反对派存在时，我答道："每一种思想都是受欢迎的，在交流思想的时候不排除任何人。"有人问米什尼克如何评价他的东道主，他回答说："克伦茨先生是一位可以在极短时间里进行十分坦率的交谈的会谈伙伴，他也讲他认为是必需的事情。我的印象是，埃贡·克伦茨以他的信念维护着他的事业，当然在许多方面和我的事业是不同的。有这样一种意愿，即不仅仅倾听对方，而且应从启发、提示和批评性意见中得出结论。"米什尼克说，只有当双方都准备不仅听取，而且思考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时，对话才富有意义。

当我结束和米什尼克的会谈回到办公室时，办公桌上放着一封密特朗总统的电报，电报说"尊敬的主席先生，值此您当选为民主德国国家元首之际，我谨表示祝贺。"他期望不久能和我会晤。这一天，我还收到了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总统冯·魏茨泽克、社民党主席福格尔以及近年来和我接触过的许多著名社民党人士发来的贺电，其中有埃贡·巴尔、沃夫尔冈·罗特、格哈德·施罗德、卡斯滕·福格特等。

下午作出了关于滞留在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民主

德国公民出境规定的决定。这再一次表明，制订旅行法愈来愈紧迫了。示威游行在继续。在柏林聚集了约12000名示威者，其中大多是年轻人。人民警察的行动十分谨慎，不能再发生冲突了。类似10月7日的事件应当永远成为历史。

10月26日

我和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通电话。科尔总理说，他对业已建立起来的接触十分高兴，在出现问题时，应该拿起电话互相商讨。我回答说："是的，总理先生，直接商讨总比经过他人商讨要好。"我们两人强调，我们的政策必须为人服务。科尔总理认为，只就那些可能达成一致的事情进行商谈是适宜的。我们商定互派特使接触，以准备可能举行的会晤。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开始举行第十二次会议。艾贝哈特·奥里希向中央委员会通报了我写给他们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对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10月10日提交给政治局的关于青年思想和行动的评价表示感谢。原定我和中央委员会执行局进行一次谈话，遗憾的是发生的事件使这次谈话未能进行。

内务部长发表一份通报，称联邦德国的新纳粹党主席舍恩胡贝尔计划在民主德国插足。内务部通知，在民主德国，新纳粹分子的活动不可能得到法律认可。

国内的示威游行仍在继续。我们在《新德意志报》上看到一个标题："德累斯顿公民不要口号，而要许多好的解决办法。"

同一天，民主德国的律师提出关于扩大民主德国法律秩序的建议。这些建议推动了新法律的制订。律师们认为，对

社会的错误发展忍让时间太长；经常是自满地对待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概念；“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能再作为一种限制，而必须理解为是对名词的一种扩展。在运用刑法第213条（非法越境）时，最近出现了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律师们说，迫切需要修改这一条。所谓的临时身份证PM_{12}，只应在身份证遗失的情况下颁发，而不应再作为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在这些建议上签名的律师中，也有后来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的格雷戈尔·居西，他当时是柏林律师协会主席。

京特·沙博夫斯基同新论坛组织的延斯·赖希教授和塞巴斯蒂安·普夫卢格拜尔会晤。尽管当时政治局尚无一致意见，但这一步骤表明了我们对这个反对派组织的新态度。京特·沙博夫斯基曾同我商谈过这一计划，得到了我的完全赞同。

10月27日

国务委员会作出了大赦的决议。凡10月27日前因违法越境或企图违法离开民主德国而犯罪的人，以及10月27日前因游行集会违反国家秩序而犯罪的人，均在大赦之列。从而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履行了律师们修改刑法第213条的要求。同一天，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免除护照签证的旅行重新实行，即和10月3日前一样。在一份新闻公告中强调，尽管这里需要每一个人，但那些也许仍想离开我们国家的公民可以向县政府内务部门申请前往联邦德国的移居出境，对此将在短期内慷慨地作出决定。公告说，通过外国使馆强求出境的方式是不必要的，对公民来说也是弊大于利。

改革触及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例如也触及到自由德国

青年联盟。正在举行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强调，不要去塑造年轻人，而要争取信任；首先必须赢得其他的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不愿再作为党的组织，认为它是一个所有青年人的组织。因此也选举了国家民主党、民主农民党、自由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盟员为中央委员会执行局成员。

自由民主党报纸《晨报》就我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发表了该党副主席汉斯—迪特尔·拉斯帕的一篇文章，文章称："表决前，我们在党团里就选举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设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根据民主德国宪法，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作为最强大的党团提出候选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必须在内政外交上迅速具有行动能力，以继续执行和平政策，并进行国内的革新。我们的讨论也以埃贡·克伦茨在人民议院发表的声明草案为根据。埃贡·克伦茨事先把草案送交各友党主席，请他们提出修改和补充建议，我认为这在人民议院历史上尚属首次。他们的建议也得到了考虑。此外，是埃贡·克伦茨本人强调指出了扩大法治国家、提高人民议院和国务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计划，指出了宪法法律结论以及对他工作的新要求。因此，自由民主党认为在政府政策中实行不可避免的转折之门已由埃贡·克伦茨打开……"

民主德国笔会中心主席团成员京特·克沃耶德拉克、弗里德里希·迪克曼、弗里茨·罗尔夫·弗里斯、斯特凡·赫姆林、瓦尔特·考夫曼（秘书长）、赖纳·克恩德尔、黑尔加·柯尼希斯多夫、维尔纳·利尔施、让·维兰给我寄来一份声明，声明称："我国公民在声明和示威游行中要求进行深刻的转变和改革。五个友党的领导人在1989年10月12日同意了这些要求。国务委员会和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发出了新的

声音，改变了态度。只有对国家和社会广泛领域进行改组，才能消除导致长期潜在而现在爆发出来的经济、政治、道德危机的原因。问题的继续蔓延可能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生存，并使我们国家成为欧洲的一个危险策源地。反复强调形成政治看法和意愿的机制是健全的，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这些机制长期以来一直不起作用。需要新的、有质的扩展的机制，其中包括三权分立和有法律保障的根本的开放原则。我们特别赞成充分尊重出版社和编辑部的自主权。我们对国家部门未经审查就试图将那些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感到深切忧虑的组织宣布为违反宪法而感到震惊。根据我国宪法第29条规定有结社的权利，上述做法倒是违反宪法的。”

这份声明说：“没有多种多样的政治看法和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看法和组织形式不能是当局的垄断，而必须作为民主进程确立起来。我们宪法的第21条、22条、27条至30条正阐述了这一点。我们要求立即建立一个独立和全权的法律机构，来审查现有法律、条例、指令和做法的宪法依据。我们对民主德国安全力量恣意拘捕以及对被捕公民进行身心摧残表示愤慨，这已被多次证明是非法的、蔑视人性的。作为国家公民，作为作家并根据国际笔会宪章关于保证言论自由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义务，我们呼吁我们中心的成员，参加保障宪法第27条至第30条的公开表态，以保证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权利和个性的不可触犯。考虑到过去和未来，我们要求公开各个部门个人和集体对领导国家事务所负有的责任。我们主张采取迅速和坚决的步骤，使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即真正民主的基础上。”

民主德国笔会中心主席海因茨·卡姆尼策尔教授未支持

笔会中心成员的这份声明，他对此解释说，国际笔会不允许支持或反对一种社会制度或国家宪法。因此，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在此我想强调，作家和艺术家为准备我们国家的转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0月28日、29日

星期六，10月28日，应基督教监理会主席曼弗雷德·施托尔佩邀请，京特·沙博夫斯基、艾哈德·克拉克同瓦尔特·蒙佩尔在柏林举行会谈。瓦尔特·蒙佩尔表示愿意和我会晤，但会晤未能实现。

内务部宣布，由柏林戏剧工会干部倡议申请的11月4日游行获得批准。

本周末，数以万计的对话在城市和乡村举行。许多过去本应澄清的问题堆积如山。首都的星期日对话开始举行。讨论会原先安排在红色市政厅里，但由于会议厅太小，而改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进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敞开大门，开诚布公。

10月30日

在国务委员会为军事学院毕业生举行隆重的招待会。这是多年来的传统。在凯斯勒部长和许多毕业生讲话之后，我发表讲话指出，这些将去部队供职的军官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由于政治局的默许，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健全，过去对局势的评价比实际情况要好。

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开会。哈里·蒂施提出了信任问题。会议涉及在转折之后工会应如何发展。中央理事会推迟到11月17日作出决定。

今天，莱比锡又有20多万人举行游行，第一次出现了新法西斯势力。

0月31日

上午，政治局会议。计委主席提交了一份未加粉饰的民主德国经济状况分析报告，它表明我们局势的全部严峻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给人民造成直接影响。我们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国民收入增长4.8%，但我们只能达到3.8%，从而使国民收入减少320多亿马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不断宣称超额完成计划，但为什么整个五年计划却不能完成。生产性积累率的下降已经是今后几年经济畸形发展的前奏。不现实的计划和计划修改损害了人们对我们经济的信任。五年计划制订了231亿外汇马克的出口盈余，但没有实现。今后10至20年的负担已经预先确定了，我们在靠牺牲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生活。这一经济状况束缚了我们的政治行动。

另外，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党的行动纲领草案，它将提交给下次中央全会。会议再一次研究了旅行法草案，并建议由部长会议完成草案的制订，提交公众讨论。

10月31日，发表了我给柏林作家的回信。他们在给我的来信中对国内局势表示了深切的忧虑。我在回信中说："同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各阶层和年龄层的公民、我们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劳动集体一样，你们也通过你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了争论进程，这一进程最终导致1989年10月12日政治局声明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九中全会的结果。"我强调，"这一转折需要作家的声音。只有大家共同参与，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

晚上，我飞往莫斯科。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机场迎接我。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到莫斯科。自从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我没有来过苏联首都。

在记者的催问下，我说，“向苏联学习就是学习胜利”这个口号有其历史地位。但是它现在有了新的意义。让我们向苏联学习，用新思维来改革社会。

11月1日

约10点钟，同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他的办公室里开始会谈。我对面坐着的人近年来推动了如此多的事情，在东西方被认为是希望的代表。

在座的有戈尔巴乔夫、他的外交顾问、我的翻译和我。气氛轻松、十分友好。不是通常的交换报告或讲话，而是一次最佳意义上的谈话。我解释了我国革新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并特别强调，迄今为止成功地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了这一革新。社会上的公开性增强了，新闻媒介畅所欲言，就连电视台的“电视新闻”节目也有了较大的吸引力。我指出困难的经济状况，民主德国对外国承担的义务以及我们请求苏联朋友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谈到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是欧洲的稳定因素，并谈到德国问题的前景。结合欧洲大厦的建设，我们还讨论了两德统一问题。

三个多小时的会谈飞快地过去了。接着，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午宴，参加者除我的随行人员外，有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克鲁季科夫以及其他同志。戈尔巴乔夫谈到他下午将同苏联经济学家会面。双方就我同联邦总理科尔的电话谈话交换了看法。戈尔巴乔夫介绍了他访问芬兰的印象，并说他不久将和布什总

统会晤。

下午，国际记者招待会，持续了1小时40分钟。400多名苏联和外国记者参加，民主德国电视台作了实况转播。

11月2日

我担任新职后的第二次出国访问是去波兰人民共和国。在同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塔·马佐维耶茨基和米·拉科夫斯基的会谈中，讨论了我们两国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对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态度。同雅鲁泽尔斯基总统的会谈反映出我们之间的坚强的信任。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会谈中，我解释了我国进一步实行民主化的措施。我们双方称赞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是历史性的成果。在德国人和波兰人一千多年的历史上，这种关系第一次从本质上来说是毫无障碍的。即使波莫瑞海湾这个并非简单的问题，不久前也由昂纳克和雅鲁泽尔斯基一致地得到了解决。自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青少年交流在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些年来，数十万年轻人访问了民主德国或波兰人民共和国，这对于理解两国的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在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举行午宴之前，我同公民委员会的议会党团主席布·盖莱梅克进行了会谈，这是第一次同波兰反对派政治家的会谈。他对德波关系的情况很熟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马佐维耶茨基总理的会谈也是在十分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他谈及他的政府为尽快消除国家复杂局势所做的努力，并说应采取必要措施，遏制通货膨胀，向市场经济过渡。

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所有会谈伙伴，尽管各自的意识形态不同，都认为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来说，增强作为反对任何复仇主义企图的堡垒的民主德国，具有共同的全民族意义。

返回民主德国后，我立即又面临着国内的现实。所有专区以及工厂、工会组织纷纷要求，在今天继续召开中断了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会议。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哈里·蒂施因失去信任而下台。这不是涉及主席的职务，而是涉及到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命运。

此外，我在同一天还获悉了基民盟主席格拉尔德·戈廷和国家民主党主席海因里希·霍曼辞职。

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党建议民主德国政府下台，并建议选举曼弗雷德·格拉赫为人民议院主席。这两项建议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政府下台和新政府的选举已提上议事日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1月2日上午，同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马丁·班格曼会谈。这是我莫斯科之行后第一次同外国政治家进行会谈。我们讨论了欧洲政策、发展贸易以及欧共体大市场正在形成条件下的经济合作问题。我强调，民主德国愿意立即同欧共体就缔结一项贸易协定开始谈判。我们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外贸的80%是在欧共体范围内进行的。我坚决驳斥了一个记者关于民主德国公民比联邦德国公民干活儿少的观点，强调了我国公民的勤劳和劳动意愿，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使这一劳动果实更加有益于所有的人。

11月3日

外交使团祝贺我当选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对我国事态发展的兴趣很大。最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德国局势将如何发展？我试图表明，这涉及民主德国的主权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道路。

晚上，我发表就任后的第二次电视广播讲话。我指出我

们共和国正处在一个“紧要时刻”，强调我们不允许贬低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有这些成就构成了我们共和国的基石。我说，同时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大陆上每个公民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地处世界这一敏感地区的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稳定。我们在华约的联盟伙伴在注视着我们并信任我们。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具有特别的意义，“它重申了民主德国同苏联之间肩并肩的合作。”

我介绍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行动纲领草案，它将提交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我还谈及扩大我们的法治国家，建议成立宪法法院，“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革新，首先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革新。”

我呼吁全体公民团结起来，“以维护我们几十年来所创造的价值。我们也想共同地开始新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更新我们的社会。”

11月4日、5日

11月4日，柏林举行50余万人的游行。值得庆幸的是，游行组织者和人民警察就安全合作达成了协议。我和维利·斯多夫、埃里希·米尔克、海因茨·凯斯勒和弗里德里希·迪克尔一起留在内务部，以便能随时作出决定，保证游行和平地进行。游行开始前半小时，同意电视台对集会进行实况转播。这样可以使我国所有公民，还有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观众共同经历这次集会。

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集会进展顺利，29位艺术家和政治家发言，其中包括马里翁·范德坎普、约翰娜·沙尔、乌利希·米埃、简一约瑟夫·利弗斯、格雷戈尔·居西、基督教

会青年工作者玛丽安娜·比尔特勒和马库斯·沃尔夫。沃尔夫曾在国家安全部工作了33年，因此他首先主张，不要将这个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当作国家的替罪羊。延斯·赖希教授代表新论坛，格拉赫作为自由民主党主席发了言。埃克哈德·沙尔说，民主德国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团，这要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值得钦佩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柏林专区第一书记京特·沙博夫斯基的态度，他强调，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为了更多的民主，我们大家走上了对话的道路。为了使人们听清他的讲话，他需要大声疾呼。做到争论文明是多么的困难！经常有人在背后指责我们不宽容，但在这种情形下却恰恰相反。

斯特凡·海姆主张建设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牧师弗里德里希·肖莱默主张更多的宽容。克里丝塔·沃尔夫认为，说民主德国的革命革新要比"转折"这个词更好。戏剧家海涅·米勒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电影电视大学的洛塔尔·比斯基谈到教师和学生的伙伴行为。女演员施特菲·施皮拉要求把万德利茨变成一所养老院。

苏共中央政治局在例行会议上就戈尔巴乔夫和我的会谈表态："存在一个稳定的、主权的民主德国是欧洲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政治局强调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团结。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革新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并也将在今后加强两党的合作。"

11月6日、7日

为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2周年举行庆祝大会。政治局委员克罗利科夫斯基发表讲话。晚上，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传统的招待会。

我感到很不安的是，为十中全会准备的讲话尚未完成，还必须做些精细的工作，以便能提交明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在莱比锡、哈雷、卡尔—马克思城、什未林、埃尔福特、科特布斯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我得到消息，从星期六（11月4日）到星期一（11月6日）12时，有23200名民主德国公民经捷克斯洛伐克离开我们国家。有时每小时的过境人数达300人以上。

主张立即召开人民议院会议的要求愈来愈强烈，连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也作了相应的表态。

11月7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辞职，部长会议向人民议院主席团提交了相应的申请。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志。当有人问及对我的看法时，布什回答道：克伦茨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些话相当令人鼓舞，同以前说他是一个强硬派的评价相反。布什又说，事情发展得很快，要认真地进行观察。

11月8日

十中全会开幕。会议议程有人事问题、关于政治局势的报告、讨论并通过行动纲领。原政治局集体辞职。关于人事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情绪十分激动，最终涉及建立一个应导致党和国家革新的新的领导集体。第一次开始对所提出的候选人逐个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有157名有表决权的中央委员。

我首次经历了在中央委员会就人事问题进行如此激烈的讨论。这表明，即使在老的中央委员会里，也存在着足够的要求对党进行革新的力量。我在十中全会开始时说：“我们

的国家经历了一种紧张和极其艰难的发展。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不应由劳动者、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教师和学生来承担，也不应由几百万正直的共产党员来承担，他们长期以来就指出了我们社会日积月累的问题。这个责任应该由那些主观主义地看待我们国家的发展、并在决定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把主观臆断说成是全体党员的意志并加以贯彻的同志来承担。由于严重地违反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章，党失去了优势、同人民的最紧密联系、政策的科学性、党内民主、意见争论的建设性、准备决策时的集体性，这种决策把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升格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

许多专区的党的基层组织要求撤销汉斯—约阿希姆·伯梅、维尔纳·瓦尔德、约翰内斯·凯姆尼茨和英格·朗格同志的党内职务。伯梅、瓦尔德、凯姆尼茨回到了他们的专区，但未能重新获得所在专区党委的信任，因此他们以及朗格还在十中全会期间就辞去了职务。

十中全会继续进行，我发表关于党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的讲话。

当天报纸发表了海军司令的一项通告。他宣布，今后在波罗的海海岸将允许帆板和冲浪。我对这一通告深感高兴，因为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满足帆板和冲浪者的这一愿望。转折使多年来被官僚主义阻碍的事情成为可能。

另外，报纸还说，向联邦德国逃亡的浪潮仍在持续。仅在11月7日夜晚，就有8000余名民主德国公民离开我们国家。一种难以承受的状况。

11月9日

中央全会继续进行。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

要求发言。讨论的内容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新的行动纲领。

中午休息时，我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约翰内斯·劳。我们就两德关系热烈地交换了意见。劳私下问我，是否可以就我所代表的政策作一些较深的解释。此时我还不能告诉他，为了人员和旅行来往，我们打算在11月10日开放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以及民主德国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我还没有征得中央委员会对此事的同意。在结束和劳的会谈后，中央委员会即批准了此事。但是边界已在11月9日夜晚开放。京特·沙博夫斯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本应在11月10日才公布的那项通告。于是一切都提前了一天。

11月10日

传来消息说，劳动集体离开工作岗位去了西柏林，储蓄所前排起了长队，在人民警察申报处，聚集了大批申请签证的人。中央全会因出现的政治形势而提前结束。全会结束前，作出了一项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行动纲领的决议。它简要地分析了这样一个辩证法，即来自下面的人民运动和来自上面的转折；也对党内形势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通过制订新的法律扩大社会主义法治；应该制订新的结社法、集会法、选举法、新闻法，并建议修改刑法，进行行政改革和采取扩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其他步骤。行动纲领称："应立即取消党内一切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特殊规定和优惠。"中央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建议人民议院成立一个检查委员会，以监督执行情况。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晚上，在柏林卢斯特加滕举行集会，柏林党组织的许多

同志都参加了。在这次集会上，我感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对党的基层组织要求举行特别党代表大会理解不够。

11月11日、12日

同科尔约好了电话谈话，应在9点左右开始。由于技术原因，一个多小时后才接通。交谈中，科尔对开放边界表示欢迎，我回答说，这完全是民主德国的主权决定，开放边界绝不意味着可对现有边界提出质疑。科尔和我一致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审慎，而不是极端化。我们商定了联邦总理府部长赛特斯于11月20日来访，并计划我和科尔12月中旬或下旬亲自会晤。

接着我参加了民主联盟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议院会议的筹备工作。我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行动纲领和与科尔的电话谈话。

人民议院各党团开会，以筹备人民议院会议。

当民主德国电视台问及我对特别党代表大会的看法时，我说，在柏林卢斯特加滕大集会的影响下，我将建议政治局把原计划的党代表会议变成一次特别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决定于星期一，11月13日召开下次中央全会。

11月13日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第十一次会议开始，会议选举京特·马洛伊达博士为人民议院主席，莫德罗博士为部长会议主席，并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审查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和其他违法行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对迟迟召开人民议院会议提出批评，语调相当激烈。这种情景在人民议院近年来从未有过。维利·斯多夫和他的政府的部长们回答了他们的工

作情况，通报了负债情况和国家安全部的工作。针对是谁迄今限制了政府的工作这一问题，维利·斯多夫明确回答，应由埃里希·昂纳克和京特·米塔克承担责任。

晚上召开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中全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特别党代表大会。

我接到报告说，党中央和政府已经收到16000份关于旅行法草案的信件。

11月14日

我们每天都从报纸上看到选举产生了新的专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消息。原先关于选举专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先经政治局批准的规定已不再遵守。

我第一次以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接见新任大使，他们对民主德国的发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翻阅县和专区的报告时，我发现，自人民议院会议揭露出一系列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事件后，有大批党员退党。

11月15日

人民议院自由民主党党团建议修改民主德国宪法第一条。同一天，农业部代理部长布鲁诺·里茨发表通告，宣布取消原来主要供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特殊狩猎场。

11月16日

我接见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卢舍夫大将。我强调，国家和社会的革新丝毫不影响民主德国对华约的联盟义务。

人民议院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团在柏林开会。许多对党和社会的危机负有特别责任的同志放弃了最高人民代表机构议员的资格，其中也包括埃里希·昂纳克。在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大楼，汉斯·莫德罗同各联盟党主席进行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我参加了谈判。决定成立一个修改和补充宪法的委员会；另外，建议制订新的选举法。

这一天，西柏林市长在众议院说：“我们正在经历重新见面的日子，而不是重新统一的日子。”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为过去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平反。

这一天，苏联外交部长就自由旅行来往的规定在《真理报》声明：“民主德国新领导人的决定符合赫尔辛基协定。这是对建立欧洲国家和东西方之间新的文明关系的反映。东欧国家的事件构成了欧洲大厦的牢固组成部分，欧洲大厦的基础正在通过共同的努力而产生。”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也在这一天讨论了民主德国的发展。联邦总理科尔发表政府声明称，他和埃贡·克伦茨一致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时期，在各方面需要高度的审慎和注意力。当天，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声明：“波兰密切注视着奥得河与莱茵河之间局势的发展。”目前使他的国家感到忧虑的原因，是害怕事件的发展可能失控，从而威胁欧洲的稳定。波兰人民对两个国家的德国人给予最好的祝愿，但为了本国的安全同样希望有有利的外部条件。

11月17日、18日、19日

人民议院开会。联合政府获得了所有党团的赞同。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建议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条约共同

体。新政府向宪法宣誓。

总检察长京特·文德兰德就11月7日、8日柏林发生的事件作了报告，指出，当时对游行的性质作了错误评价，动用警察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企图失败了。当时抓走3456名示威者，对630人进行了审讯。出现了不符合法律基础的干涉行为。

我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称："尊敬的克伦茨主席先生，您在一个对您的国家，对欧洲以及对东西方关系未来进程极其重要的时刻，承担了国务委员会主席的义务。美国对您决定为那些想离境去西方或只想去那儿旅行的人永久开放民主德国边界表示欢迎。这一决定以及朝民主改革方向发展的运动将有助于欧洲和解的历史性进程。这一进程不威胁任何人，而将增加所有人的安全。美国主张走和平的民主转变道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条道路将使欧洲心脏具有更稳定的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加深我们的双边关系而努力，为建设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欧洲作出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乔治·布什。"

报纸报道了我从万德利茨迁居潘科。我妻子和我想以此发出一个信号。星期天，民主德国电视台一个小组来到我的新居进行采访。各专区和县的集会本周末仍在继续。来自下面的革命不满意业已取得的成果。

11月20日

星期一，我同国际知名律师福格尔教授博士进行谈话，他在解决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人道问题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我对他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请他今后仍负责处理同联邦德国的人道问题。我授权他积极行动，以便使尚关押在鲍

芩监狱的政治犯在圣诞节时获得自由。后来我获悉，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12月8日也同意了此事。联邦总理府部长赛特斯来到民主德国。莫德罗和我向他介绍了我国的局势。我们强调，民主德国仍赞成欧安会进程，并讨论了旅行和探亲来往问题、扩大经济贸易关系、环保领域的合作、扩大邮电部门的合作以及交通问题。还准备了同联邦总理科尔的会晤。

11月21日

报纸宣布，密特朗总统将于12月20日至22日对民主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11月22日

我前往贝格曼—博尔西希国营工厂。这天，厂里举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我想实地了解党的工作状况，并同在岗位上的工人们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谈话主要涉及特别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党在企业里的作用。

政治局就圆桌会议对话作出决议。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行动纲领，中央政治局建议，参加联合政府的各政党同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共同举行圆桌会议。可在圆桌会议上讨论有关新选举法的设想，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改革宪法及其他问题。政治局向部长会议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寒假后，学校过渡到每周5天授课制，对其他教育单位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11月23日

我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题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想做什么”的采访。德国统一社会党要对原因、错误及失

误进行彻底、坦率的分析，进行深刻的革新，建设一种只有人民才是主人的社会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要使已经开始的革新进程不可逆转，实行以基层组织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民主地形成意见和意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周，对目前紧迫的问题作出这样的回答，这对直接的政治工作是有意义的。所涉及的是一种着眼于人的社会主义。采访的其他问题涉及到实现党的行动纲领，德国统一社会党新的自我理解，同苏共的关系，公开党的财政情况以及新的党费标准。

晚上，我观看了德发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石头的痕迹”。这部影片摄于23年前，1966年被打入冷宫。在这次重新上演前，我会见了该片演员曼弗雷德·克鲁克，他1976年前生活在民主德国，后来离开了我国。他说，我抽时间来看这部电影是一个美好的、给人以希望的姿态，并回忆起当年将这部影片逐出电影院所采取的恶劣手段。他说道：“当时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致命的打击，这是我心中的民主德国第一次真正地崩溃。”现在表明，也发生了变化。

11月24日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维尔纳·埃伯莱因接受记者采访。他说，被指控有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人，将受到严厉追究。

11月25日、26日

我临时决定去莱比锡。前一天晚上，我只通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党委第一书记，并请他不要安排任何礼宾活动。我们在莱比锡参观了一个百货公司和一个发电厂。出乎

我预料的是，到处都洋溢着愉快的气氛。有人问我为什么来莱比锡，我说，我对这个曾发出“自下而上革新”信号的城市的生活感兴趣。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发电厂，我发现该厂的状况相当糟糕。当我得知发电厂的一项重要施工计划因施工人员被调往柏林而被迫停止时，感到十分震惊。

我同莱比锡专区党委书记处成员进行商谈，党的状况事实上相当令人沮丧。我带着沉思返回了柏林。

11月27日

同德国共产党主席赫伯特·米斯会谈。我们强调我们紧密的合作与团结。《新德意志报》发表戈尔巴乔夫的文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变革”。

我从报纸上得知，德累斯顿市长沃尔夫冈·贝格霍费尔对《图片报》说，他要在特别党代表大会上同埃贡·克伦茨竞选。我心想，他为什么不和我谈这些？最后我想，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在特别党代表大会上，他很活跃并被选为党的副主席。我是在共同的工作中认识他的，觉得他能胜任这项工作，所以对他的当选表示高兴。几周后，当我获悉他退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一民主社会主义党，我感到很失望，他曾一度积极参与了这个党的革新。

11月28日

政治局研究特别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并讨论我对莱比锡的访问。我们同意关于12月7日参加圆桌会议的建议。

新闻媒介称，自1961年以来共有80多万民主德国公民离开了国家，并发表了由知名人士签署的“为了我们的国家”

的呼吁。呼吁全文如下："我们国家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我们不能也不愿再像迄今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党的领导自以为拥有对人民的统治并能代表人民，斯大林主义体制渗透到了所有生活领域。人民以非暴力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方式迫使革命的革新进程开始，这一进程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我们只有很少时间对被认为是可以摆脱危机的种种可能性施加影响。

要么，我们可以坚持民主德国的独立性，竭尽我们全部力量并同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国家和利益集团合作，在我国建设一个团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和平与社会公正、每个人的自由、所有人的迁徙自由和环境保护都有所保障；要么，因强大的经济胁迫，我们必须忍受联邦德国富有影响的经济、政治集团把同援助民主德国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过高的条件，而开始廉价拍卖我们的物质、道德价值，并在或短或长的时间里，由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

让我们走第一条道路吧！我们尚有机会在同所有欧洲国家的平等相处中，作出有别于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尚能意识到曾作为我们起点的反法西斯及人道主义理想。我们呼吁全体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公民们，以你们的签名参加这个呼吁。"

11月29日

我在回答"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呼吁的作者时说："我十分满意地获悉你们对民主德国公民发出的呼吁。我同意你们对局势的严峻性的评价，也同你们一样看到共和国面临的抉择。请你们相信，我将为在我国建设一个团结的社会而尽一切可能，在这个社会里，和平与社会公正、每个人的自

由、所有人的迁徙自由和环境保护都有所保障。我们有历史责任，保护这个具有反法西斯和人道主义传统和理想的、在德意志历史发展中选择社会主义的国家。”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根据指示为罗伯特·哈韦曼、鲁道夫·赫恩施塔特、莱克斯·恩德平反。会议还对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埃尔富特专区党委第一书记格哈特·米勒作了党纪处分，建议中央委员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会议作出决议，为那些近年来因为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提出批评而遭到不公正处罚的同志平反。

11月30日

同比利时外长主要就双边关系和目前的欧洲局势进行会谈。

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就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问题对我进行采访，我答道：“我对所披露出来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情况，感到十分愤慨和羞愧。必须指出，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我们将继续揭露所有这种现象。我已请民主德国总检察长彻底调查有关情况，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也请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尽快处理党内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都有义务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章行事。哪里出现违犯现象，就必须予以处罚，并且要快。”我还说：“我们应当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之前澄清这些问题，使人民理解：德国统一社会党不是一个腐败的党，成千上万的党员不是腐败之徒。不能因为有些人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像新闻界现在揭露出来的那样——，就对所有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兴师问罪。”

12月1日

中央政治局决定星期日，1989年12月3日在柏林召开党中央特别会议，议程是讨论党内形势、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报告以及对这一报告作出决议。

人民议院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调查委员会作了报告，议员们对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深表愤慨。人民议院决定，删去宪法第一条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议员们还讨论了旅行法。政府成员在质询中就目前的问题发表讲话并作出回答。

12月2日

我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里布尼茨—达姆加滕县代表会议。在去该县的路上，我从新闻中获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约亨·维勒丁在一封信中向我提出辞职。另外我听到，晚上柏林的党员要在中央委员会前举行集会，强调要求对党进行激进的革新。尽管如此，我仍去里布尼茨—达姆加滕参加了党代会，并在那里在19票反对的情况下被选为正式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请代表们对我为参加晚上柏林的集会而提前离会予以谅解。当我出席集会时，我感觉到与会同志对党的革新进度有一种强烈的不满。我试图发言，但发现，我在这次集会上没有机会再对党内的发展表态了。

12月3日

星期天同专区党委第一书记进行了短时间的商谈。他们敦促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辞职，由一个工作委员会负责继续筹备特别党代表大会。

12月4日

我还处在前一天党中央特别会议及中央委员会辞职的印象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从党的基层组织的批评中得出结论，即在过去的时间里没有能力“揭露前政治局成员所犯的全部错误及其严重性，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还是国务委员会主席，并同莫德罗及其他同志参加了华沙条约国家在莫斯科的会晤，戈尔巴乔夫通报了他同布什总统在马耳他的会晤。我预料到今后几天的政治形势，因此在同与会者告别时，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同他们在这样的会议上相见了。我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12月5日

我在党中央的办公室被查封。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处理了必要的工作。前一天晚上，我听到人民议院基民盟党团要求我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我写了辞职书。

12月6日

下午召开国务委员会会议。我声明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

曼弗雷德·格拉赫教授博士被委托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并履行有关的宪法职责。

我向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京特·马洛伊达博士递交了辞职声明。声明说：“当人民议院1989年10月24日选举我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时，我曾怀着坚定的信念宣誓：竭尽我的全部力量，维护主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共和国公民的幸福，为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牢固联盟，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而努力。

在此之前，我和政治朋友们一起，倡议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政策进行转折。我们行动的动机是较长时期以来成熟了的认识，即老的领导不断加深了人民意愿和脱离现实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并将我们国家引入一场深刻的危机。

多年来，我是昂纳克领导下的国务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这使我在不少公民中失去了对我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革新政策的信任。

然而人民的信任是履行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首要前提。在此期间出现了我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时不曾预见到的情况。

为了民主德国的稳定和我们国家必要的革命性革新，我辞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我希望民主德国人民能使自己奋斗来的革新进程不可逆转。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祖国正受到反社会主义势力威胁的危险。任何一种革命都孕育着反对势力集聚起来的危险。这些反社会主义势力想打破我国人民的自豪感，把几代人的劳动成果廉价卖掉。我们必须共同加以反抗。在这一极其危险的时刻，所有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人都必须出于爱国的责任感团结起来。”

附 录

作者简历

1937年3月19日： 出生于科尔贝格（现属波兰）

1944年： 从科尔贝格迁至达姆加滕

1945年： 在达姆加滕入学

1945年至1953年： 在达姆加滕（后为里布尼茨—达姆加滕）上小学

1948年： 加入1948年12月13日成立的少先队组织，并担任各种职务。

1953年： 在罗斯托克柴油发动机厂当短期钳工学徒。

1953年至1957年： 在吕根岛普特布斯师范学院学习

1953年： 德国统一社会党预备党员，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盟员，在普特布斯学习期间，担任青年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各种职务

1955年： 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埃尔福特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 在吕根岛普特布斯师范学院通过国家教师考试

1957年至1959年：在国家人民军吕根岛普罗拉志愿服役；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各种职务

195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国家人民军党组织代表

1959年至1960年：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吕根岛贝格县第二书记、第一书记

1960年至1961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罗斯托克专区第一书记；德国统一社会党罗斯托克专区党委执委会候补委员

1961年至1964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大学、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的青年团工作

1964年至1967年：在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67年：在莫斯科通过社会科学学士国家考试

1967年至1974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鼓动、宣传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学校的工作

1971年至1974年：同时担任“恩斯特·台尔曼”少先队组织主席

1971年至1990年1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议员

1971年至1981年：人民议院主席团成员

1971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3年：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

1974年至1983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

记

1976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1年至1984年：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1984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1989年10月18日至12月3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

1989年10月24日至12月6日：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1990年1月21日：被开除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组织机构

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

↓

中央委员会

←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领导

→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领导）

↓

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委员会（以专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为首）

→ 专区委员会书记处（由专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领导）

↓

德国统一社会党县委（以县委第一书记为首）

→ 县委书记处（由县委第一书记领导）

↓

德国统一社会党基层组织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